

# 韶關文史資料

第二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 封面照片说明

封面照片为始兴县的“满堂客家大围”。该围楼地处始兴县隘子镇，是清道光十六年（公元 1836 年）始建的砖石结构的四合院式围楼，前后花了 24 年建成。满堂围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伟，设施之完善，堪称岭南第一大围，1996 年 11 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围占地面积 1 万平方米，有 12 个院 9 个厅、6 个天井和平房、楼房、炮角楼等居室 700 多间，整个围有高大厚实的围墙环绕，屋前还有一块长约 200 米，宽约 7 米的门坪。

（伍文）

# 韶关文史资料

第二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十月

## 韶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主任：伍时永

副主任：苏广赞 肖汉谋 张秉钊 叶达俊

何胜祥 张壮后 陈应球 邬福安

委员：丁丽华 姚亚士 王志明 邓志球

冯淑娟 叶 纬 叶益群 朱庆明

初美华 麦 丰 杨继光 肖肇亨

吴宇勋 张建秋 聂德存 黄日有

曾汉祥 廖伟迅 蔡懋鸿



# 目 录

- 韶关工作回顾 ..... 陈遐瓚 (1)
-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粤北地区文物普查  
    工作述略..... 罗耀辉 (50)
- 建国后举行的韶关专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  
    大会..... 李璇光 (66)
- 回忆肩负神圣使命的粤北机要交通局..... 林奕雄 (81)
- 回忆三年土地改革历程..... 梁郁文 (87)
- 忆韶关中山公园的变迁和政府机关驻地的  
    更易..... 朱河生 (91)
- 忆韶关市搬运装卸企业变迁片断..... 郭锐民 (98)
- 《丰收快报》的创刊与地委印刷厂的  
    建立简介 ..... 龙柏呈 (106)
- 难忘的土改故事二则 ..... 梁锡祺 (109)
- 曲江中学巨变的见证 ..... 钟绍兴 (112)
- 引种温州密柑的筒忆 ..... 邓贯然 (116)
- 宣传婚姻法 婚事新办 喜气洋洋 ..... 王兴铎 (123)
- 回忆土改工作片断 ..... 李 刚 (126)
- 香港归来献丹心  
    ——忆南大校友陈燮 ..... 梁思梅 (131)
- 新丰历程点滴 ..... 伍绍铭 (137)

土改花絮 .....	曾宪拔 (141)
教书育人的苦与甜 .....	陈进松 (148)
粤北农业改制的概况 .....	姚良宗 (153)
解放初期农村的一些乡规民约 .....	陈宗琪 (159)
水稻生产的历史性飞跃	
——记仁化县推广三系杂交水稻的片断	
.....	黄雪梅 (161)
乳源土改杂忆 .....	梁 力 (165)
韶关市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回顾 .....	陈 瞳 (168)
粤北艰苦岁月纪事 .....	谭桂琼 (176)
情系韶关 甜酸苦辣考忠诚	
——在韶关五十年的片断回忆 .....	曾繁礼 (182)
“四清”运动点滴.....	曾繁衍 (196)
曲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一些情况 .....	方兰池 (199)
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调查 .....	李海章 (202)
解放初期访瑶山记事 .....	李 楠 (206)
记南方大学韶关归侨（港澳）校友会 .....	李南恩 (213)

# 韶关工作回顾

陈遐瓚

## （一）童年、少年、青年

1926年

农历十月初一，诞生于始兴县兴仁里村，父及官、始兴县参议会副议长，大母何氏，生母利氏，是年三修《陈氏族谱》，故取字为谱元。我家在农村，是一个大家庭。大伯父及时（清贡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晚年主编《始兴县志》。我幼年时，大伯父年老在家，教我识字、写字、读唐诗，从小培养学习兴趣。我为长兄，有一妹，二弟。我结婚后生有四女。

1933年

入学哲小学学习。1936年入始兴县立第一小学学习。1938年入始兴县立初级中学学习。

1940年

始兴中学教师温盛湘、廖琼等6人为中共党员，我受他

们的影响与教育，学习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新阶段》，以及《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进步书报，他们的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初步认识了：国民党消极抗日，黑暗、腐败；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我要树立革命的理想，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三青团在始兴中学发展团员，我拒绝参加，但我参加了党领导的学潮，驱赶反动教师莫飏等人。温盛湘 1937 年 5 月入党，1940 年任始兴特派员，他主持工作半年，发展党员 20 余人，为始兴建党打下基础。始兴中学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学生党员，有刘怀汗、曾宪瑚、李循作等 6 人。始兴中学一下请来六位党员当教师，应感谢张光第先生，他是始中的教导主任，全权负责学校工作（校长由县长挂名兼任）。张光第于 1922 年参加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失去关系，仍靠拢党。1945 年张光第与刘怀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是不朽的革命烈士。

## 1941 年

入中山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学习。与进步同学梁汉刚等结为好友，秘密学习党的报刊，互相鼓励进步。梁为人忠厚、诚实，有革命理想。1944 年参加东纵、后北撤山东参加淮海战役，建国后任广州航运局副局长。我与他乃知己，一生中过从最密。同班有许多进步同学，建国前参加革命的有张文熙、陈海仪、施传斌等 16 人，其中陈大德、崔克玲在中大附中读书时已是中共党员。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大附中教师文化素质高，教学质量好，学习成绩好，大多数同学考上大学，建国后这些同学多从事科技和教学工作，具有高级职称。杨爱莲是一位突出代表，她是心脏外科主任医师，具有“全国

优秀医务工作者”、“广州市优秀专家”等8个全国和省一级荣誉称号。中大附中同级同学中有饶纪寰、林汉周是始兴同乡，我们三人从小学至大学都是同窗好友。饶纪寰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晚年任韶关市政协副主席。林汉周一生从事经济工作，晚年爱好写作旧体诗词，多次获奖。

1944年

11月入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学习。

## (二) 地下党员

1945年

1月，日军占领始兴，我从学校回到家乡。

2月，曾宪瑚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抗日同盟。我介绍同村青年陈方畴、陈于才参加抗盟，后来他俩人入了党。陈方畴在建国后任始兴县副县长，晚年主编《始兴县志》。陈于才早逝。

4月，陈培松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培松于1943年在坪石中华文化学院学习时与我相识，我经常到他住处，共同谈形势、理想、前途，他对我的教育，使我对革命的信仰愈益坚定。他于1939年入党，曾介绍陈培兴、郭招贤、刘世周等入党，对始兴建党有贡献。日军入侵粤北，党组织已恢复活动，我参加抗盟后由他领导工作，由于他早对我有所了解，知道我有入党要求，于是介绍我入党。入党后做地下工作，支持抗日风度大队的武装斗争。

11月，任始兴中学教师。抗日战争胜利后部队转移一批

人员到城市做地下工作，我介绍何兆麟（何文）任始中教师；与曾宪瑚等以办烟厂雇请女工的名义掩护谭清、冯惠霞；又帮助邝凤琴治好病后，转移到铁寨小学教书。东纵西北支被国民党军围困在瑶山，与上级失掉联系，他们派教导员熊河清秘密到县城，我资助他前往南雄找到粤北指挥部，后又帮助他返回原部队。他将我的组织关系从部队转移到地方领导。那时，抗日同盟已改名为民主同盟，始中学生中有三位成员：陈干才、谭金元、何万钧，我负责领导他们。

## 1946年

1月，到广州回中山大学继续学习。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

参加“1.30”示威游行、“迎孙”示威游行。1月30日，中大等30多间大中学校2000多人游行示威，声援昆明学生斗争。2月19日，迎孙（科）示威游行，广州大中学校3000多学生参加，口号均为“要和平，反内战，争民主，反独裁”。

参加中师剧团，演出进步话剧“艳芳酒家”。该剧讽刺国民党官员在抗战胜利后，过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国民党军人梁人杰在广州“艳芳酒家”调戏女招待，恶有恶报，这个女招待恰是他的亲妹妹。我演梁人杰的同事袁胖子（肥佬渣）角色，同台演出的有刘碧霞、熊东祥等同学。5月7日在平山堂演出，特务捣乱，在会场燃烧爆竹，破坏演出。

参加中大学生自治会干部的竞选、争取学生会的领导权。由于我的公开活动，引起特务的注意，有一次特务在长堤青年会附近，碰撞、殴打我，以示警告。

与陈从远、刘筠秀等九位同学秘密组织读书会，学习进

步书藉。

11月，奉组织命撤离中大，通知我撤退的是林辉钊。那时，国民党已发动全面内战，在城市加紧镇压学生运动，党组织决定已暴露的党员实行撤退。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组织决定我撤退。在中大读书时党组织实行单线联系，先后与我联系的有曾进添、何国沾、杨东桥、梁天培、林华康、林辉钊等六位同志，都是同学。林辉钊，即林若撤退到九连地区参加武装斗争，改革开放时期任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我撤退到香港，经陈大德（沙朗）介绍到香港汉华中学任教师，他是中大附中同学，有才华，1942年参党，建国后任湛江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1981年病逝，终年58岁。

### （三）武装斗争

1947年

7月，奉调五岭地区参加武装斗争，行前中共广东区党委副书记黄松坚接见，传达区党委指示，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是从分散发展到集中主力建立根据地。恢复武装斗争初期的政策与策略要点是：分散发展，建立“梅花式”据点；打击国民党的乡、保武装，不过早与国民党主力军打硬仗；实行两面政权，待时机成熟时建立一面政权；发动群众的内容是反“三征”，“破仓分粮”，建立根据地后实行减租减息；用民变方式出现，力量强大时公开亮出统一的旗帜。他指示同行陈汗华带回电报密码，嘱地委加强与区党委联系。黄松坚，广西人，1929年韦拔群介绍入党，曾任红七军21师副师长，



广西工委书记、北江特委书记，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关心干部，大家尊称他为“家长”，成为党内的代号。

9月，行军二个月，经增城、龙门、从化、新丰、翁源、始兴等游击区，最终抵达南雄帽子峰，中共五岭地委所在地。五岭地委书记张华，原名刘鸿珍，1936年参党，曾任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招待所所长，“刘所长”遂成为党内代号。五岭地区早于1946年9月主动恢复武装斗争，1947年我抵达时，部队已从山区向平原发展，形势很好。中央和香港分局十分重视五岭地区，由一个五岭地委领导四个支队（北二支、湘南、湘游、赣南），活动地区跨三省28个县，解放前夕部队已达一万余人。建国后，五岭地委领导人分别担任了粤、赣、湘三省的重要职务，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有张华（广西）、刘建华（江西）、刘亚球、谷子元（湖南），黄业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

10月，参加地委举办的学习班，共约30人，回忆得起的学员有：云昌遇（班主任）、莫世延、黄枫、张建勋、刘碧（女）、李希（女）。学习结束后全部转为土改工作队，云为队长，我任副队长，在南雄乾村、洞头搞土改。当时我们是游击区，不是巩固的根据地，不具备实行土改的条件，过早实行土改多树了敌人，农民得不到实惠，敌人进剿我部队时增加了困难，后已改正。

## 1948年

1月，前往曲江开展工作，路经翁江地区的翁源太坪，遭国民党军袭击，廖春源、陈玲等同志牺牲。黄松坚从香港到达翁源游击区，布置反对国民党军的清剿斗争，嘱我回南雄向五岭地委传达。到翁北后，因敌人进剿始兴部队，联系中

断，遂在翁北林卧龙部队停留三个月。

5月，任始兴独立第八大队教导员。大队长张艺是抗日风度大队老队员，1946年恢复武装斗争，他即到八约地区工作。在他领导下，谭耀三、刘兴、刘献瑞、陈继兴、陈文以及地下党员饶振明共19人在八约地区坚决反对敌人的残酷“清剿”，他们依靠黄坑、礼坑、瑶族等革命村庄的人民群众，历尽艰险，渡过难关。其中王怀意、陈大良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10月，到南雄帽子峰参加五岭地委扩大会议。

11月，奉命到湖南郴州联系湘南工委书记谷子元。谷子元是1927年3月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在湘南坚持地下斗争和游击战争。五岭地委为了执行“坐南朝北”的方针，向湘南发展游击战争，需要取得湘南地下党的支持。我把谷子元从郴州（白区）带到部队与张华见面，后奉派到汝城国民党县警中队队长朱亚雄部任文书，作为部队代表秘密与朱联系，后朱亚雄起义。

## 1949年

1月，返回始兴八约地区工作。其时成立中共八约区工委，由张艺、李子德和我组成，张任书记，我任副书记，不久，张艺调主力部队工作，我任书记。在全国、全县大好形势下，我们地区的工作有了大发展。活动地区从山区发展到平原。扩大了十倍，含现在花山乡全部，沈所乡和城南乡之全部山区和一部分平原。部队人数从20多人增至100多人。建立了八约乡人民政府，乡长刘兴；沈所区人民政府，区长李子德。期间我们与县参议长陈遐球、县自卫总队副营长陈强建立了统战关系。他俩是我的堂兄，曾与我秘密会见，他

们为部队送子弹、粮食、情报，后随县长饶纪绵一同起义。

5月，策动国民党石下自卫队长李大然起义。我们通过工委成员李子德大兄李子衡的关系成功进行李大然的工作。在策动过程中，我们急躁，要求对方迅速起义，适遇唐麟同志路经我区去湘南，他指出，办此事要有耐心，他教我们应采取的策略和方法，我们照办，果然见效。唐麟在建国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反右倾”斗争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获平反。

#### （四）剿匪与土改

1949年

9月，始兴解放，任始兴县人民政府秘书、支前司令部参谋长。

1950年

1月，任中共始兴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始兴县委书记江伯良，是来自东北的南下干部，有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经验。县长邓文礼，东纵北撤后留在始兴领导游击战争。江、邓两人均于1939年在延安入党。

2月，清化华秉琦纠集土匪暴动，我率工作队到清化开展政治攻势，配合部队军事进剿。2月10日华秉琦纠集匪徒百余人攻打湖湾乡政府、清化区政府，县获悉后即着我带县大队一个排、干部20人前往进剿。接着解放军主力一个连也到达，遂会合一起向隘子圩附近的山地搜捕，土匪四处奔窜，无处藏身。我率领工作队进驻为匪人数较多的华屋、井下、温

屋等村庄，发动群众，做匪属工作，宣传形势、政策，指出自新之路。6月，剿匪胜利，匪徒自新140人，被我击毙3人，活捉3人，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94支。

## 1951年

1月，参加部署三约乡土改试点，5月全县铺开土改，第一步开展“八字运动”。省决定依靠解放军进行土改。解放军第48军143师民运科长李玉宗率领180多位部队同志到始兴参加土改，李任县委副书记，江伯良仍任县委书记。我全力投入运动，在三区贤丰乡蹲点。

6月28日著文：《贯彻政策，开展合法斗争》（刊始兴土改快报第七期），提出正确的斗争方法。“八字运动”全面铺开，发展迅速、猛烈，出现了吊打严重、地富自杀人多的情况。7月1日，48军政治部电告中南、华南军区政治部并华南分局，始兴地、富从6月4日起20天内自杀96人。其时县委已发现此问题，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7月3日，县委召开各区干部会议，我作发言，指出“八字运动”成绩很大，对“吊打严重，自杀很多”的偏向必须纠正，提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对地主要分清对象，区别对待，讲清政策，指出前途。要发挥人民法庭的作用。退租界限要按规定执行，不要借题罚款。

7月5日，我到韶关向地委副书记张根生汇报始兴纠正吊打偏向的做法，地委予以肯定，并发出书面通报（刊北江土改通讯第七期）。我们及时纠偏，符合叶剑英“七一”讲话精神。叶帅指出：在农民运动的胜利高潮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向应加以纠正。“乱捕乱打，单纯追挖底财现象，已有不少地区发生。”我们应“善于引导群众的自发势力进行正确的斗争。”

并克服由自发势力所引起的混乱状态，引导自发运动走上土地改革正常的轨道。”

11月，我率县土改工作队，许先觉、张铭三率地区工作队一同到第五区（清化）进行土改。

12月，北江地委书记伍晋南在北江第二次扩大干部会议表扬我为“突出进步”的县级干部。

## 1952年

6月—12月，兼任第五区区委书记，主持土改工作。

## 1953年

1月任中共始兴县委副书记。

4月陶铸来始兴检查工作，县无招待所，我让出住房给他睡宿。他指示县委全力转向生产，至此土改结束。始兴的土改发生过“左”的偏差，一为提高阶级成份，扩大打击面。全县划定地主1577户，占7.16%；富农1172户，占5.32%。对照省、县的规定，多划了地主、富农4.46%。二为错杀民主人士张鉴唐、陈遐球、饶振澜等一些（人已平反）。土改整队过火也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土改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成绩是主要的。贫雇农分得土地84,904亩，占全县耕地的52.47%，平均每人分得1.832亩。土改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53年全县粮食总产7.3千万斤，比1950年6千万斤，增加20%，人均占有粮食从1949年的302斤增至605斤。

## (五) 县委书记

1953年12月，任中共英德县委代理书记。土改结束后，华南分局对地方干部的使用有一些变化。陶铸在1953年1月分局扩大会议和1953年10月3日华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作报告，宣布“今后不许给本地干部戴地方主义的帽子”，提出使用干部仍以南下为主，但地方干部中能任一把手的应加使用。他说：“有不少本地干部，经过土改，提高工作能力与思想水平能恢复挂帅的，仍要给他们在主要工作上挂帅。”“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多提拔些本地干部”，“如现能提拔接替的，则应迅速提拔接替”。在这种情况下我担任了县委书记。1956年林铭勋担任了韶关地委书记。

### 1954年

1月，任中共英德县委书记。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在马口大队蹲点。

春，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望埠下塘、横石塘前锋、大站景头，黎溪岭咀头，我在下塘蹲点，县合作部长周平主管此事。

### 1955年

9月，到广州中共中央第六中级党校学习。平生第一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学了五门课程：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党的建设。韶关地区参加学习的人员连同理论班的学员有马一品、刘化鹏、翁敏（女）、何耀恒、成崇仕、陆奕年、单德成等25人。

## 1956年

7月，续任中共英德县委书记。1956年、1957年、1958年组织群众掀起了英德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兴建了波罗河陂头、汶罗河等五宗灌溉万亩以上引水工程，枫树坪、鹿颈等14宗水库。从1954年—1958年我任职期间，兴建水利工程178宗，灌溉面积15万亩，比1953年翻了一番。兴建水利的最大特点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没有机械施工，打夯靠手工操作。五年内施工总工程费718万元，社队自筹530万元，占73%。所建工程为蓄水、引水工程，至今仍发挥效益。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副县长谭章麟、钟波任总指挥。我召开几次会议部署水利工作，口号是：“过好水利关，保证农业生产大跃进”。1958年，我在枫树坪工地和民工一起过春节。

## 1957年

9月，参加地委扩大会议，后到英东板铺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用大辩论的方法，制止农民退社。

### （六）反“地方主义”

1957年11月21日—12月5日，我以英德县委书记身份列席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部署全省开展反地方主义运动。会后把省委书记古大存、冯白驹打成反党集团头子。

古大存的反党罪状有一涉及英德县之事。1955年4月春旱，英德县十三区的板铺村与洋坝子村发生水利纠纷，区干



部处理此事方法简单，有欠妥之处，板铺村的群众 300 多人到区政府闹事，后对为首分子实行镇压，判处陈耀章 3 人死刑，陈贻有等 13 人无期或有期徒刑。古大存极力反对判处陈等死刑，来电停止执行，由于电话故障，未能及时告之区政府。1982 年韶关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复查平反，认为“原判死刑属错杀”，对其他人免于刑事处分或宣告无罪。1958 年反地方主义时，以古大存反对处死陈等一事作为他的一条罪状。古大存主张杀人应持慎重态度，他曾说过“杀人之后就不能纠偏了，别的方面可以纠偏，唯独人被杀死，这个偏可没有办法纠正”，反地方主义时，作为右倾言论来批判。“板铺事件”的教训证明古大存的言论和实践都是正确的。

## 1958 年

2 月 26 日参加地委全体（扩大）会议，为期 12 天，重点批判、斗争地委书记林铭勋“严重地方主义”，“排斥打击外来干部”，其后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实际情况是，1956 年 12 月林铭勋在省人代会期间，参加了省委组织部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听了传达省委调整地方干部当县长的意见后，写了一信告知留家地委领导和组织部长。另一事为林铭勋向组织部长谈过，按省委要求拟一份地方干部可任县委第一书记的名单交地常委讨论，后因故未办，此事作罢。林铭勋贯彻执行省委指示，竟成为“有错”之人，这是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政策。这次会议还批斗处分了 6 位地委委员。会后地专机关、大部分县开展反地方主义，共批斗 332 人，处分 190 人（其中定性为右派分子的 72 人），后均平反。

3 月，中共英德县委召开全体会议，错误地作出“关于彻底肃清地方主义和刘天芳、林启祥、伍学良反党联盟的决

议”。把刘、林、伍打成“反党联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它违背了党章，侵犯了党员的民主权利。1956年英德县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遵照党章办事，地委副书记左铭亲临指导，是一次完全合法的会议。会前遵照地委通知民主选举代表，对下一届县委候选人名单报经地委批准，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对上届县委及其成员提出了批评意见，其中对原财贸部长和组织部长的批评意见较多。财贸部长打过老婆，女代表十分气愤，但这位同志接受批评，认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取得了代表的谅解，仍选上当县委委员。组织部长有工作作风的缺点，但他对代表的批评意见听不进去，不作自我批评，代表意见更大，结果选票不过半数而落选。这本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但1958年反地方主义时，对此事大做文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位组织部长是南下外来干部，便认定党代表对他提意见是“向党进攻”，代表不投票选他当县委委员是排斥外来干部，搞地方主义。由于党代表大会期间县机关的代表对组织部长提的意见较多，在反地方主义时，采用逼、供、信的方法对机关代表团刘天芳、林启祥、伍学良（县人委、县委、公检法支部书记）等三人搞了假材料，定成“反党联盟”头子。县直机关局（科）以上干部64人，被定为地方主义分子的（许多人在结案时定为右派分子）48人，占该级干部的75%，加上受牵连的共100人。这次反地方主义与反右派扭在一起搞，刘、林、伍三人均定为极右分子，刘、林送劳动教养，伍判刑坐牢。全县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共379人。英德是反地方主义和反右派的“重灾区”，后果严重，工作长期落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对此错案全部平反。在平反前，受害者匿名写信给我，日“寄语”：“英德奇冤，‘五六’案件，一人落选，百人遭殃。几届书记，仗义执言。廿

年莫白，何时昭雪？”道出了他们对伸冤平反的恳切愿望与心情，文中为何说几届书记仗义执言？五六年前在英德当过县委书记的王士英（南下外来干部）、李凌冰和我都认为此案是冤假错案，应予平反。这些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林启祥同志当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他是香港出生的工人，热爱祖国，1950年返回国内参加革命，在省政府工作，抽调到英德土改，表现很好，参加了党，他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后仍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自学水利技术，最后考评为工程师。这批“反党分子”中自学成材、考评为工程师的有3人。

在这次反地方主义中有人把斗争矛头指向我，说我有地方主义，1956年我去了党校学习，党代会之事与我无关。要整人总可找到理由，说我有地方主义的根据，一是我把一批部队转业的工农干部送去地委文化学校学文化，罪名为排斥外来干部，二是我提拔了一批经土改考验的南大学生和省府派来的知识分子干部，罪名为使用干部重才轻德。地委不予支持，出面制止。上述两事都是县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因此用同样“罪名”批判斗争了18名县委委员（内书记2人，常委4人，委员12人）占县委成员的40%。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均全部平反。

1983年，我到省委主持党史研究工作，对省反地方主义情况有了接触。广东反地方主义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在1952年和1953年，1952年毛泽东先定了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有“地主主义”的调子，后分局开会对他批判斗争，1953年批判方方有“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错误，认为是地方主义的发展，撤销了他的分局第五书记、省政府副主席职务。第二次是1957年和1958年，在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下开展

的，以“阶级斗争理论”作指导，说：“地主主义者实质上是党内资产阶级右派”，把反右派与反地方主义交错在一起。陶铸背离了他 1953 年的讲话，亲自领导这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从省到地到县全面开展。与第一次相比较，打击面更大，斗争程度更激烈，受处分之人更多。全省共批判了二万多人，有 17 位省委委员受到批判，有 77 位部、厅（地）级干部受到处分，一些地方还定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对部分干部开始时作为地方主义分子来批判，到处理定性时上升为右派分子，当时统计受“地方主义错误”处分的人数未包括上升为右派分子的人数。省委认定古大存、冯白驹“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对两人给予撤职处分。1983 年和 1984 年党中央先后为古大存、冯白驹和方方平反，认为对他们的处分是错误的，应予撤销，恢复政治名誉。在中央、省委领导下各地也为反地方主义受害者平了反，可见广东反地方主义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广东根本不存在地方主义问题。

党实行“五湖四海”的组织路线，要求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融洽团结。广东党组织从建党开始乃至各个时期，均有外来干部，本地和外来干部团结合作得好。战争年代，党中央、毛泽东十分重视、十分信任方方、古大存、冯白驹三人，对他们委以重任，多次表扬他们的工作成绩。建国后本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人民多作贡献，可是却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打击，对一大批经过锻炼的地方干部和少数外来干部也加以打击，使他们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浪费青春年华。反地方主义对广大的地方干部产生了重大的精神压力，使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产生了隔阂，长期以来广东对反地方主义问题成了讳莫如深的问题，广东反地方主义造成了重大损失。

回顾这段历史，目的是弄清是非、总结经验，以利团结

一致向前看，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1987年开始，我们就广东反地方主义问题访问了一百位老同志（含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大家经过了几十年共同工作与相互了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取得了共同的认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广东没有地方主义。1994年中共中央为方方平反时，恰逢方方诞辰九十周年，省党史学会开了纪念方方的学术讨论会，省委副书记张帼英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中央为方方平反的通知，刘田夫、王德、焦林义、罗天、梁威林等老同志出席了会议，拥护中央的决定。

## （七）“大跃进”与人民公社

8月，任中共韶关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马一品、马植田先后任部长，时间不长，实际由我主持全面工作。

8月，参加省委农村部组织地委农村部长检查、评比，分东西两片进行。王维副部长率我们到东片潮安、博罗、清远检查，其后在广州会合两片人员由李子元部长主持开会。那时报纸上发表了毛泽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谈话。会议讨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但对人民公社的体制、政策、制度等重大问题都没有讨论，会后，中央、省委作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在9月一个月，全韶关地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把全区1910个高级社改并成79个公社，其中新丰县、始兴县一县一社，连山县、连南县各办两个公社。我一到农村工作部就碰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了好几年，农村发生了严重混乱，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左”倾错误的表现，是以“共产”风为中心的“五风”为标志。“五风”是

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上的瞎指挥和高指标。韶关地区的“五风”是严重的。

关于“共产”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实行政社合一、单一的公社所有体制，取消社员家庭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又举办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人民公社的这种体制和制度本身就是“一平二调”，刮“共产”风。

关于浮夸风。1958年实行“大跃进”，到了秋末，各地虚报产量，“放卫星”。对讲假话，虚报产量的给予奖励，对讲真话的给予批判。新丰县虚报亩产2,500斤，曲江虚报亩产2,000斤，省奖给吉普车、拖拉机。地区一局长张秀峰下放樟市公社劳动，知道真实产量，他又讲真话，地委在礼堂召开会议对他批判斗争。连县星子乡放一颗亩产60,000斤的“大卫星”，全省出名，实情是该乡田北社有一丘中稻田面积1.073亩，产干谷64,849.66斤，折亩产为60,437斤，其实这丘田的禾穗是在实割前把62.2亩已结实的禾苗移栽并植过来的，省、地、县委领导去验收，《南方日报》于1958年9月3日发表社论大肆宣扬。

关于命令风。表现很多，最普遍、最严重的是反瞒产，强迫基层干部虚报产量。1958年秋，韶关地区响应省领导的号召，从11月起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吃了一个月，加之高征购，粮食开始紧张，农民说我们过了一个月的“风流月”。从1959年3月起南雄、英德、清远、市郊已发现浮肿病人。省领导相信高估产，不相信农民缺粮，于是在1959年1月陶铸坐镇东莞，赵紫阳坐镇雷南，进行反瞒产。我区各县（社）奉命召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反瞒产，强迫基层干部虚报产量。时近年关，凡虚报产量，受表扬，允许回家；凡讲真话，不虚报产量的，不许回家。至于基层干部为了刮“共产”风，执

行生产上瞎指挥措施而实行强迫命令（如克扣社员口粮）的，比比皆是，引起社员严重不满。

关于生产瞎指挥风。全区突出的有两件事，一是实行高度密植。地委领导有一“怪论”：播一粒种子结二粒稻谷，一亩播种 1000 斤，便可产稻谷 2000 斤，韶产专区农科所有一丘田播种 1000 斤，颗粒无收。实行高度密植，名目繁多，不可胜数。第二件是深翻改土。由于深翻过度，把地下之黄泥翻了上来，把肥沃的表土复盖，这种打乱了土层的做法只有招致减产。1958 年下半年以来，做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大蠢事。

关于生产高指标风。1958 年 7 月地委发出指示“开展万斤茨运动”，1958 年 11 月地委召开公社书记会议，提出 1959 年早造亩产指标 6,000 斤，争取 10,000 斤。上行下效，层层加码。

“始兴事件”是韶关地区“五风”的典型和缩影。“始兴事件”是始兴公社“五风”严重，大量死人。该社用行政手段剥夺农民，1959 年公社截留生产队的余粮款 60 万元，下令拆毁上围街 105 户社员的房屋 932 间。公社不顾群众死活，停发一个月口粮，又规定全劳动力每餐吃米 2 两，社员处于半饥饿状态，还强令开夜工。从 1959 年至 1960 年 5 月全社非正常死亡 5070 人，占总人口的 5.9%。该社干部的“命令风”发展到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地步。据周所等 10 个大队的调查，大小队干部 328 人（占总数的 43%）殴打社员 1069 人（占总人口 5.8%），干部对社员施予刑罚共有 17 种之多。地委在中央、省委领导下纠正“五风”，经历了反复和曲折，才收到成效。



## 1959年

2月，撤销农村部，我任地委副秘书长。

3月11日—20日参加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改变公社体制，实行“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制度，广东实行的是以大队为基础。公社体制下放，对遏制“共产”风有一定的成效。但当时纠“左”是以肯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为前提的，“左”的指导思想未根本转变，因此纠“左”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巩固的。这次会议开得紧张，省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情况。韶关地委第一书记郑星燕率队参加会议，郑于1931年在上海参加共青团，抗战时期到了延安，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照相。

8月1日至8日，参加省农村工作部在佛山召开的地委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传来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精神。由于会后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中断了，“左”倾错误再度泛滥。是年冬，洲心等少数公社，又实行公社所有制，再刮“共产”风。“反右倾”斗争，在机关中定了不少干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批判了大批基层干部和农民党员，农业生产继续下降，患浮肿病而死亡的人口继续增加。

## 1960年

10月13日至17日，参加省在新会县召开地委农村部长会议，研究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问题。其时各人民公社继续刮“共产”风，因此省委对会议报告的批语指出：“共产”风仍是搞好经营管理的障碍，需继续克服。我于会议期间，患

病昏倒。

## （八）整风整社、贯彻“六十条”

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重新纠正“左”的错误。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接“指示信”后，我随同地委书记左铭到清远源潭公社进行贯彻（我和张强住在台前大队），重点是赔退“共产”风，算了经济细账，赔退了现金20多万元。清远全县共赔退“共产”风款1649.7万元。“批示信”规定了清理赔退“共产”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十二条政策，但信中仍坚持实行部份供给制，坚持办公共食堂。

1961年春，我率地区工作队，王弼庭率省工作队一同到新丰县（与连平县合并）长坪公社整社。根据中央批转“信阳事件”的报告和省电话会议精神，把该社作为领导权已被篡夺、土改不彻底的三类社来整，错整了公社书记骆强欧，错处理一些社队干部，还把一些农户错划为富农（后均已平反纠正）。这次整社对医治水肿病人做了有益的工作，对教育干部改进作风有一定作用，但当时不认识社队干部发生“五风”的真正原因。现在看来社队干部有“五风”虽然与他们本身的思想作风有一定关系，但根本原因是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上级领导带头有“五风”，在这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社队干部身不由己，因此不能把农村出现“五风”的主要责任推在基层干部身上。要彻底克服“五风”，必须上下一起动手，才能奏效。

## 1961年

春夏间与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蔡思义在曲江县龙归公社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六十条）。当时农村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生产连年减产，农民缺口粮，浮肿病人多，死亡人口多。据1961年1月专署民政局统计，全区患浮肿、妇女闭经及子宫脱垂等病的有155,935人，1960年全区全年共死亡88,794人，占总人口的2.55%。据此情况，贯彻“农村六十条”当应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评工记分，对社员实行“三定”，以调动集体生产积极性，但燃眉之急的是解决农民的口粮，制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之事，因此需要放宽政策，采取临时措施，以发挥农民个人的积极性。我们提出的措施有：1. 落实社员自留地，迅速发展家庭副业；2. 社员完成“三定”任务，开垦零星荒地不限数量；3. 社员承包副业生产可包产值到人、到户；4. 冬种包两个60%。当时有人反对，我坚定地说，这样做好过饿死人。同年10月，我在各县农村部长会议上介绍推广翁源县青云大队关于副业等多种经营的管理经验：可以按产计酬，可以包产值，可以包产到户，后写成文章在《南方日报》发表。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把这些做法作为我“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来批判。党中央从1961年2月在广州制定“农村六十条”起，至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中间经过几次会议讨论修改，最后作为“修正草案”，明确肯定了三个重要问题：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停办公共食堂；停止实行供给制。韶关地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同时，调整划小了生产队的规模，平均每队18户，被人讥讽为“小小队”。地委十分重视贯彻“农村六十条”，1961年8月10日地委召开扩大会

议讨论贯彻落实“农村六十条”，同年10月10日召开各县农业书记会议，讨论实行生产队核算问题，1962年1月召开县农村部长会议，讨论生产队经营管理问题。“农村六十条”虽未解决农村的一些根本问题，但当时以及后来对扭转农村的混乱与困难局面，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 （九）联产责任制的探索

1962年

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田间管理联产责任制，省委领导赵紫阳、杨应彬实地考察，予以肯定。我去总结后，要求各县搞试点，均取得明显效果。其他社队闻风而动搞起联产责任制。1962年秋，全区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责任制（含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共1.3万个，占总队数的30%。

1963年

2月恢复农村部，任副部长。

12月11日，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全党动手，大抓公社的经营管理，我在会上作了“进一步巩固健全责任制”的发言，认为：联产责任制是一项先进的管理制度，应做好巩固、健全、推广工作。会后全区抽调6248名干部下乡做农村工作。1963年全区粮食获得丰收，到1964年突破20亿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是韶关专区合作化以来粮食产量的第二个高峰。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必须从体制上找答案。1959年开始，公社体制下放，开始以大队为基础，到1962年

贯彻“农村六十条”，以生产队为基础，这就解决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然而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便突出地显露出来，解决此问题已是社员的迫切要求。实行田间管理联产责任制虽只部分地解决了社员相互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在“包产到户”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日子里，实行田间管理联产责任制当然受到广大社员的热烈欢迎。可惜的是，这种责任制命不长，遭厄运，推行不久，便被制止。在毛泽东把包产到户斥之为“单干风”的气候下，1965年8月省委正式通知停止实行。自从1958年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农业生产和农村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经过七年的纠“左”努力，到1964年才大体上得到恢复。

（见“韶关地区1957年至1964年七项农业指标比较表”）

## （十）“四清”运动

1964年

1963年12月至1964年6月我率地区工作队，何坚率县工作队到始兴城郊公社搞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地委副书记郑郡主管全区运动，认为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做工作，要“依靠原有干部”，实行自我教育，“不追、不逼、不压”，还组织干部群众进行“评功摆好”。整个过程重视生产。但在运动中还是整了社、队干部，对少数有“自发”行为的社员进行了“重点帮助”，当时用“左”的观点衡量，称这批运动只够“低标准”。

韶关地区 1957年至1964年七项农业指标比较表

时 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农业总产值(万元)	30,210	30,853	28,668	25,376	22,948	25,735	27,402	32,900
粮食产量(担)	20,564,332	19,577,375	17,718,901	18,161,546	17,857,316	20,195,982	19,675,448	23,911,373
耕地面积(亩)	5,921,354	5,548,096	5,291,837	5,141,846	5,202,996	5,327,539	5,223,923	5,157,596
年末劳动力(人)	1,229,114	1,186,038	1,126,655	1,130,557	1,222,189	1,282,857	1,334,531	缺
耕牛年终存量(头)	500,005	458,439	418,885	383,456	365,162	368,370	390,945	407,357
生猪年终存量(头)	711,486	648,869	420,622	329,641	322,817	481,963	721,780	缺
三鸟年终数(只)	6,177,150	5,101,669	4,274,325	4,137,366	4,684,920	4,407,359	5,162,762	缺

从表中可看出生产力和产量大部分项目到1964年才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指标。

10月，任曲江四清工作团樟市分团团长。此团由清远、乳源两县及地专机关工作队组成。从8月26日起地委集训工作队9260人，历时四十天。此期间，地委书记郑星燕要我先带一工作组（各县出一人）到樟市公社南约大队调查了解干部情况。我们到队后通过个别谈话、小型座谈等方法了解到的情况是：大多数的大、小队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或只有轻微的“四不清”问题。有少数干部才有较严重的“四不清”，没有一个干部是阶级敌人。我在“四清”总团召开的大队组长会议介绍了这情况。当时，省委对农村情况估计得十分严重，认为基层组织“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不是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问题，而是止不止三分之一的问题”。“四清”工作团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推行“桃园经验”，撇开原有干部，重新扎根串联，许多队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根子。入村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清远干部到一个生产队长家吃了饭，一位总团副团长知道后，在电话会议上提出开除这个队员的党籍。曲江“四清”工作于1965年7月结束后在始兴、英德、连县等县铺开。这次运动比之前几次整风整社更是“左”得很，严重打击了干部，打击了富裕农民，削弱了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这年冬我因生病，提前离开了工作团。

## 1965年

夏，参加省召开的地委农村部长会议，提出要响应毛泽东号召，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各级建立政治部。会议确定各级农村部改名为农村政治部，职能是指导农村的政治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交由政府农业部门承担。这年夏我带领各县农村部长到博罗黄山洞参观学习他们学毛著的经验。秋天我与李志刚同志到曲江县黎市公社



黎市大队，翌年春转到马坝公社漠溪大队办政治工作的点。早于1964年春，省军区帮助训练地方政工干部，解放军派48人到韶关地区，全区办了政治工作的点共206个大队。由此农村工作强调突出政治，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冲击了生产。

## （十一）批“修正主义”

1966年

5月听传达中央“五·一六”通知，有关彭、罗、陆、杨反党问题的文件。看阅了中央对工业战线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思想震惊，很不理解。“五·一六”通知标志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7月，任中共韶关地委农村政治部主任。

8月，参加省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会议的筹备会议。会议由杨应彬主持，研究做好发言材料的准备工作。又到省协助举办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事迹展览，韶关地区有黄陂、大陂二个大队参加展览。参与筹备11月召开专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贫协代表会议、民兵代表会议。11月地委农村政治部与韶关军分区政治部编印了一本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资料。

12月，地委机关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7年

2月，解放军介入，成立韶关领导小组，地委、专署陷于瘫痪。随着“文革”的开展，各地乱揪乱斗干部。我靠边站，

受“审查”。3月参加领导小组召开的中层干部会议，揭发地委问题，为时一个月。所谓揭地委的盖子就是揭发地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从此对地委的称谓有所改变，曰旧地委。这次会议地委一位领导控诉地委书记郑星燕重用了我，说我当地委农村部长不够格，因我有两条“罪状”，一家庭成份地主，二本人成份大学生，臭老九，这个论点现在听来有点荒唐滑稽，“文化大革命”时期却是把人划入“黑五类”的重要依据。

5月，农村政治部，公社干校的造反组织“换新天”、“缚苍龙”、“征腐恶”，联合起来对我批判、斗争，连续不停进行了半个月，其后也陆续进行过多次的斗争。他们出了许多大字报，都说我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十大罪状，归纳起来，有五条：1. 推行“三自一包”，实行单干；2. 大搞工分挂帅、物质刺激；3. 瓦解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4. 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突出政治；5. 文革中执行资反路线。这些罪状的实际内容是指我在农村工作中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实行田间管理联产责任制；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不积极推行大寨的“民主评分”；落实社员的自留地，在困难时期放宽政策允许社员完成定勤定肥任务后开垦零星荒地；要努力搞好农村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等等。这些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东西，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正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所规定的内容。当时我想不通，翻出工作条例看了几遍，它明确规定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实行按劳分配；实行生产责任制；加强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并多次开会讨论修改，经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到了“文化大革

命”却成了修正主义的东西，虽想不通，但不敢说。鉴于在“文化大革命”的气候下，有政治大压力，为了过关，我作了违心的检讨。从1967年5月起，至1969年11月止，共写了五次全面检讨，数十万字。1980年12月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退回我的书面检讨材料。

这时农村中大批修正主义路线，违反“农村六十条”的规定，重复公社化初期的错误，实行公社、大队核算。1969年终统计，实行大队核算的有900多个大队，占总队数的45%，连山等县实行公社核算的有6个公社。

7月，到佛岗石角公社石角大队参加“双夏”劳动。11月参加专区第一期学习班，为期一个月，期间韶关“红旗派”与“东风派”发生第二次武斗。

## （十二）坚持实事求是

1968年

4月，到黄陂农场参加春耕劳动。7月到马市公社参加“双夏”劳动。

8月参加专区第七期学习班，住北江小学。学习班之本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批斗“当权派”与某派头头的斗争会，被斗者胸前挂一牌以示“敌我”界限清楚。斗争事不多讲，也明白。现回忆一下在学习班上我亲历的外调人员的二件事。同年10月26日一外调人向我调查邓文礼的情况。本来审查人，向有关的当事人调查了解情况是好事，但当时对胸前挂有牌子的我，外调人摆出了一副对专政对象专政的面孔，采用的手段更出乎意料。他了解邓文礼在1948年上半年

年的情况，那时国民党军队进剿我部队，情况困难，我跟随邓文礼并第五支队部在始兴清化活动，经常转移，在山上住茅棚隐蔽。由于我们机警，未遭敌人袭击，部队集结分散，行军转移均主动，没有发生失散等事。当来人问邓文礼有无向敌人自首，我听了十分惊诧，立即干脆回答：没有。来人听后马上变脸，骂我“不老实”，心想，邓文礼没有离队，没有向敌人自首，我如实回答就是不老实吗！我顶回去：“没有就是没有，怎叫不老实呢？”来人凶了，并使出了花招：“不可包庇他，刘汉兴（邓文礼属下大队长）说邓文礼已自首了”。我答：那你就叫刘汉兴证明吧！那段时期我与邓文礼朝夕相处，邓文礼没有自首。我有点火了，声音很大，惊动了旁边的人，他们都转眼朝我而望。所谓刘汉兴证明，乃是诱供伎俩。为了要整倒一个人，居然使出了讹诈的卑鄙手段，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吗？

另一事，同年10月31日，一个自称姓韩的人说，奉部队命审查广东的全部游击部队，他身穿中山装，此君究系何人不得而知。他十分凶恶，拍桌子、瞪眼睛、大有吃人之势。当我谈到黄松坚于1948年春在翁源派我到南雄传达反清剿指示时，他插问：“黄松坚现在何处？”答：现在广西，任全国政协委员。韩氏立即大骂：“共产党人为何到政协工作，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了？”，听了之后，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靠这样无知的人搞“文化大革命”那里会搞得不好？怎不出冤假错案呢？

1968年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靠边站无工作做，不要虚度光阴。中央号召学习马列，在1968、1969年，我阅读了《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哥德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书，写了学习笔记。我精读了《反杜林论》一书，对每章节不是读一遍而是读二遍三遍。

参阅辅导材料，直至读懂为止。我写下这样的心得：“过时论，是从右的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顶峰论，是从“左”的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会不断发展”，通过学习写了一文：“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问题”。也精读了《法兰西内战》，写了较详细的笔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结合学习了毛泽东的《矛盾论》等哲学著作。

11月，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我单位属第五营第十五连，地点在山蕉，原劳改农场，后来转移到西联农场。成来凤是农垦局的副局长，同在一个连，在文革时期有的人对我如同躲瘟疫似的避之不及，但成常与我来往，接触，谈话，散步，使我感动，铭记在心，永世不忘。

## 1969年

3月，参加专区第八期学习班，时间约2个月，地点在韩家山。这是一个奇怪的学习班，每一个当权派配备二个造反派陪同学习。名为学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在造反派监管下写检讨，不能与别人讲话来往。同一组学习的有张建勋、孟庆云、高某等人。后来据说参加学习班的是未定性的当权派。在学习期间到韶关市体育场出席了一个群众大会，听传达“九大”精神。虽“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但我是党员，却不能在党内听传达，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1月，宣布解放。从1967年2月靠边站起，整整审查了三年。11月22日“五七”干校五营十连连长丘河良在全连大会上宣布对我“解放”。同月26日由连指导员李胜菲宣布恢复组织生活，至此可算过了“文化革命”关。这三年，除批我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外，还审查我的政治历史。我历史清楚，

本无问题，但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左”倾思想指导下，怀疑我有历史问题。为了审查，要我写下数万字的个人经历材料，写一遍不行，再写一遍，同一个问题，同一事件，同一时间的历史写了又写。农村部有个别人到广西向我的证明人调查时，实行恐吓讹诈，搞了假材料，在我坚持原则下再调查，终于弄清了真相。真金是不怕火的，我的历史光明磊落，可见天日。1970年11月、1974年6月“五七”干校先后给我做过二次结论，均是审查清楚，未发现问题。1979年6月5日中共韶关地委组织部正式为我作了政历结论，现抄录于下：

### 一、关于党组织关系：

陈遐瓚同志于1945年4月经陈培松同志介绍，八约区党委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因国民党军队“扫荡”，未举行入党宣誓。此事由区党委负责人邓文礼同志向上级作了汇报。据此，陈遐瓚同志是1945年4月入党的。入党后，于1945年10月去始兴中学教书，年底又去中山大学读书，1946年11月去香港汉华中学教书，直至1947年夏天回始兴参加武装斗争，组织关系都是清楚的。

### 二、有关参加伪三青团问题：

陈遐瓚同志于1938年9月至1944年11月先后在始兴县立中学和中大附中（坪石）读书。这段时期内，两校均有三青团活动。据饶纪襄（与陈同学）、梁干、邓良端等证明：“从初中到大学读书期间，陈由于进步教师的帮助，思想比较进步，是一个进步学生，未发现遐瓚有参加三青团反动组织。”据此，可以认为陈没有参加三青团组织。

### 三、有否参与1950年烧毁始兴县敌伪档案问题：

陈在始兴任县人民政府秘书，工作期间的1950年春节前

已率部队前往清化一带征粮、剿匪。据邓文礼（当时始兴县县长）证明：“陈遐瓚在县府工作时，搞支前及征粮工作，没有抓整理敌伪档案工作，他1950年2月调宣传部之后，县委调李子衡接替他的秘书职务。”据此，始兴县的敌伪档案被烧问题与陈无关。

综上所述，陈遐瓚政历上经审查清楚，可作清楚结论。

## 1970年

7月—11月，任“五七干校”三营九连工作组长。校领导认为九连政治情况复杂，工作落后，决定派驻一工作组，由我任组长，何湘、甘克为组员。何湘在1948年游击队时十分英勇，徒手从叛徒手中夺回一挺机枪，经历了惊险的战斗。甘克原在地区公安局当科长，富有侦察经验。我们到九连后发生一宗棘手的“政治案件”，有五张国民党空投传单被藏放在九连宿舍旁的柴堆内。当时政治气候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而九连是一个落后连，成份复杂，有旧官吏，旧军官，旧知识分子，还有一位日本女人。我们到九连前已发生过二宗“案件”未破案，现发生了“政治案件”，不是阶级敌人搞鬼又是什么？不树立高度的阶级斗争观念怎么能行？是要迎合这种政治气候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这是对待九连工作特别是侦破“传单案”的根本出发点和态度。我心中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能有私心杂念，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定要坚持调查研究的方法，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末尾。我们深入群众个别访问，多方面了解情况。以巩文贵为首的九连班子是好的，出身不好的旧人员，表现也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能单凭他们出身不好就武断认为有政治问题。这是我们对全连的基本看法。

现专门谈谈侦破“9.24传单案”一事。9月22日国民党飞机在西联上空散发传单，干校发动学员到各地收检上交，此事本已完结。9月24日在九连一男宿舍墙边柴堆之空隙内，发现了空投传单5张，校方看得十分严重，说是“政治案件”，必须限期破案。我们工作组和营连领导都很紧张，破案工作主要落在工作组身上。柴堆靠墙边，上有屋檐，空中投下之传单，不能直入靠墙柴堆之空隙，此乃人为之事，从常识上可作此判断。究竟谁人所为？柴堆靠墙有一窗口，室内住的“五七”学员是原国民党军医，年约六旬，此案件是不是他所为？或其他“阶级敌人”所为？我们工作组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为结论应产生于调查情况之末尾，不可轻易怀疑，于是展开调查，而且做得认真细致。宿舍旁边有一块大空地，当时许多女同志下放干校，把小孩带在身边，这些小孩每天在空地玩，经过10天的调查，发现有一小孩游玩时跑到柴堆前张望，我们进行分析，此事是否与小孩有关？如何证实此事？询问、恐吓所得之证词是不可靠的，我们采取另一方法，与小孩交朋友，混熟了，他们相信我们，这时条件成熟了。一天我们与这几个小孩玩得正高兴时，拿出几张国民党的空投传单给他们看，说我们有很好的颜色纸，他们见了好奇、有趣，争相翻看，其中一个8岁的小孩便说：我也有这样的颜色纸，我们问在那里，她说我去拿来，说完立即跑到原放传单的柴堆去，向那柴堆空隙伸手去取，未取到，说：我放在这里的怎么不见了？问她是什么颜色，有几张？所答与我们的发现一模一样。她于9月22日下午四时许在空地上发现传单，为了保存起来玩，便放到柴堆空隙去，所说的时间也与空投时间相吻合，这一来案件便有了可靠的答案，“政治案件”的性质可推翻了。国民党空投传单是政治案件，



但把五张传单放到柴堆一事却不是政治案件。破案后，九连同志十分高兴，思想上放下了大包袱，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同志，精神上得到了大解脱。此事得到校领导军代表的认可与支持。此外，干校猪场，猪打架互相咬伤，也说是人为的案件，经不带框框认真调查，也弄清了。

每当回忆这段历史时，我总是想，在“疯狂”的“文革”年月，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和胆量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呢！

### （十三）复出先试用

1971年

在坪梅铁路工程指挥部工作。为了解决广东缺煤困难，把湖南宜章境内梅田煤矿划归广东管辖。要把大量原煤运到广东，由广东修建一条从梅田到坪石的地方铁路，遂组建广东省湖南省坪梅铁路工程指挥部，从韶关之南雄、阳山、英德及电白等县抽调民工参加修建。韶关出的民工多，需有领导干部管理民工并参加指挥部领导工作。原先有杨三喜、李海涛任此职务，他们调回韶关后调我到指挥部顶替他们的工作。我于1970年12月12日抵达坪梅铁路指挥部。指挥部的领导人是王弼廷，原省建工局副局长，党组书记，有一名军代表郭氏，我们三人共同组成指挥部领导班子。我在指挥部工作近一年，修路已近尾声，经省革委批准把一部份民工转为正式铁路工人，其余民工返回原地，我于1971年12月返回韶关分配工作。

## 1972年

1971年12月，任红工矿务局生产组副组长。文化革命五年来第一次正式分配工作，也是我第一次到工业部门工作。煤矿属地下坑道作业，专业性强，我们这些外行人做领导工作完全不合适。它的生产情况、特点一窍不通，就是煤矿通用的名词术语（如冒顶、漏底）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也不懂。局有政工组、秘书组，其业务与我过去的工作较相近，但不予安排，专分到生产组。这种用人之道安在？据说是为了使这些“旧人员”“不穿新鞋走老路”，不能继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只有支左的解放军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执行革命路线的，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用人逻辑。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做好工作，不懂就学，知难而进，向技术人员学习，借取有关煤矿的理论技术书籍学习，即使这样，也难于领导、指挥生产，于是向领导提出我抓企业管理，过去我抓过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较为相近，再加学习，较易上手，我的建议得到支持。从此我这个生产组副组长就抓企业管理，尽自己努力做点工作吧，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总要为党做工作。当时批判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矿里取消定额计件，工人积极性不高，无政府主义严重，现代企业不抓管理，只会出现混乱。我选印了马、恩、列、斯、毛论企业管理的语录及有关资料，举办学习班，培训干部。我到外地取经，先后到安源和淮南煤矿参观。淮南煤矿开展劳动竞赛对我启发很大，从此我便在红工煤矿组织了劳动竞赛，订出了竞赛条件与奖励办法，在局本部新建了一个规模颇大的竞赛栏，定期公布各矿各连生产进度，这样一来全局的竞赛搞得有声有色，生产产量大有进展。我不满足这热闹场面，

深入现场发现竞赛开展得好的连队都是干部管理严，连干部每天三班在矿井上轮流值班，清点下井人员。我深想，这是个问题，工人缺乏自觉性，劳动竞赛怎么能持久？于是找连干部、老工人座谈，他们一致认为要实行定额管理，按件计酬，我把这个意见向有关人员反映，进行酝酿讨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对物质利益原则，只讲政治挂帅，“左”倾之风虚行，这个意见只能说说而已，未能付诸实行。

### 1973年

2月，任地区“五七”干校校长，副校长有和联杰、陈华。干校任务为审查分配干部，那时许多干部已分配回地区机关，留校学员思想十分动荡，他们下放干校已有五年，青春如此度过，十分不满，急切要求快速回机关工作。但干部分配权在地区政工组，干校无可奈何，只能抱同情态度。干校还有为干部做政治历史结论的任务，但数量不多，许多人已做结论分配了工作，留校的人数不多，且其政历已外调审查清楚，剩下的任务就是做书面结论。干校下属一农场，原为西联农场，种茶种果，规模颇大，收获颇丰。“文革”期间受到破坏，水利喷灌设施被拆走，工人转了一批到韶关市工厂，农场只能维持现状，缺乏生机。在这一年内我被任命为地委宣传部副部长（6月），地区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10月），都未到职，继续在干校任实职。

## （十四）运动办主任

1974年

8月，任地委宣传部长，曾向群、吴江任副部长。同时又任地委运动办公室主任。我和吴江、蔡思义的实职工作在运动办公室，宣传部的工作全由曾向群主持。设置运动办公室的缘由是当时省委指导农村工作有二个主题，一是学大寨；二是基本路线教育。省委设立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和普及大寨县办公室。地委的工作重点是农村，为了适应省委对农村工作的要求，在地委书记李海涛的提议下设立运动办公室，协助地委具体掌管此二项工作。运动办公室组织地县工作队下乡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在2月和10月先后开展第一、二批运动。基本路线教育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就是搞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所谓批判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实质是打击富裕农民，限制农村的家庭经济与农贸市场，违反了“农村六十条”。

当时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暴发户”，对他们大张旗鼓进行打击。所谓“暴发户”，其实是农村收入较多的农民，他们或开荒较多，种植什粮作物较多；或饲养家畜家禽较多，开展多种经营较好；或有技术，经营了技术性较强的工副业；也有少数人贩运经商。绝大多数人都是凭双手劳动致富，建了新屋，添置了新家俱，生活比其他农民好，对他们的打击是错误的。在基本路线教育中规定了一个处理公私关系的步骤，限制农民饲养家畜、种植果树等作物的数量，名曰割资本主义尾巴。特别要提到的是限制、关闭农贸市场问题。当时认

为农贸市场，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实行统一圩期或缩小圩期，每逢大忙季节，明令关闭农贸市场，干部和民兵在圩镇各道路入口处设卡制止农民入圩赶集。翁源县附城公社一年春耕，公社书记巡视市场，看见一老农摆摊卖青菜，他上前质问，意图制止，老农从衣袋里拿出一张中药方，说：“同志，我老伴病情严重，卖了这担菜才能买药呀！”这位书记看此情景，没再说话走开了。

这一时期地委抓了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从1974年至1976年组织群众大规模平整土地，其要求是：把土地并裁成方格，并加平整；整理排灌系统，实行排灌分家；整治小河道，实行裁弯取直。全区各县、社的平原地区都实行了平整土地，山区也因地制宜适当进行平整。全区较大平原，如始兴县平原、清远县洲心公社、佛岗县汤塘公社均进行了大规模的平整行动，平整土地时曾实行大兵团作战，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总的来说，平整土地有很大成绩，它为后来推广杂交水稻，增产粮食提供了良好的土地条件。

## 1975年

9月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规模大，与会的有省、地、县三级党委书记，各有关部门、战线的代表共3800人。韶关代表20人，有地委书记李海涛，各县县委书记。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分二段进行，9月15日在昔阳县开幕，邓小平作了讲话，参观了大寨大队及昔阳县的一些社队，听取了他们的经验介绍。第二段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作总结报告。邓小平讲话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他还指出，农业要整顿，实际上是要纠正

“左”倾错误。在会上邓小平与江青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邓小平讲话提出有些社队经济落后，负债很多，江青插话，胡说，实行废债，邓小平立即还击，说这是要经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当时我感到江青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在邓小平讲话时多次插话，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心中纳闷，不好明说。会议期间，连山县委书记刘先禄患病，住院医治，会后我代他到连山县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会议精神。

## 1976年

1月，任韶关地委办公室主任。

10月—1977年6月，任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浛洸公社工作团团长。工作团由地区机关干部组成，于10月在英德县新城集训。期间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工作团自动集合起来，在英德县城游行，欢呼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工作队入村，从生产入手，并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认真重视生产。当时正盛行集中全县或全社的劳力实行大兵团作战，我和张建勋等几个副团长思想一致，坚持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那时正是秋收冬种季节，社员生活困难，迫切要求解决口粮问题，而浛洸地区素有冬种小麦的习惯，于是我们决定大抓冬种，边秋收边冬种，种上的小麦面积超历史。该社已平整土地，冬季生产我们不搞大兵团作战搬土方，除派少部分劳力参加县社的水利工程外全社各队大搞肥料，大积土什肥并进行肥料的基本建设。同时还从外地购进了一批化肥，加之推广杂优良种，全社春收、夏收均获得丰收，春收增产6.7万斤，早稻增产2.1万斤，合计比上年增长7%（不含张陂公社）。

在运动中，地委一负责同志提出要合并生产队，扩大生产队规模，但我到生产队座谈，征求意见，社员反对，此事不了了之。在运动中依靠原有干部开展工作，没有伤害干部。我们在运动中做了二件错事：一是在1977年夏收期间关闭农贸市场，派工作队到多个人圩路口设卡，拦阻农民赴圩；第二件就是在处理公私关系时限制农民经营家庭副业，规定了经营数额，名之曰割资本主义尾巴。

## （十五）清“左”与改革

1978年

12月，任韶关地委农村工作部长，陈玉辉、贝扬任副部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对农村散播的流毒，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省委决定省、地、县三级恢复农村工作部。早在同年6月，地委召开了地、县、社三级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讲话，题目是：“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认真整顿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讲话批判了“四人帮”破坏农村工作，破坏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罪行，他们反对“农村六十条”，胡说按劳分配原则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是“工分挂帅”，经营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开展多种经营是“集体内部的资本主义”，规章制度是“管、卡、压”等等。我们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界限分辨清楚，把搞乱的东西纠正过来。要加强党对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的领导，大力建立、健全各项制度。

## 1979年

2月4日，参加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确定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建国以来我一直在农村工作，从1958年起任农村工作部长。用三中全会精神回顾一下历史经验，也许有裨益。

韶关地区同全国、全省一样，从1957年到1976年，农村中“左”倾错误延续了20年。“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左”倾错误已严重发生，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段落。前段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标志，在农村大刮“五风”。后段则以“四清（社教）”为主要标志，对基层干部作了一团漆黑的估计，“四清”运动推行“桃园经验”，对基层干部打击一大片。这段期间在党中央、毛泽东领导下，曾经作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进行整风整社，贯彻执行“农村六十条”，推广洲心经验，实行田间管理联产责任制，农村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纠“左”并不彻底，当“左”倾错误严重，日子不好过时，作一些让步，调整一些政策；当经济情况好转，又开展政治运动，重行“左”倾错误，反反复复，持续十年，根本原因是“左”倾思想未得到根本的转变。其实在1957年以前已发生过合作化速度过快的缺点。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长时间的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大体也可分为两段，前段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其实质是批判、否定“农村工作六十条”所规定的政策，其标志是实行“穷过渡”，部分大队实行大队核算，少



数公社实行公社核算。后段主要是开展“学大寨”和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大寨大队本是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后来变成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学大寨”，并把“学大寨”与基本路线教育扭在一起，“学大寨”已成为推行“左”倾错误的政治运动。

“左”倾错误带来重大危害。全区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农村收入低下，生活贫困。其贫困状况见下表：

时 间	1957 年	1976 年	增加数
按人平均总业产值	146.40 元	189.90 元	43.5 元
按人平均拥有粮食	635 斤	650 斤	15 斤
按人平均分配现金	68.8 元	70.1 元	1.3 元

二十年内有九个减产年。其中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工作指导有失误。部分地区农民生活水平低得可怜。1976年每人每月口粮不到30斤的有6404队，占24.2%；1976年合计全区历年超支户有27万户，占总户数的40.4%。超支的含义是社员一年收入的工分值（即现金），不足以支付低水平的口粮款，换句话说这27万多户社员一年劳动挣不够口粮款。全区分配最低的岩背公社每年每人平均分配只有27元，每个劳动日值只有几分钱。到1978年，全区人均分配达200元的只有6个生产队，其中最高分配水平的乐昌县新田硬生产队每人也只有326元。

“左”倾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根本原因有二：第一是长期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本来党的“八大”已

正确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但随后不久，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论断。从此把阶级斗争的理论越提越高，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思想认识上的原因。第二，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1962年“七千人大会”总结犯“大跃进”错误的原因已指出了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但其后不仅未得到改正，而且受到更严重的破坏。我党历史告诉我们，凡长期推行“左”倾路线和“左”倾错误的时候，都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见这里有一个体制问题，党和政府建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十分重要。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端正了路线，纠正了错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认识了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国发生了奇迹般的显著变化。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年思想上来了一个大飞跃，经济上上了一个大台阶，全民公认，举世公认。

## 1979年

到始兴陂田大队蹲点。遵照三中全会精神，思想解放，建立了“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这是农村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合法建立的联产到组责任制，取得了增产增收的明显效果。全队水稻增产9.4%，亩产跨双纲，达1703斤，全队总收入增长24.4%，社员人平分配156.8元。这一年全区实行联产到组责任制的有9300队，占31.2%，建立多种经营责任制的占80%。一月地委农村部编辑出版了《多种经营生产责任制汇

编》一书，总结推广各地包产到组，包产到人的经验。

同年秋，农村部委托地委党校举办各县、社经营管理干部学习班，我讲了话，动员大家认真学习四中全会公报，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必须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克服思想僵化的状态，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经济政策，围绕基本经济政策做好经营管理工作。允许一部份农民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社会主义政策，“劳动所得越富越好”。不得限制社员个人工分、口粮、现金，以及家庭副业收入的数量。

## 1980年

1月，在地常委扩大会议发言，总结了1979年农村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批判“左”倾错误，执行农村政策，搞好经营管理的经验。最突出的成绩是建立了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建立了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建立与不建立生产责任制大不一样，建立与不建立联产责任又大不一样，提出了一个看法：“生产责任制的核心是联产”，要坚定不移建立推广联产责任制。

11月，农村部编辑出版了《农业经营管理经验》，介绍各地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经验。

## 1981年

当时韶关有些地区实行“大包干”，干部对此议论纷纷，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有的人说，“大包干”是“低级形式”的管理方法，可在贫困地区实行，不能在平原富裕地区实行。是年冬我与本部刘国华等同志到阳山县黎埠公社实地调查实行“大包干”到户的情况（另有钟棉光等同志一组到

清远县石潭公社调查), 汇总写出“关于黎埠、石潭公社实行大包干情况的调查”。石潭公社是贫困社, 属石灰岩贫瘠山区, 黎埠公社是平原地区的粮产社, 他们实行“大包干”的责任制, 1979年试行, 1981年发展为主要形式, 两社实行后, 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 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 社员生活明显改善(见附表)。石潭公社历史上国家卖给农民返销粮, 最高一年为300万斤, 到1981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员除完成征购任务107万斤外, 还向国家卖议价粮420万斤。调查报告写了这结语: “一年多来的实践, 大包干生产效果极为显著, 深受广大社员的欢迎。它不但是解决‘三靠’(吃饭靠统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地区农民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 又是目前多数社、队农民致富的一种好方法”。

时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黎埠	石潭	黎埠	石潭	黎埠	石潭
公社名称	黎埠	石潭	黎埠	石潭	黎埠	石潭
粮食总产	2962万斤	2065万斤	4005万斤	2259万斤	4549万斤	2801万斤
社员人平口粮	554斤	428斤	635斤	469斤	750斤	577斤
社员人平分现金	84元	63元	115元	73元	201元	203元

韶关地区推行“大包干”遇到了阻力和困难, 有的负责人大力反对, 唱顺口溜, 说什么“七品芝麻官, 政策大放宽, 明明是单干, 还说大包干”。农民迫切要求实行“大包干”, 像潮水一般汹涌, 势不可挡, 谁也压制不了。“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到1982年5月, 全区已有27716队占总队数

84%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作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一直存在管理集中统一，分配上平均主义两大弊病，严重束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一贯要求包产到户。党内长期存在一种错误观念，“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复辟资本主义，这个观念根深蒂固，成为思想上的“紧箍咒”。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生产责任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农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集体和农民只是一种发包和承包的关系。任仲夷同志在党的十五大讨论发言，提及了韶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重大争论这件事。他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是冲破阻力和束缚，尤其是冲破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禁锢的结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只主张实行包产到组，其后允许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在改革过程中，农民广泛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党中央尊重群众的实践和创造，给予支持和肯定，这是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具体体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走出来的一条改革致富之路，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

## 1982年

到省委党校学习。韶关地区参加学习的有张建勋、吴翠美（女）、陈仲舒、沈会峰、郭宝、王东生等同志。经四个月学习，从理论上提高认识，从思想上肃清“左”的流毒。6月写了学习体会：谈农业的所有制与责任制，总结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认识了“左”倾错误的危害。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共同规律。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所阐明了的原理，但是我国的实践却出现了一种新情况，生产关系也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果超越了，生产力要受到破坏，这是马克思没有讲过的。因此，当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权力在手的时候，不可任意胡乱地改变生产关系，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韶关地区在1954年春试办农业合作社，工作谨慎，社办得好，随后合作化的进程实行“加速运动”，五年内不停顿地改变生产关系。初级社未巩固便转为高级社，随之又把高级社合并成大社，未巩固又全面实行合作化，1958年全区实现公社化，终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农村元气大伤。其教训是变革生产关系不是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发，而是从“一大二公”的原则出发，不管生产力的现实状态及其发展的需要，只一味追求所有制的“先进性”，似乎只要有了“先进”“高级”的所有制，生产力就可以大大发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就可实现，“共产主义就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这种观点错误就在于它颠倒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必须与这一基本国情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格局，生产力蓬勃发展，国力大大增强。韶关地区粮食从1978年起连续四年增产，1981年达到了34.59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是韶关地区合作化以来粮食产量的第三个高峰，韶关地区的实践也证明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性。

7月任韶关专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 1983 年

5 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89 年 12 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主持研究、编纂中共广东党史。1987 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第六届委员。1994 年 1 月离休。

附注：1. 1949 年冬至八十年代初韶关地区管辖范围含现韶关市和清远市全部地区。

2. 全区统计资料来源：韶关地区计划委员会（1978.5）《韶关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韶关专署统计局（1965.3）《韶关专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地委农村部（1979.4）《韶关地区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统计资料》。

（作者：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 粤北地区文物普查工作述略

罗耀辉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粤北地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文物普查活动。这场内容丰富、历时多年的普查活动，既是粤北文物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粤北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十多年后的今天回顾它，更觉其意义之深长。

这次文物普查活动，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78年11月至1981年10月为第一阶段，普查的内容限于革命文物，是韶关地区自行组织的，1978年11月14日印发的韶地字[1978]66号文，是这项活动在全区范围内正式铺开的标志；1981年11月至1984年底为第二阶段。此期间，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9号文件的精神，全国都在开展文物普查活动，内容是全方位的。这一阶段的普查活动，是在省文物普查办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

笔者自始至终参加了这项活动，是粤北文物普查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和参加者。现就记忆所及，对其全过程作个简要的回顾。由于手头资料缺乏，难免有遗漏差错之处，诚望当



年的同仁予以指正。

—

韶关地、市合并以前，我在韶关地区文化局社文科工作，分管文物和图书的业务。打倒“四人帮”后，全国文物战线出现了抢救革命文物的热潮，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粤北是革命老区，全区人民有着长期的英勇的革命斗争历史，革命的遗址、遗迹十分丰富。但长期以来，由于左的路线的干扰破坏，各地对革命文物一直没有开展过全面系统的调查征集工作。随着岁月的推移，许多亲身参加当年革命斗争活动的老同志都相继逝世了，这项工作再不抓紧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我在初步的调查实践中体会到，这项活动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没有各有关部门的共同行动是难以奏效的。基于这种考虑，韶关地区文化局向地委提出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革命史迹调查活动的建议，得到地委领导的采纳。地委于1978年11月14日印发了《中共韶关地委关于开展革命历史和革命文物调查活动的通知》（韶地字〔1978〕66号文），成立了由地委副书记涂锡鹏任组长，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昶任副组长的“韶关地区革命历史和革命文物调查整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地区革史办”）组织实施具体的业务活动。革史办由地办副主任吴庆贵任主任，文化局、民政局、档案馆、党校等单位的一名负责人任副主任。办公地点设在文化局内。《通知》要求地属革命史迹较多的县参照地区的做法，成立相应的机构，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有分工地开展调查征集工作。同时强调指出：“为了便于文物的保护和利用，防止文物的流散，征集文物工作宜由地、县文

化部门专门负责。”

地委的66号文，掀起了粤北革命史迹调查征集活动的热潮。据统计，至1979年底，以县委或县革委名义印发专门文件的有乐昌、南雄、翁源、英德、清远、连县、阳山、佛冈、仁化等9个县，大多参照地区的做法，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由一名县委副书记或常委担任组长，下设主持日常业务工作的办公室，配备了专职的工作人员。由于组织比较落实，业务人员比较得力，因而调查征集活动开展得比较扎实，成效比较显著，至1980年，全区各县调查和征集到的文史资料达上百万字，收集到各种革命文物（含革命的宣传品、军需品、武器弹药、生活用品，烈士的遗照、遗书等）共300多件，新发现的革命标语100多条。有些文物很有研究价值，如乐昌征集的红七军战士穿过的棉背心、用过的马灯、时钟、水葫芦和中央红军长征过乐昌时埋下的铸有红五角星徽记的红军自制的手榴弹等10余件文物标本，为研究当年红军在粤北的活动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调查征集活动在全区广大群众和许多曾在粤北战斗过的老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些高级干部回函欢迎采访，有些老同志接到采访公函后，向组织上请假写回忆录，还有老干部主动找当年的老战友联系，共同回忆革命往事。乳源县铁龙头村的群众，当年为掩护红七军的40多名伤病员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两次烧村，残废50多人，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支悲壮的军民曲。解放前，这个村被国民党骂作“土匪窝”，解放后二、三十年却无人过问，直到这次革命史迹调查活动，他们的光荣村史才为世人所知。所以当调查人员去采访时，全村欢腾，象过年节一样喜庆。我也去过该村，感受很深。我在南雄油山革命老区调查时，老区干部群众对当年

红军和游击队的深切怀念之情，令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韶关地区有组织、有领导的全面开展革命史迹的调查征集活动，也引起了省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赞赏，广东省1980年第11期《文博通讯》曾对此作过专题报道，广东省文化局（即现在的文化厅）因此而对韶关地区增拨了文物专款。

这中间有个重要的“插曲”要交代一下。由于1978年到1979年韶关地区及其9个属县成立了革命史迹调查征集的专门机构，地区文化局还同时成立了与社文科合署办公的“韶关地区文物管理办公室（简称“地区文物办”）。此机构是不配编制的虚设机构，目的在于方便对外联系和争取省文物主管部门的经费支持），省文化局便在下拨1980年文化经费时特意给韶关地区加拨文物经费1.4万元。这笔款项是带帽下达的，指定给韶关地区文化局4000元，南雄、清远各1500元，其它7个有专门机构的县各1000元。没想到1981年财政体制改革，实行“分灶吃饭”，这笔临时拨款变成包干基数固定下来了。这让我们韶关地区文化部门占了一点小小的便宜。依时下的物价指数看，这点经费是少得足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在八十年代初期，机关干部人均年工资收入只有几百元的情况下，这点钱还是蛮管用的。那几年，地区文物办因有4000元可支配的业务专款，不仅增加了开展业务活动的主动权，还添置了少许“家当”哩！始兴县的革命史迹本来很丰富，但该县拖迟到1980年才成立专门机构，希望1981年能得到省拨专款，结果却因财政体制改革而落空，该县文化部门甚感遗憾。

1980年以后，革命史迹调查征集活动的重点转入了史料的整理、编印和文物的保护、宣传。这期间，起步虽晚的始兴县却以奋起直追的劲头赶了上来，该县到1981年底已铅印

出版了5期《始兴革命斗争资料》，计达15万余字，令各县刮目相看。革命史迹的调查推动了专门机构的建立，1981年以后，各县相继成立了党史研究机构，原在革史办从事史料工作的同志顺理成章地转到了党史部门，有关的革命史料亦随之转走，革史办这个临时机构便完成了历史使命。

地区革史办的日常业务，实际上由马旅同志负责。马旅同志虽然只是个副主任，但因这个调查活动是文化局发起的，办公室又设在文化局内，所以实际上的领导责任就落到了他的头上。马副局长本身搞过革命武装斗争，他对革命史迹的调查征集工作既热心又内行，是个称职的负责人。我是在马副局长的总体部署下和梁棧文科长的具体安排下从事具体的业务调查活动的。地区这一级的革史办，主要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做好协调工作。地区各有关部门的配合，地县两级的分工，都通过我们这个办公室去联络和协调。二是组织业务交流活动。地区革史办每年开一、二次全市性的业务会议，以传递信息，交流情况，相互启发，相互促进。三是组织重点调查活动。例如，抗战时期的北江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及活动情况，是全区各县在调查中都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时，退居在广西南宁的黄松坚同志，从抗战初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担任北江特委书记职务，因而成为各县都要采访的中心人物。但黄长期疾病缠身，健康情况极差，不能重复接待多批来访人员。为此，1980年夏，马旅同志亲自带队，组织有清远、英德、连县、南雄四县业务人员参加的联合调查组赴南宁采访，经过前后近一个星期的断断续续的面访（根据黄老当时的身体状况，我们每次采访都不超过两个小时），终于抢救到了这件各县都急需了解的党史资料。

1981年11月4日，韶关行署发文成立韶关地区文物普

查领导小组，组织实施开展全面的文物普查工作，成立于1978年的革命史迹调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至此已完成了历史使命。马旅同志担任新成立的地区文物普查办主任。不久，他奉调去新成立的党史办主持工作，我将几年来地区革史办所收集整理革命资料清点造册，悉数移交于马旅同志。后听马旅同志传达说，地委副书记李凌冰同志在地区首次党史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对我们1978年以来的调查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我们的调查成果为党史研究工作“打了基础，立了头功”。我当时听了，心里头确实涌泛出一股热乎乎的暖流。

回顾这三年多的日子，我感到很辛苦，也觉得很充实。为了收集中央红军在粤北的革命史迹，我曾多次深入南雄、仁化、乐昌的边远山区，油山、梅岭（属南雄）、犁壁岭、铜鼓山（属仁化）、大王山、九峰山（属乐昌）等僻远的山径上，留下了我的寻觅当年红军留痕的足迹。在多数情况下有县里的同志陪我前往，但也有所在县一时抽不出人来的时候，那就得只身前往了。在这三年多的调查征集活动中，我亲自参与完成的任务中，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情：

1. 收集编印了一本以红军遗墨照片为主要内容的《粤北红军标语选》。该书收集了68条红军标语，2张红军文告，3首红军歌谣和1幅红军漫画，并穿插了一部分革命遗址、遗物的照片。为了便于读者的学习和研究，每幅标语照片都附有录文和说明。该书于1981年出版，共印1000册，发行到粤北各县及有关单位、有关乡镇和一些在粤北战斗过的红军老干部，还应求奉送多册给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军事博物馆。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这本资料颇受欢迎。记得南雄县党史办因很多老干部向他们索要，特向我们求授，我

们将大部分库存品送给了他们。1980年还保留这些标语的民房，现在可能大部分被拆除了，那么，这本照片资料就更显得珍贵了。这本资料在收集编印过程中，得到很多部门和同志的支持协助，其中，沈杨（时为乐昌县文化馆业务干部）、沈学溪（时为南雄县文化馆业务干部）俩同志出力尤大。

2. 亲自征集到一批很有价值的红军文物。1980年夏，我和南雄县文化局雷时仲同志在南亩公社鱼鲜大队征集到一只红军锅（锅底已破穿），据当地老人回忆，是当年打水口的中央红军（当地群众称大红军）留下来的。这是迄今仅有的一件水口战役的红军文物。同年秋，我与沈杨同志在乐昌五山调查红军标语时，在五山上黎村征集到9支红军枪支，是当地群众1978年春开挖水沟时发现的。这批枪支，枪托已朽，只剩长短不一的枪管，枪管上均无枪机，说明是有意去掉的。据当地群众反映，1934年初冬红军长征过五山时，曾在上黎村设立过临时指挥所。据此判断，这批枪支显然是红军精减行装时有意埋下的。在五山坪田村黄胜昌老人家里，我们发现当年红军清留下来的两只箩筐，一只口径为42厘米，高38厘米，底呈方形；另一只口径为50厘米，高31厘米，园底、有盖，系用竹篾、棕丝混编而成。箩筐中存有5张复写纸，规格为26×20（厘米），色呈紫兰。其中3张作过复写表格用，留痕仍存；另两张曾用作复写军令，正文留痕虽很模糊，但末尾的两行署名：“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却很清晰。这两只箩筐和留有字痕的复写纸，不仅证明了乐昌五山是当年红九军团长征中的途经之地，而且还录载着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我们通过技术处理，将复写纸上的留痕拍成了照片，并基本上认录出来，经整理，发现是红九军团的一份《通令》和两份《命令》。《通令》的内容是

要求各部队做好内部的保密工作，《命令》之一是关于各师部挑选上送军团部受训的学员的条件和分配名额，《命令》之二是一次作战行军各部队跟进顺序的安排。这些军令是红九军团于1934年上半年驻守福建宁化时拟发的。因为复写字不能久存，且《通令》的附令二还有“看完后立即焚烧”的指令，故可推知，这几项军令早已无存于世了，那么，我们发现的这几张复写纸上的军令留痕，当是研究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红九军团军事活动情况的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3. 协助韶关地区和南雄县的民政部门为南雄湖口抚养毛泽覃烈士遗孤的老人落实了养老政策。早在地委行文前，我就开始了红军史迹的调查工作。1978年夏，我与省博物馆孙曼云同志在南雄县调查时听到一个传闻，说是该县湖口有个阿婆自称抚养过毛主席兄弟的女儿。我们闻风而动，直赴湖口采访。听了当事人的情况介绍，我们认为合乎情理，并初步断定被抚养长大的贺海峰是毛泽覃烈士的遗腹子。这位阿婆当年遵照地下党人曾昭慈（南雄湖口人，古柏同志的爱人）的嘱咐，将烈士的婴儿认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而忍痛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悄悄地远送他人带养，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牺牲精神啊！她在担惊受怕中熬过了14个年头，终于将烈士的遗孤抚养成人，实属不易！象这样一位对革命有功的人，解放后理应受到人民政府的优抚和当地群众的尊敬。但却因其土改时划为富农而无人问津，甚至还有人嘲讽她抱养的孩子是“野种”，真叫人寒心！目睹阿婆的酸苦状况，我当时的心里很不好受，很想帮帮这位老人。是年秋，适逢中央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工作会议，韶关地区民政局奉派领导出席，我认为机会来了，便将调查情况速写成一份材料交地区民政局张局长带去北京。在北京开会期间，张局长就此事会晤了参



加会议的上海市民政局长，上海市民政局答应鼎力相助。会后，张局长即赴上海，在上海民政部门的帮助下，通过上海市组织部门找到了贺海峰本人，贺肯定情况属实。她很怀念南雄湖口的养母，六十年代初曾不时地给养母寄些零花钱，后来结婚生孩子了，经济负担重，便没有再寄了。她那样的特殊家庭背景，在“文革”前是不允许对外公开的，因而又不能通过组织出具证明而使养母得到当地政府的优抚关照，她常为此而内疚。现在见到当地民政部门领导亲自核实她养母的事迹，她很感谢，马上通过组织出具了证明材料。从上海调查回来，张局长与南雄县民政部门的同志共同努力，很快地就为贺海峰同志的养母落实了优抚政策。1987年贺海峰同志回南雄看望养母，见养母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她很高兴，对当地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 二

为了贯彻国务院国发[1981]9号文件的指示精神，广东省人民政府于是年9月10日拟发了粤府[1981]190号文，通知“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文物普查工作。”接到省府通知后，韶关行署于是年11月4日印发了韶地政发[1981]90号文，成立了由副专员张乐民任组长，军分区政委卢绍络、行署办主任孙明远、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江任副组长，地区计委、财委、民政局、文化局、教育局、财政局、档案处、地委党校、统战部等单位的一名负责人为成员的阵容强大的“韶关地区文物普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地区文物普查办”）以主持日常的业务工作。办公室设在文化局内，由马旅副局长任主任（马不久调去党史办，由



肖学信副局长接任)，梁棧文科长任副主任，开始时业务人员仅我一人，后来增加了陈松南同志。

作为主持日常业务工作的地区文物普查办，它在成立的头几个月里，主要的任务是拟订工作方案，收集普查用的文献资料，置办普查用具和筹备办班事宜。1982年2月17日，领导小组召开首次全体成员会议，中心议题是审议通过我办起草的《韶关地区文物普查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分普查要求、方式步骤、时间安排、组织领导、经费预算等五个部分，甚为详尽。领导小组成员们审看后原则上通过，后以韶关行署[1982]22号文的形式印发各县，作为全区文物普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张乐民同志亲自主持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讲了三条意见，既精确又实在，感情很投入，如要求各有关部门关心支持文物普查工作时，他是这样说的：“在座的都是各部门的负责人，既然行署发了文件指令我们作为领导小组成员，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讲到普查经费时，他是这样表态的：“地方财政要给予必要的支持，不要一毛不拔。现在，各种经费都由地方包干，地方财政的压力是很大的，不过，该花的钱还得天花。另外，也希望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支持。”张副专员的讲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会后不久他就告诉我们说，先给你们5,000元，你们要注意节约，勤俭办事。

根据《实施方案》的预定计划，1982年3月25日至4月15日，我们用了21天的时间在始兴县举办全区文物普查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很关键。为了搞好这次培训，我们特邀请省文物普查办主任张春芳亲临指导，由他宣讲文物普查的意义和要求；并请省博物馆学识丰富的考古专家杨式挺同志担任主讲。我们进行了古文化遗址、古道、古关、古建筑、古

矿场遗址、古生动物化石、石陶瓷鉴定、粤北革命史迹等 15 个专业课目的教学，同时结合教学组织了参观和实习活动，使来自全区十二个县（缺连南县）的 26 名学员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并掌握了初步的文物普查知识，为在全区范围内铺开业务活动准备了骨干力量。在我主办的几个业务培训班中，这是历时最长也是最成功的一期班。参加办班的学员回县后，不仅成了文物普查的积极分子，而且大多数至今仍战斗在文博战线，成为粤北文物考古的精英力量，其中担任县博物馆领导的有廖晋雄、沈学文、沈国英、邹绍光、林美珍、张树棠等人，还有英德的区坚刚，他现在已是主管文博工作的副局长了。

当时省文物普查办在全省抓了四个试点县，韶关市的曲江是其中之一。我们仿照省的做法，把先行点定在始兴。这是因为相对而言，始兴县的专业力量比较强，同时很关键的一条是该县的领导很重视，县长梁时坚亲自担任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的组长。在全区文物普查训练班结束后的第 11 天（4 月 26 日），我便组织英德、南雄、翁源的 4 名业务人员会同始兴的 7 名同志共 11 人进抵该县顿岗公社开展试点工作，历时 12 天，基本上完成了该地的普查任务，达到了训练队伍、摸索路子的目的。

在这次试点工作中，我们在寨头张尾村找到了一处战国墓地，收集到的青铜兵器有：铜剑 3 件、铜匕首 2 件、铜矛 4 件、铜砭 1 件和 8 件完整的战国陶器。战国墓地的发现，在始兴尚属首次，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消息传开，县城轰动。翌日，副县长江流率县宣传文化部门领导赶赴现场祝贺并给交献文物的村民颁奖，将我们的试点工作推向了高潮。是年 5 月，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县工作汇报会在广州召开，当会议主

持者获知始兴发现战国文物的信息时，即电告始兴县文化局派员护送文物赴会展示，给汇报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更有趣味的是，当始兴县领导听说省里要看他们的战国文物时，忙叮嘱县文化局长卫少梅千万要携“宝”回来，不能交给省里，并答应批拨经费盖文物陈列馆；省文物办领导听说始兴下决心建馆，非常高兴，当即表态先拨3万元予以支持。粤北第一座县级博物馆设施就是在这种戏剧性的气氛中上马的。

通过办班和试点的推动，文物普查工作逐步在全区铺开。地区文物普查办除编印简报指导面上的工作外，更紧要的任务是深入各县检查督促和帮助他们开展试查工作。但那时干实际业务的仍然只我一人，故忙得分不开身来，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3、4月泡在始兴办班和搞试点，5月2日刚结束试点工作即赶赴广州参加全省普查试点县工作汇报会，回来又赴南雄了解工作动态；6月进连山与该县老周一同踏勘县城环近的古文化遗址，返途小住连州，带该县的新同志搞试查；7月应翁源文物干部之请，与他们冒着盛暑骄阳试查了六里公社的文物古迹，并回县城搞了个小型的试查成果汇报展；8月筹备并召开全区文物普查工作汇报会，进一步造舆论推动面上工作的迅速开展；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赴阳山给该县普查班学员讲课并随之与县普查队下七拱、新圩搞野外调查，从而揭开了阳山县文物普查工作的帷幕；10月底参加乐昌县的文物普查动员会议，11月到清远县催促文物普查的开展；12月和陈松南同志率乳源、连山、连南三县文物干部会同连县普查队在该县附城公社（今连州镇）搞示范性普查，历时半个多月，返韶已是年底。1982年中的我，委实是超负荷地劳作。但那时候就是有一股“傻劲”，情绪饱满，不知疲倦。

1983年上半年，粤北政区变动，忽分忽并，动荡不定，地、

市两级的文物普查领导机构在政区变动的冲击波下名存实亡了。这给全区文物普查工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下半年地、市合并，原地、市所成立的两个专门机构便自然解散了，之后再未重建，文物普查工作由合并后新成立的韶关市文化局负责。此时的市文化局设立了专门的文物科，配有专职干部4人，力量大为增强。我和陈松南同志都在文物科工作。为了掀起新一轮的文物普查热潮，1983年10月，合并后新组建的韶关市文化局所召开的首次全市性文化工作会议就是文物普查工作会议，特要求各县文化局长带队参加会议。市文化局副局长戴振球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抓紧抓好文物普查工作的意见》的讲话，强调进一步学习有关文件精神，提高对文物普查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号召各县下决心建设一支能打硬仗的普查队伍，迅速行动起来，坚决按时按质地完成文物普查任务。当时根据省文物普查办的工作部署，我们提出各县要在1984年底以前基本完成野外调查任务。

这次会议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如原来进度过慢的乐昌县，会后调整了普查队伍，组织了精干的力量，紧锣密鼓，奋起直追，至1984年10月份就查完了全部的乡镇，资料工作也很扎实，名副其实地打了一个翻身仗，赢得了后来居上的荣耀。全市面积最大的英德县，普查的工作量相当一般县的两倍，加上该县1982年因严重水灾使普查工作被迫推迟了一年，因而他们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但他们仍然表示不拖全市的后腿，县文化局派出苏副局长“挂帅出征”，专抓文物普查工作，终于把进度赶了上来。至1984年底，全市基本上完成了野外普查的任务。

自1983年10月全市文物普查工作会议后，我们文物科也调整了工作方针：从“四面出击”转移到“重点帮促”，从

侧重抓进度转为侧重抓质量。根据这个指导思想，1984年4月中旬，我们在阳山县举办了专题的考古测绘训练班，聘请省博测绘行家前往授课，该班对提高各县普查资料工作的质量，大有裨益。南雄县由于种种原因，文物普查工作一直处于零敲碎打状态，缺乏应有的规模和声势，为了改变这种冷冷清清的局，1984年10月，我和陈松南同志会同该县雷时仲、陈宏富等同志组成地县联合普查队进抵乌迳公社调查，历时半个多月，发现汉代居住遗址、西晋墓葬等古代遗存，并抢救晋代文物20多件，对该县的文物普查工作有所促进。

据统计，三年来的文物普查工作，全市共组织121名专职和200多名兼职（多为乡镇文化站的专职干部）的文物普查队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艰苦细致地开展普查工作。地上的、地下的，历史的、革命的，生产的、生活的，民族的、民俗的，乃至古树奇花，地层、地貌等各个方面的实物资料，无不在他们的查访登记之列。他们的足迹深入到壮乡瑶寨、古寺幽洞，乃至时人罕至的荒山野岭，全市文物普查队步行调查的总里程达24,500多公里（以队为统计单位），查完的乡镇211个（不含划属广州的清远、佛冈二县的乡镇数，下同），占全市乡镇总数的91%；查完的管理区达1535个，占全市管理区总数的80%。在普查中，全市共拍摄文物照片5,100多张，绘图328幅，完成石刻拓片202张，填写各种调查表格729份，记录和整理的文字资料达120多万字。

这次文物普查，有不少新的发现。据统计，全市发现打制石器16件，第四纪古生动物化石62件；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物点92处，采集到新石器标本403件、陶片标本1616件；新发现古墓葬473座、古窑址148座、古村落遗址23处、古建筑物711座、古矿场遗址17处、古军事遗址23处、古

驿道 28 条、古碑刻 248 通、摩崖石刻 116 题，收集到各类历史文物（不含陶片标本）1, 500 余件。其中不少发现是很有价值的。1984 年省文物普查办举办“广东省文物普查成果展览”，韶关市选送了 165 件样品参展。在这 100 多件参展文物中，曲江的石琮，是全省新石器文物中的珍品；始兴的陶瓮，为当时广东发现的最大的战国陶器；连县东汉的青铜工艺品“朱雀玄武”，是全省绝无仅有的一个新品种。还有，英德连江口汉代遗址首次发现的铜、铁兵器，始兴的战国墓群和曲江马坝的青铜铙等，都是广东考古工作中的重要发现。南雄县大圻公社 10 数个恐龙脚印化石的发现，更是当时轰动省内外的考古要闻。

这次文物普查活动，取得了一举多得的效益。如，广泛地宣传了文物政策，有效地传播了文物知识；充实了党史研究资料，丰富了地方史志的内容；推动了名胜古迹的保护与利用，促进了地方旅游事业的发展，等等。但得益最大的还是文化部门。我们借助文物普查的东风，顺理成章地建立和健全了市县文博管理体制，组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文博工作队伍。普查前，全市只有曲江县博和韶关市博两个正式的文物机构，有文物干部 10 人；韶关地区属下各县均无博物馆，地区的文物管理办也是虚设的，从地到县只有兼管的文物干部，且人员换来换去，很不稳定。普查后，市文化局设有专管文物工作的业务科，各县都相继建立了博物馆机构，专职文博队伍迅速扩大，至今已发展到近 100 人（含韶关、清远两市）。虽然多数县级博物馆尚无独立的馆舍，但毕竟有了机构，有了编制和起码的经费，迈开了从无到有的关键性的一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文博事业的硬件建设也逐步得到加强。现在，粤北已有 7 个县（市）博物

馆有了独立的馆舍，且其中 5 个是新建的。可以说，通过文物普查工作的推进，文博事业已成为粤北文化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的部门，并日益显示其独特的宣传教育效益。

1984 年 12 月中旬，韶关市文化局隆重地召开了全市文物普查工作的总结、表彰大会，市文化局长肖卫邦以《丰硕的成果，坚实的基础》为题，对这次历史性的业务活动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为它划上了一个令人追怀的句号。

（作者：清远市政协文史委主任）

# 建国后举行的韶关专区第一届 人民体育运动大会

李璇光

## 李祥麟专员、刘昆林副专员主持开闭幕式

三十八年前，为迎接广东省第一届运动会的召开，检阅全区体育运动水平，进一步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普及，在经历过“大跃进”高潮后的1959年1月25日至31日（球类项目比赛）和2月7日至10日（田径、体操等项目比赛）在韶关市举行了建国后规模盛大的韶关专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运动会进行了田径、篮球等20个项目的比赛，有10个县、市代表队2,100多人参加，其中运动员有1,116人。

1月25日晚在灯光球场（体操室侧面）举行开幕式，韶关专员公署副专员刘昆林致开幕词后，并为首场篮球赛抛球开赛。2月10日晚在体操室举行闭幕式，由韶关专员公署专员李祥麟致闭幕词，并为各优胜队颁发奖旗、奖品。随后举行篮球友谊赛，由冠军队韶关市男子队对海南汀迈县队，韶关市队以85比79取胜。

运动会在场地设施简陋、物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举行。各



队运动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进取精神及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受到大会称赞。运动会取得丰硕成果，在韶关的体育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专员挂帅，成立筹委会，掀起全民体育热潮

为开好这届运动会，于1958年8月成立运动大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任由专署李祥麟专员担任，副主任由专署副专员刘昆林、韶关军分区司令员符振中、中共韶关地委宣传部长李凌冰、中共韶关市委书记郑长勤、专署文教局副局长陆奕年担任。委员有任春林（专署办公室）、刘维国（直属党委）、朱志明（专区工会办事处）、丘虹（专区妇联）、陈玉辉（共青团专区工委）、黄杰（韶关市委宣传部）及各县、市体委主任。秘书长为陆奕年、黄杰，副秘书长为江锦韶、赖铿。下设秘书科科长赖铿、宣传科科长江锦韶、竞赛科科长周子强及裁判委员会，主任为周子强。

筹委会成立后于9月份召开了全区体育工作会议，布署运动会有关选拔组队参赛事宜。全区掀起一股迎省运的全民体育锻炼热潮，热潮遍及城乡。各学校、机关、厂矿展开“劳卫制”（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等级运动员、普通射手达标锻炼。据年终统计在体育大跃进中全区建立体育协会15,431个，青少年业余体校11,827间，通过劳卫制各级标准的有828,302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的有90,038人。

## 县市组队 项目齐全

运动会以县、市为单位组成各项目代表队，当时行政区

域经过调整合并，专区所辖十个县市队参赛。即韶关市（含今曲江县、仁化县、乳源县）、连阳县（含今连州市、阳山、连南、连山）、南雄县（含今南雄市、始兴县）、乐昌县、英德县、清远县、翁源县、新丰县、龙川县、连平县（含今和平县）。

为全面发掘体育人才起见，运动会设置了 26 个竞赛项目，但实际只举行了 20 个项目。即 1 月 25 日至 31 日进行篮、排、足、乒乓、羽毛、手球、棒球（男子）、垒球（女子）等 8 项；2 月 7 日至 10 日进行田径、体操、自行车、举重、射击、航空模型、武术、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击剑、拳击、摔跤等 12 项。原设的网球、技巧、围棋、射箭因报名人数不足而取消，原定在五月进行的游泳、水球也因国家经济生活困难而取消。

比赛场地因陋就简，分散在人民广场（今中山公园）、体操室、灯光球场（体操室侧面今扩建为道路）、市工人文化宫、韶州师范、韶关中学（今市一中）、中山公园（今市府大院）和黄田坝靶场、帽子峰靶场等。各代表队则安排在韶州师范和韶关中学住宿。

## 抽调裁判人员 团体总分排名

为保证各项竞赛顺利进行，从各学校、机关、厂矿抽调 200 多名裁判人员，组成裁判委员会，下设 16 个裁判组。各组设裁判长负责各项目竞赛及评分。各项目总分之和各队的团体总分。担任各项目裁判长职责的分别是：

田径、自行车：廖振纲、刘明恩（径赛）、司徒显（田赛）

体操：张慕荣

篮球：张绍环、俞德成

乒乓球：梁 权

排球：刘明恩、高佑润

足球：司徒显

羽毛球：梁伯杰、罗尚贵

手球：余道鹏

拳击：黄金安

棒球、垒球：王贤忠

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杨君毅、刘大中

射击：罗冲林

摔跤、武术：刘跃祥

举重：袁国勤

航空模型、击剑：另定。

各代表队团体总分排名如下：

- |                   |                  |
|-------------------|------------------|
| 第一名：韶关市 1269.25 分 | 第六名：英德县 162.5 分  |
| 第二名：连阳县 346.5 分   | 第七名：乐昌县 143 分    |
| 第三名：龙川县 321 分     | 第八名：河源县 112.25 分 |
| 第四名：翁源县 244 分     | 第九名：连平县 106.5 分  |
| 第五名：清远县 203 分     | 第十名：南雄县 65 分     |

各代表队参赛项目运动员人数分别是：

韶关市 223 人；龙川县 160 人；连阳县 152 人；河源县 138 人；翁源县 90 人；乐昌县 80 人；英德县 78 人；清远县 77 人；南雄县 73 人；连平县 45 人。

田径赛是主要项目，单项取前六名，单独计算团体总分。各队名次如下：

第一名：韶关市 272 分  
第二名：龙川县 176 分  
第三名：连阳县 159 分  
第四名：清远县 112 分  
第五名：乐昌县 94 分

第六名：连平县 91.5 分  
第七名：翁源县 90 分  
第八名：英德县 85.5 分  
第九名：河源县 32 分  
第十名：南雄县 22 分

各单项竞赛名次：

1. 篮球：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男子： 韶关 清远 连阳 龙川 乐昌 河源

女子： 韶关 乐昌 河源 英德 清远 龙川

2. 排球：

男子：

韶关 河源 龙川 英德 翁源 南雄

女子：

韶关 龙川

3. 足球：

韶关 龙川 翁源 乐昌 连阳 河源

4. 手球：

男子：

韶关 龙川 翁源 连阳

女子：

韶关 连阳 龙川

5. 棒球：

男子：

韶关 河源 连阳

6. 垒球：

女子：

韶关 连阳 河源

7. 乒乓球：

男单：

1. 邓海帆（韶关）；2. 朱李明（韶关）；3. 卓少新（清远）；4. 叶寿松（韶关）；5. 胡自珍（翁源）；6. 刘伟良（乐昌）

女单：

1. 李楚玉（韶关）；2. 何佩贤（韶关）；3. 李玉珍（韶关）；4. 周巧兰（清远）；5. 张和梅（英德）；6. 邓瑞华（河源）

男双：

1. 朱李明/叶寿松（韶关）；2. 卓少新/胡家湘（清远）；3. 江显平/刘伟良（乐昌）

女双：

1. 李楚玉/何佩贤（韶关）；2. 周巧兰/王秀銮（清远）；3. 张和梅/朱惠贞（英德）

混双：

1. 朱李明/李玉珍（韶关）；2. 邓海帆/李楚玉（韶关）；3. 卓少新/周巧兰（清远）

8. 羽毛球：

男单：

1. 杜结全（韶关）；2. 戴应祥（翁源）；3. 陈毕科（翁源）；4. 钟仁英（韶关）；5. 饶文寿（乐昌）；6. 梁务美（清

远)

女单:

1. 李莲好 (韶关);
2. 何秀莲 (翁源);
3. 王玉莲 (翁源);
4. 罗佩珠 (韶关);
5. 黄文娥 (乐昌);
6. 刘良玉 (清远)

男双:

1. 杜结全/钟仕英 (韶关);
2. 陈毕科/戴应祥 (翁源);
3. 饶文寿/吴伟清 (乐昌)

女双:

1. 李莲好/罗佩珠 (韶关);
2. 何秀莲/王玉莲 (翁源)
3. 黄文娥/李石莲 (乐昌)

混双:

1. 杜结全/李莲好 (韶关);
2. 戴应祥/王玉莲 (翁源);
3. 陈毕科/周秀莲 (翁源)

9. 田径 (取前六名, 下列为第一名成绩)

男子:

100 米	郑土成 (连阳)	11"5
200 米	郑土成 (连阳)	25"1
400 米	王廷衡 (韶关)	55"1
800 米	魏成姐 (龙川)	2'10"4
1500 米	陈继安 (乐昌)	4'32"5
3000 米	曾业新 (清远)	9'40"4
5000 米	许志新 (翁源)	16'33"6
10000 米	许志新 (翁源)	34'7"6
4×400 未接力	韶关队	48"3
4×400 未接力	韶关队	3'52"4
10 公里竞走	沈葛球 (连阳)	38'55"4

110米高栏	吴桂荣(韶关)	20"3
200米低栏	袁学玲(韶关)	29"
400米中栏	袁学玲(韶关)	1'5"8
马拉松跑	王正衡(龙川)	2.42'9"4
跳高	郑礼洋(河源)	1.58米
跳远	刘庆泉(连平)	5.89米
撑竿跳高	钟征祥(翁源)	3.21米
三级跳远	杨凯文(龙川)	12.93米
铅球	杨北青(英德)	9.82米
铁饼	杨国才(连阳)	28.33米
标枪	杨健南(翁源)	44.23米
手链球	杨国才(连阳)	23.57米
手榴弹	谢汉坚(翁源)	58.40米
五项全能	徐秀仁(连阳)	1485分
十项全能	林兴邦(龙川)	2506分
女子:		
100米	梁少玲(连阳)	14"4
200米	梁少玲(连阳)	30"5
400米	廖玉英(乐昌)	1'9"
800米	廖玉英(乐昌)	2'40"1
80米低栏	缪文梨(韶关)	15"
4×100米接力	连阳队	59"7
4×400米接力	连阳队	2'5"6
跳高	陈心如(韶关)	1.30米
跳远	陈心如(韶关)	4.41米
铅球	苏玉英(韶关)	9.21米
铁饼	冯婉文(清远)	26.34米

标枪	林秋容 (韶关)	27.10 米
手榴弹	林秋容 (韶关)	40.40 米
三项全能	冯婉文 (清远)	1688 分
五项全能	袁杏英 (乐昌)	2656 分

#### 10. 体操 (仅列前三名)

男子健将级:

双杠、鞍马、吊环、自由体操、全能:

1. 张广焯 (韶关); 2. 潘光镛 (韶关)

单杠、跳马:

1. 潘光镛 (韶关); 2. 张广焯 (韶关)

男子一级:

双杠:

1. 刘景森 (韶关); 2. 陈木林 (河源)

鞍马:

1. 刘景森 (韶关); 2. 丘耀秋 (连阳); 3. 黄宇仪 (清远)

吊环:

1. 刘景森 (韶关); 2. 陈木林 (河源); 3. 梁品心 (韶关)

自由体操:

1. 刘景森 (韶关); 2. 梁华林 (韶关); 3. 梁品心 (韶关)

单杠:

1. 刘景森 (韶关); 2. 梁华林 (韶关); 3. 黎强华 (韶关)

跳马:

1. 刘景森 (韶关); 2. 梁品心 (韶关); 3. 杨锦泉 (连



阳)

全能:

1. 刘景森 (韶关); 2. 梁品心 (韶关); 3. 黎强华 (韶关)

女子健将级:

高低杠:

1. 汤仲娴 (连阳); 2. 农国荣 (韶关)

平衡木:

1. 农国荣 (韶关); 2. 汤仲娴 (连阳)

自由体操:

1. 汤仲娴 (连阳); 2. 农国荣 (韶关)

跳跃:

1. 汤仲娴 (连阳); 2. 农国荣 (韶关)

全能:

1. 汤仲娴 (连阳); 2. 农国荣 (韶关)

女子一级:

高低杠:

1. 潘玉葵 (韶关); 2. 陈群英 (韶关); 3. 李燕菲 (韶关)

平衡木:

1. 陈群英 (韶关); 2. 潘玉葵 (韶关); 3. 李燕菲 (韶关)

自由体操:

1. 潘玉葵 (韶关); 2. 陈宝综 (韶关); 3. 陈群英 (韶关)

跳跃:

1. 潘玉葵 (韶关); 2. 陈宝综 (韶关); 3. 罗谭贞 (韶

关)

全能:

1. 潘玉葵 (韶关); 2. 陈群英 (韶关); 3. 陈宝综 (韶关)

11. 自行车: (仅列前三名)

男子跑道 1000 米:

1. 黄永梅 (龙川) 2'34"; 2. 廖永昌 (乐昌) 2'44"4;
3. 黄德长 (韶关) 2'55"

男子跑道 1500 米:

1. 黄德长 (韶关) 2'54"1; 2. 陈彬 (连阳) 2'55"6;
3. 龙立云 (南雄) 2'59"2

男子跑道 5000 米:

1. 黄永梅 (龙川) 10'48"2; 2. 黄太恒 (翁源) 11'13"8;
3. 廖永昌 (乐昌) 11'16"7

男子公路 100 公里:

1. 颜立民 (韶关) 3. 30'48"6; 2. 朱远生 (河源) 3. 30'49"
- 4; 3. 韦腓力 (韶关) 3. 30'49"4

女子跑道 1500 米:

1. 李桂兰 (韶关) 3'32"7; 2. 孙淑英 (连阳) 3'35"7

女子跑道 3000 米:

1. 叶金泰 (龙川) 6'53"8; 2. 李桂兰 (韶关) 7'11"7;
3. 孙淑英 (连阳) 7'16"5

女子跑道 5000 米:

1. 叶金泰 (龙川) 13'15"5

女子公路 25 公里:

1. 叶太英 (龙川) 54'18"8; 2. 李润群 (连阳) 61'14"4;
3. 温秋荣 (韶关) 61'46"5

女子公路 50 公里：

1. 黄若文（翁源）2.5'5"5；
2. 包莲好（韶关）2.12'17"

5

12. 航空模型：

二级牵引：

1. 陈居明（韶关）494 分；
2. 甘育裕（翁源）273 分；

3. 文剑泉（南雄）99 分

三级牵引：

1. 蓝振东（韶关）3333 分；
2. 丘琼凤（翁源）1856 分；

3. 陈德始（英德）69 分

二级橡筋动力：

1. 张多仁（韶关）378 分；
2. 宋国钧（翁源）280 分；

3. 陈如维（连阳）65 分

三级橡筋动力：

1. 何乃福（韶关）607.1 分；
2. 陈伟超（翁源）148.4 分

13. 射击：

小口径运动步枪（卧、跪、立 9+30）

男子：

1. 叶用林（韶关）220 环；
2. 江世荣（韶关）201 环；

3. 蔡世乙（韶关）201 环

女子：

1. 赖翠英（韶关）214 环；
2. 刘金芳（韶关）210 环；

3. 殷春仙（韶关）199 环

军用步枪：（卧姿 3+10）

男子：

1. 陈福临（韶关）90 环；
2. 吴新民（韶关）86 环；

3. 胡炳洋（韶关）84 环

14. 中国象棋：

1. 林星流（清远）；2. 陈绍兴（韶关）；3. 梁家尧（连阳）

15. 国际象棋：

1. 杨君毅（韶关）

16. 武术：

综合拳：

男子：

1. 麦振洪（清远）；2. 陈新祥（龙川）；3. 邬琼明（河源）

女子：

1. 冯玉英（连阳）

器械：

男子：

1. 麦振洪（清远）；2. 陈新祥（龙川）；3. 李振华（河源）

女子：

1. 冯玉英（连阳）

17. 举重：

最轻量级：

1. 陈明华（韶关）（62.5、67.5、80）210公斤；2. 陈绍光（韶关）（60、60、87.5）207.5公斤；3. 张汝根（翁源）（55、62.5、82.5）200公斤

次轻量级：

1. 黎子成（韶关）（75、75、90）240公斤；2. 刘焕章（龙川）（62.5、70、95）227.5公斤 3. 熊德星（连阳）（67.5、75、85）227.5公斤

轻量级：

1. 冯世荣（英德）（75、72.5、100）247.5 公斤；
2. 肖国福（韶关）（67.5、65、75）207.5 公斤；
3. 黄仲友（连阳）（55、60、87.5）202.5 公斤

中量级：

1. 常剑飞（英德）（67.5、62.5、92.5）222.5 公斤

18. 击剑：

轻剑：

男子：

1. 杨志强（韶关）；
2. 钟石育（龙川）；
3. 肖金贤（乐昌）

女子：

1. 李韶英（韶关）；
2. 陈秋凤（龙川）；
3. 陈爱英（连阳）

19. 摔跤：（中国式）

次最轻量级：

1. 黄铁南（韶关）；
2. 陈伦辉（南雄）；
3. 蔡高赐（英德）

最轻量级：

1. 张敏（韶关）；
2. 何贡（连阳）

次轻量级：

1. 陈盛琦（南雄）；

轻最级：

1. 叶继波（清远）

20. 拳击

最轻量级：

1. 朱雄（连阳）；
2. 叶显宗（龙川）

次轻量级：

1. 欧阳业祥（韶关）

轻量级：

1. 赵兆华（英德）

（作者：原韶关市体委干部）

# 回忆肩负神圣使命的 粤北机要交通局

林奕雄

传递党、政、军机要文件神圣使命的粤北机要交通局，于1953年2月1日成立。在此前，党、政、军的机要文件（机密、绝密，下同）传递任务，由人民解放军军邮局负责。为了加强保密工作，加强党对机要交通工作的领导，确保机要文件的安全传递，党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1953年1月决定，中央和省、地级党委成立机要交通局，将全国党、政、军的机要文件，交由机要交通局负责传递。依此，原粤北军区军邮分局官兵，基本上全体集体转业到粤北机要交通局。机要交通局在粤北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进行运作，业务工作接受中共华南分局机要交通局的指导和管理。运行四年多后的1957年4月，全国的机要交通工作即并入当地邮电局负责。

最近与以前在机要交通局工作的几位同志一起，畅叙往事，大家都认为四十余年前机要交通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值得一叙，默默奉献的精神应该一记。日转星移，时间已经过去四十余年，本来隐蔽的面目可以让人们所知。现将大家回忆的主要史实，整理综述如下：

## 精干的班子 务实的机构

一、局长办公室。有局长、干事各一人，财务二人（兼做事务长工作），后勤炊事员共四人。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上传下达，对外联络、疏通，构筑良好的安全的传递环境；对内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觉悟，增强保密观念和安全传递的使命感；检查监督安全制度的实施，协调好行政、业务、传递工作关系；办好生活福利工作。建局的一、二年仍保持军队的供给制及原有的管理制度，穿军装，基本上过着军事化生活。经费由行署（专署）财政局直拨，单独开户。

局长马立业同志，是粤北军区军邮分局局长，山东省人，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八路军，多次立功，是七处受伤的老革命。干事林奕雄。局长也是党支部书记，高度集中，一元化领导。

二、业务办公室。有陈秉务、邝大英等五位同志。主要任务是负责党政军县团级以上单位机要文件的接收、登记、分拣、密封发出。直接收投的单位有区党委（地委）各部、委、办、行署（专署）局、处级机关单位；军区（军分区）、炮师、驻粤北地区团以上部队，以及区属十九个县委机要收发室共近百个。每天收投的文件（包括经华南分局机要交通局转来的）有七、八百件。要求不得错登错发、漏登漏发，是极为细致的工作。业务人员每天除正常上班时间埋头苦干外，每个月都有20天以上的晚上要加班工作，而加班费仅有二角钱，够吃一碗云吞面。星期天也要上班封发市区外的文件，工作量可想而知是相当大的，但大家都无怨言。以忙为乐。

三、交通支队。其任务是安全传递机要文件。共有60多位交通员（干部待遇），下分四个分队。支队长是张陈保同志，



政治指导员是吴青同志，副支队长是郭太同志。四个分队长（股级待遇）分别是莫坤、林英、刘文、朱全同志。为了节约经费开支和人力的耗费，1954年4月在清远县源潭设立源潭机要交通站，负责传递清远、佛冈二县的机要文件。该站共有六位同志，陈秉力担任站长。

60多位同志大部分是从军区转业过来的，后来从县委机要室中挑选一部分交通员充实到局的交通队。90%以上的交通员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为提高交通员的文化素质，专门配备一名文化教员，对交通员进行文化教育。交通员每人配驳壳枪一支。

## 网点繁多，交通天天穿梭运行

近百个收投单位，每天收发文件七、八百件，要求文件及时传（投）递到收文单位，市区外的收投单位（包括华南分局机要交通局）不分节假日天天运行。交通员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穿梭在隐蔽的机要交通线上，经常是今晚胜利轻快返来，明早又负重谨慎出去。尽管如此，有较高素质的机要交通员，都是勤勤恳恳为完成党交给的神圣使命而贡献青春年华！

当时的交通线路走向是：

仁化、乳源、曲江、新丰四个县分别单独一条线。坐汽车往返（固定班次，固定坐位为一、二号）。

翁源、连平、和平三个县为一条线。分段坐火车、汽车、单车往返，即韶关坐火车到大坑口，转坐汽车经翁源到连平忠信，再换坐单车（当时不通汽车）到和平。

连县、连南、连山、阳山四个县为一条线。连南县（代

连山交接)到连县交接,连山县到连南交接。分段坐火车到坪石,转坐汽车到连县,从连县步行到阳山(有时也许碰上汽车搭到犁埠)。从阳山坐小船到连江口,再换坐火车返韶关。

从化、花县二个县一条线。坐火车去,在广州坐火车返韶关。

清远、佛冈由源潭交通站派员分别传递。

乐昌、英德分别设一个收投点。

发往粤北地区以外的文件,以及全国各地发给粤北区的文件均由华南分局机要交通局负责转运。中央机要交通总局每天派员坐京广线快车,固定车次固定软卧包厢往返广州北京。为节约经费开支,经与中央、华南局商定,乐昌县、韶关局、英德县、源潭站的文件分别在乐昌、韶关、英德、源潭火车站到车上与中央交通总局交通员交接。

## 严密的制度、严格的管理、严明的纪律

为确保机要文件的安全收发、传递,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纪律等。这些制度纪律比其它机关单位所制定的更为严密严格,一般人是难以接受,也难以做到的。在此,仅列其中几条如下:

收文双人制,即一人签收,一人校对复核分拣。

发文双人制,即一人登记,一人校对密封。

文件分类制,即机密文件、绝密文件分别登记、分别存放、分别密封。

传递文件双人制,凡是市区外的文件传递,必须双人武装同行。

外出逛街、买东西、散步,必须三人以上同行。

安全保密制度中有：

不得泄露本人和他人（本局人员）身份、任务、去向、班期。

谈恋爱、找对象、结婚必须先报告党组织审批。

管理制度中有：

出发回来要及时汇报执勤任务期间全过程的安全、保密、言行情况。

每星期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半个月上一次政治教育课，一个月结合实际上一次保密教育课。

每个月检查一次武器保养情况。

执行任务时要武器不离身，文件不离人，一旦发生意外，要人与文件共存亡。

各收投单位的机要收发人员，要报区机要交通局备案，非报备案人员不得交接文件。

纪律是极严格的，执行纪律一视同仁，极为严厉，其中规定泄密要处以开除出队，投送错文件要处以禁闭。如交通员成浮发，在传递连阳四县文件，途经连县星仔圩吃饭时与外人谈及自己出发的班期和汽车坐位号码，回单位后另一位同志汇报了，除成本人在大会上作检讨外，还给予开除出队回家务农处分（1982年经韶关地委办公室复查平反，收回办理离休）。又如交通员××传递连县、连南、连山、阳山四县文件时，将连南、连县的文件互相错送，而被处以禁闭七天。

当年70多位同志，在机要交通工作的四年多，与机要文件相依为命，工作在单调平凡但又很重要的机要交通保密战线上，埋头工作，小心谨慎，默默地护送了数以十万计的文件，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神圣使命。然而，他们许多可称颂的事迹，及他们在要求极严格的条件下，认真细致、高度

负责的精神，至今仍是少人知晓。40余年过去了，他们也很少谈及这段隐蔽的经历，而在各行各业忠心耿耿地为国家建设而努力。

至今尚健在的六十来位同志，已全部离退休了，过着清静而愉快的生活。

（作者：原韶关市政协副秘书长）

# 回忆三年土地改革历程

梁郁文

1950年12月20日，这一天是我们南方大学第二期同学难忘的日子。600多名校友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广州市黄沙火车站登上列车，于晚上12点到达了粤北重镇韶关市。后来始料不及的是落地生根，一辈子在粤北山区奋斗。起初校方动员我们，说“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嘱咐我们要为穷苦农民翻身作出贡献，一年半载后再回来完成革命政治大学的课程。我们因之非常乐意参加这场翻天覆地的群众运动。

我们的队伍分成若干分队，分头下到曲江县的各个区。当时曲江划分为六个区，我被分到第六区（现为樟市镇）去。解放初期，曲江土匪丛生，地主恶霸势力甚嚣尘上。土改工作队抵乡，当地的地主富农便出来放鞭炮欢迎。虽然领导在土改训练班上强调站稳阶级立场，分清敌我，可是我们这班初出校门的青年，没有经过实际锻炼，缺乏阶级斗争的体验，所以，土改斗争只走个过场，便查田定产，减租减息，分田分地，建立农会，宣布土改结束。1951年5月，参加曲江县的土改队伍，加上少数土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农民青年，除留下部份校友参加曲江县、区的政权组织工作外，其余就分头

到粤北各个县铺开土改工作。随后，中共粤北区党委、华南分局对曲江土改进行复查，发现严重“夹生饭”（土改不彻底），主要的是广大贫下中农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土匪没有肃清，恶霸没有斗垮，要重新进行清匪反霸、斗垮地主阶级的工作。由于我们已离开曲江，土改的复查便由曲江县另组队伍。经过华南分局的指导和曲江县委的努力，一年以后才真正把土改工作做好。

我们樟市区 200 多人的队伍离开曲江后转战到了新丰县。当时韶关没有公路和水道直达新丰，要绕道广州。由于广州至新丰的公路没有定期班车，加上道路也很崎岖，所以只 180 公里路程走了一整天才到达。我自小生长在广州，家乡也在珠江三角洲，未见过山有那么高，水有那么急。到达新丰县城，住在县委会。那里原是一间旧祠堂，条件很是艰苦，但领导早已作了充分思想动员，再艰苦的环境我们也能坚持下去。

新丰县是个典型丘陵山区，很难找到一处广阔的田野，人民生活相当贫苦，比之曲江有过之无不及。土改开始，县委确定在一区（附城区）和六区（梅坑区）作先行点。初拟半年后再铺开其余四个区，一年完成土改。不久华南分局要求各地土改不能走过场，要先行清匪反霸，然后进行土改。新丰县委按照华南分局的要求，清理急于求成的右倾麻痹思想，再三强调要深入发动贫下中农，彻底清匪反霸。在先行点组织了土改队。县武装大队、县区干部、乡村骨干、民兵、积极分子进行了一次搜山大行动，把解放初期的土匪、逃亡的地富分子进行搜捕，县人民法院配合行动，把捉拿到的逃亡分子一一绳之以法。从而消除了农民的顾虑，提高了阶级斗争的觉悟。经过土改队的深入工作和贫下中农的积极努力，先

行点在 1952 年中宣告土改胜利完成。

1952 年，华南分局加派了一批部队转业的南下干部到新丰，还派来曾在湖北工作的王云同志来当县委书记，派南下干部王文秀当县委副书记，既加强了土改工作队的力量，又加强了县的领导力量。他们到来后便铺开全县的土改工作，王云坐镇五区，王文秀坐镇四区。我当时在县土改委员会工作，负责编印土改快报和电话联络，跟着王云到五区，把唐村一个地主房子作土改临时总指挥部。当时由于有了第四次扩大会议的正确指导，又有了铺开工作的实际经验，于是全面土改工作进展顺利，有条不紊。到 1953 年春，全县土改胜利结束，经过区党委验收宣告土改完成。

在新丰县经历了两年多的土改，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土改斗争的反复、曲折，艰辛，直至取得胜利，是对我革命工作历程的一个大考验。在曲江初涉征途时，自己还很天真幼稚，在新丰才真正认识到革命工作的艰苦复杂。后来，南方大学通知我们所有参加土改的同学，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提前毕业，发给毕业证书。这样，我们回校读书的期望落空了。从此，服从组织的分配，扎根粤北大地。

1953 年 5 月我被调到粤北另一个县、即全省面积最大的英德县，安排在英德县委办公室工作。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县委抓中心工作。当时，英德县也是几经反复才初步完成了土改工作，县委的主要任务是复查土改的遗留问题，解决山林、水利、疆界的纠纷。我们土改的时候向农民宣传贫下中农一家亲，共享土改的胜利果实。可是土改分田分地以后，由于遗漏了对山林水利等的合理分配，引起了相当部分的村与村，族与族之间对山林、水利、辖区地界的争执纠纷，个别地方甚至为坏人挑拨，制造事端。因此，县委组织当时的县区乡

力量，重新查定山林、水利、疆界的划分。县委办公室也相应成立了一个检查组，帮助各区乡开展这项工作。直至1953年底，才较彻底地解决了土改的遗留问题，进入农村组织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的新阶段。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忆韶关中山公园的变迁和 政府机关驻地的更易

朱河生

现今，韶关的中山公园已非昔日可比，她经过异地迁建，变得规模大了，功能多了，面貌漂亮了。她的变迁说来有个漫长的过程，让我从原有的公园说起。

## 旧中山公园的概貌

往事如烟。旧中山公园原座落在市区小岛的北端，不少老人对公园旧貌还记忆犹新。当年公园周边有几座机关楼房和干部宿舍，一批南大校友曾住过这些旧址，在此生活和工作了大半辈子，为韶关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具体地说，旧中山公园位于市区风度北路北端，现已不复存在。原公园面积不足两万平方米，公园四周被马路围绕着，北端接壤中山路，东面（隔着一排小商铺）接民权路即今东堤中路，西临北直街，南面是风度北路末端。旧公园设施不多，有几棵年代古老的大榕树，以及一排排白玉兰、苦练、桉树、夹竹桃、观赏竹等树种。固定建筑物也少，园内

有一条贯通南北的混凝土小通道，只能行人，因路中间设数级台阶不能骑车通过。小道中间建有一个玲珑的八角亭，供游人憩息。建国初期通道上增添了一座缅怀解放韶关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的纪念碑，上面题刻《北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是当时粤北地区政府领导人何俊才题写的。此外公园里有小花坛、石坐椅、花草之类的配套建筑。公园的另一部分（即东侧）属于群众体育场地，坐北朝南建有司令台，以及足球、篮、排球场、双、单杆之类的体育设施，重大节日的群众性集会也在此地。当年，群众有这样一个休闲场所是很不错的了。

公园的南端正门两侧，与公园接壤的地方有些旧的建筑物，东面有一个两层的旧平房，解放初期曲江县政府就设在此地；西边是个干涸的鱼塘，也算是公园内的一部分，但却没有清理修整，雨天满塘积水和污泥垃圾。后来填平用来盖机关宿舍，这里的新旧宿舍我曾居住了近二十年。水塘南面接近北直街的地方，曾有一栋久远的木结构建筑物（地板和墙均为木质装修），新建成时候可能非常新颖豪华，据说是教会建筑的。传说孙中山先生当年路过韶关时曾居住过。始设市时，市委领导曾住此地及兼作办公室，直到六十年代才拆除建成新房。水塘北边还新建市图书馆，周边是市委部门的办公场所。这个群众曾经熟悉的旧公园在六十年代初期，就为机关占用，逐步扩大为政府办公驻地。据说，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对占用公园建机关大楼提出批评，促成中山公园南迁另建。

## 旧公园里志愿军英雄万人报告会

旧中山公园有个很值得怀念的韶关史实。背景是：解放战争胜利后，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美军很快越过三八线，进入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当时中国政府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等一道保家卫国，奋起抗击美帝，其时在韶关最为广泛的支持抗美援朝的行动是，自愿捐献飞机大炮（即捐钱）支援前线，我也捐助了自己的生活补贴费，表达了爱国行动。1952年夏天，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志愿军前线指挥部为答谢祖国大后方人民的大力支援，派出一批志愿军功臣代表回祖国向各界人民汇报前线战况。我记得当时前来韶关作报告的志愿军代表是董乐甫同志。这个有万人参加的大会，报告会场地址就在韶关市的旧中山公园的体育场。报告会场面非常严肃，隆重盛大，全市驻军、公安部队、驻韶关机关、单位、团体全部人员，还有居民、各县也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共达一万多人参加，听取志愿军代表讲前线战绩。他讲述的战斗故事非常感人，给市民们上了一次生动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课。那天，会上群众端庄整齐。主席台上就坐着各级党、政、军领导；听完报告后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可以说是旧中山公园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特别的报告会。至今仍珍藏着董乐甫英雄在主席台上演讲的雄姿英照和一大片端坐在操场上聆听报告的部分群众的两张非常难得、极其珍贵的照片。照片里留下一个志愿军英雄报告业绩和韶关人民热爱“最可爱的人”的感人场面，在韶关中山公园留下了永久的纪念。这个报告会还给韶关各界人民阐明了

毛主席曾预言过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

## 新中山公园等大小公园的建设

旧中山公园被用于机关驻地时，市政府已有计划将公园迁移到现中山公园地点兴建，继续占用旧公园扩建政府机关，同时，投入资金开辟新公园。南迁新建的中山公园原址，是一个无建筑物、无树木花草的大片旷野之地，地势平坦低洼，洪水期易淹易涝。五十年代韶关市区人口少，据1956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资料，韶关市区总人口包括郊区农民在内才六万多人。六十年代对老街道进行改造，新建了近万平方米的商铺民房，其资金来源还是陶铸同志主持省里工作时拨给的专项资金，当时这大块平坦土地，没有被商铺民房占用实在难得，政府就把这块十多万平方米的大场地开辟建设成新中山公园。由于资金短缺，始建时就发动群众种上树木花草、营造园林，逐步搞点配套设施，后来添了运动场，建起田径场、足球场和室内体育场馆，便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新中山公园。

建造新中山公园的大地坪，市民称叫它飞机场。据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预留作小型飞机场的。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后，省府搬来韶关，由于人口暴增，来韶关避难的达三十多万人，郊区各山头江边用木料树皮搭建了临时住屋居住。这里用作临时飞机场，才未曾为难民所占用。建国后曲江土改时，曾把这个飞机场用作刑场。1951年曾在此一次行刑就枪毙过49名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和反革命罪犯。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相应开展了文化建设。七、八十年代，政府先后依照市政建设规划蓝图和依照市区地形、区

域分布逐步建造了多个有特色的公园。如七十年代中期，在西郊沙湖利用小山塘山坡修建了沙湖公园。利用外汇贷款引进了多样娱乐设施，建了翻滚车、摩天轮、小火车、太空飞船、惊心屋、鬼怪屋、旋转珍珠贝、水上娱乐等设备。解放军赠送给韶关人民纪念的已退役的喷气式战斗机，也放在这个公园供市民参观，大小山头通过封山育林已绿化成荫了。其后便将沙湖公园内专门供游玩的地方定名为“芙蓉乐园”，成为了韶关市民、外地游客、中小学生节日游玩的好去处。八十年代又将东郊莲花山林场辟为森林公园。这里林木密布，气势独特，顶峰可以鸟瞰全市，景致非常诱人，已经成为市民健身、旅游的新区。节假日特别是每年重阳节，更是老年人登高的好去处。近年，政府又先后选择了帽子峰山及武江沿江桥边等地辟为“帽峰”公园、儿童公园。可以预料，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山野、江岸修建为公园式的休闲场所。韶关将会成为有三江六岸、山水桥园特色的美丽城市。

## 市政府机关驻地的更易

公园南移与机关驻地的更易有着密切的相联，建国初新设置的韶关市政府（后称“市人委”）机关选址在风采路东段的孔庙大院内。这座孔庙靠近“风采楼”，古朴庄严。庙的主建筑——大成殿，全是用大木园柱到顶，上盖全木结构、琉璃瓦盖顶。大殿周边柱拱用雕刻的花岗岩大板石砌筑，气势不凡。建筑物外围是个大院子。正面临风采路是麻石结构大门，门后左右两旁各有一个石砌的二十尺见方的水池，在孔庙宽敞的大殿中用木板间成厢房作办公室和干部宿舍，另在

殿旁兴建二层、三层的小楼房用于办公。这个市政府的老驻地，在六十年代初市、县分开后为曲江县政府驻地。改革开放后，孔庙临街原水池处由曲江县改造建成十五层的“风采大厦”，但大楼后面的大成殿仍基本保留旧貌。

市政府于1959年迁入旧中山公园内时，正值全国高举“三面红旗”，组织体制实行“一大二公”的大变改时期，那时竟有一个县改为一个公社的体制。韶关市也由县级市和三县（曲江、仁化、乳源）合并为半地级的中等城市，小机关一下变为大机关。也就在此时选定旧中山公园体育场司令台前建造三层高的机关办公大楼，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两年后，行政体制又作调整，重新恢复原来的市和县，市政府机关仍保留在公园内的办公驻地。建造办公大楼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基建用的建筑材料（钢材、水泥等）非常紧缺，绝大部分都要用木材代替钢材建造，有些单位甚至用竹筋代钢筋捣制混凝土，因此，数年后便要进行大修，改用钢筋替换各层楼面原来的木桁梁。当政府机关迁入公园初期，政府的牌子挂在公园大门口，仍允许市民游园或通过公园，由于市民对此顿感进出不便，有怨气，并担心公园以后会被占用，因而向上级反映了意见。据说有位国家领导人曾转来一封人民来信批评此事：“谁敢这么大胆占用公园”。在内部传达后引起机关震撼。事实上市领导迁入办公同时，就已实施公园迁移新建的计划了。

市政府在建造办公楼后，又先后续建干部宿舍，要求原在旧公园内侧东角的曲江县政府驻地，南迁至马坝镇建新县城，原县政府建筑物腾出归市所用。1983年韶关地、市合并，专署机关并入原市政府大楼办公。1991年市政府因合并后机构设置和人员增多，老楼也已残危，便计划建设新的办公大

楼。当时正值中央和省三令五申严格控制新的基本建设项目，尤其是严禁新建“楼、堂、馆、所”。由于当时省已把部分基建审批权下放给市，较小项目可由市计划部门在限额内审批，但新建“楼堂馆所”仍没有“松绑”。市计委借助小项目可下放自己审批的契机，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把建大项目分割为四个小项目，符合市级自行审批的规模，由准许上马的新建单位作为报建单位，即韶关市信息中心、市监察局、市司法局、对外加工办四个新建单位分别报称资金落实，经市批开工。到定设计方案时，考虑到四个单位都在市府大院建小楼房，则占地太大，破坏大院的自然布局，很不划算。最后取得共识，向政府提请四家合并统建。并组建了统建领导小组（我是成员之一）实施，组织较强的施工队伍，保证了优良的施工质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于1994年建成了新的政府办公大楼。

新政府办公大楼高14层，共350个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其后又将新大楼前面的五层楼拆建，于1997年加盖新大楼附属楼群，作为市长办公室及大小会议室。政府大院内还种植了绿化带，绿草如茵，配以四周整齐的华灯，更显空气清新，庄重大方。继办公楼建成后，从1994至1998年还先后另盖多幢干部宿舍，即现在的机关东院和西院的新建筑群。此后在1996年市人大、市政协机关也在原机关驻地兴建了新的办公大楼。把旧公园的用地全用上了，唯独原公园中间的南北小通道仍然保留，原有的两棵大榕树仍然郁郁葱葱，留作“旧中山公园”永恒的见证。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忆韶关市搬运装卸 企业变迁片断

郭锐民

我是南方大学第二期三部九班学员。1950年冬参加英德县英东三区白沙乡关田村和英西四区九龙三圣乡土改。1952年冬调入韶关分配工作，先后在商业和交通部门工作。在市交通局工作长达三十多年，直到1989年退休。在职期间，接触搬运装卸工作时间最长，特记叙其中的一些片断。

## (一)

建国前，韶关市区的车站、码头行口的搬运行业，是由封建把头割据霸占的，彼此不得越界承揽搬运工作。韶关火车站码头有湖南班，把头是唐金生；广东班把头是苏细牛、苏慕新兄弟；井巷和电船码头把头是林锵；民生路祥栈、祥益粮食行把头是刘绍等霸占。他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达到长期剥削和压榨工人的目的，坐地分肥，经常借故在码头与码头、行口与行口、工人与工人之间，挑动事端，制造纠纷，进行械斗。



那时，搬运工人大致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把头统治的；第二种是店铺老板雇用的；第三种是轮流顶替的；第四种是街边打散工的（又叫散头牌）。不管属于那种情况的搬运工人，都同样受到不同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干活象牛马，生活最艰苦，是社会的最低层，被辱称为“咕哩”。一条竹杠、一条绳就是他们做工的工具，多么笨重、多么危险、多么脏的货均全用肩抬、背托，正如工人在做工时唱的顺口溜：“嗨呀哼啊！鬼叫你穷呀！顶硬上啊！啊一嗨！”多少工人抬肿了肩，压伤了腰，积劳成疾，得不到治疗而惨死啊！为了生活一年到头拼命的干，被把头剥削，所得无几，正如老工人讲，一天艰辛的卖力干，得到的工钱，买米用纸角（纸袋）装。家贫如洗，夜睡骑楼下，属于他们的只有竹杠、麻绳、托布、短裤。正如流行的俗语：“咕哩、咕哩、有力做到么（无）力，么（无）力去当乞食，乞食不成等脚直”（即死去的意思），这就是旧社会搬运工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 （二）

1949年10月7日韶关解放。广大劳苦人民拨开乌云重见青天，受压迫剥削的苦难日子一去不复返，过去被辱称为“咕哩”的搬运工人，成了建设美好未来的力量，成了国家的主人，从此开创了搬运工人史上新的一页。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搬运事业的建设和发展。1950年市政府就委派莫德伟同志负责组建搬运工人第一个组织——韶关市搬运管理所（设在市区中山路三市场），并由他担任所长，随即对全市搬运工人进行登记，每人发一个红色袖章。紧接着成立韶关市搬运工会，初期有会员500多人，随

后继续吸收新会员，不断壮大搬运工人队伍。1951年在韶关市搬运管理所的基础上，成立韶关市人民政府搬运公司（经理莫德伟、副经理潘爱群），下设16个队。后调整合并为中、南、北三个办事处，有工人525人。其中：中区——风采路（楼）以南有工人59人；北区——风采路（楼）以北，有工人215人；南区——韶关火车站一片有工人251人。他们的主要作业点分布在韶关火车站以及浚、武两江沿岸的南门、北门、义庄、民生、湘江、水巷口、天后宫、紫城阁、九江、建国、广富、东河等十多个简易码头，这些码头是群众生活用码头（挑水、洗物件），用麻石、鹅卵石铺砌成，梯级又高又狭，他们就在这里装卸船舶。装卸的物资是用10—20吨的小型木帆船、从各地运来韶关的，主要的大宗物资有竹、木、柴、炭、粮食、日用百货以及生活用品等。建国初期，我市人口少，工厂只有几家，商品流通量小，因此，搬运工人工作量不大，劳动力过剩，一度曾动员一部分搬运工人回乡生产。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市的货物流通逐年增加，主要作业点也随着扩大和增多，如江西省赣州地区的商业、供销、工业、冶金等单位在南郊二公里新建有铁路支线为该地区主要物资中转的供应站；韶关火车站在东河新建有煤炭、竹木、化肥、矿渣等大宗物资的铁路支线货场；以及建有铁路支线的东郊莲花山石油仓库。在六十年代建成以南郊南水码头为中心的水运货物装卸码头，船舶装卸量逐年增加。韶关港务所还开辟有1000多平方米面积的水运中转货物堆场，方便货主，活跃物资流通。

1951年，党和政府为了彻底清除城市的封建势力，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市委派出民改工作队到搬运公司进行民主改革。他们深入到码头各作业点，扎根串连，回忆对比，广泛

发动工人参加运动，控诉把头的罪行。在运动中仅南区就处理了把头 23 人，其中镇压罪大恶极者 3 人，判刑 9 人，管制 11 人。经过运动提高工人的觉悟，在运动中全公司涌现出一批先进分子，有 17 人被评为市的民改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有 117 人被评为公司的积极分子。评为市劳动模范的陈秉衡、陈洁珍、麦伙生，梁焯四人还选送到北戴河、庐山等地疗养。1953 年成立党支部，初时只有党员 3 人，参与民改工作的南大校友余庚才任党支部书记。

1954 年，韶关市人民政府搬运公司改名为地方国营韶关市搬运公司。成立后的公司大抓企业内部生产组织管理，重点抓改善搬运装卸条件。到 1956 年增添各种搬运装卸工具，有自己制造的硬铁轮小型推车 30 部，大板车 40 部，猪笼车 107 部，还买有载货汽车三部。继而又把硬铁轮手推车改为汽胶轮手推车，再进一步改为汽胶轮人力三轮车，从而改善了搬运工作条件。同时还根据码头货物集散情况，有重点地进行码头装卸技术革新项目。如在市区九成路粮仓、紫城阁、西河油厂、西河尾粮仓等码头安装简易吊机，提高了装卸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

1958 年，地方国营韶关市搬运公司改为韶关市运输公司。为适应华南重工业基地的建设，新增加各种载货汽车 40 部，共 117 个吨位，成为韶关市的主要运输力量。1961 年 6 月，韶关市运输公司分为汽车运输公司和搬运公司，1964 年两公司又合并为搬运公司，下设汽车站、第一和第二搬运站、三轮车站。

### (三)

为建立正常的运输秩序，市政府对搬运市场管理工作十分重视，先后两次开展较大规模的整顿搬运市场工作，为发展搬运装卸行业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整顿搬运市场是在1955年至1956年，市政府先后发出《韶关市区货物运输计划暂行办法》、《韶关市区人力、兽力、客货车辆统一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整顿搬运工作草案》等通知，经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搬运市场秩序逐步建立。

第二次整顿搬运市场是在1962年至1963年，这次整顿范围广，规模大，效果好，较好地解决了运输秩序受扰问题。

与此同时，从加强组织管理入手，于1962年3月成立韶关市短途运输管理站，接管原街道（公社）办的运输队（组、站）及个体运输人员，组建和平、太平、东河、单车等四个搬运合作社（以下简称搬运社），共有333人，运输工具有大板车8部，小板车99部，三轮车3部、单车23部。

另外，在1963年9月，韶关市人民政府还发出《关于整顿韶关市区搬运市场的布告》，对全市非专业运输组织和人员进行全面调查登记，共有1400多人，经审查符合从事搬运装卸条件的有937人，由市短途运输管理站接管安排，分别并入原有搬运社和新组建的4个搬运社，共有搬运工人1200多人。为了巩固整顿的成果，市交通运输局与市劳动局就搬运公司（社）与市劳动调配站分工问题，先后进行多次商议并达成协议。具体是“凡砖、瓦、沙、石及建筑材料，由市劳动调配站承担搬运装卸业务；凡属商品（产品）流通过

程的搬运装卸业务，由搬运公司（社）承担，其他非专业搬运装卸组织不得承担”。

1964年，为了更好地加强对搬运合作社的组织领导，将韶关市短途运输管理站改名为韶关市民间运输管理站，同时成立韶关市搬运联社，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制定《韶关市搬运合作社章程》，做好发展规划，随后将七个搬运社调整合并改名为韶关市第三、四、五搬运站。1972年在市北郊黄岗还成立了韶关市黄岗搬运站。

“文革”期间，韶关市搬运企业曾进行过多次调整。1966年6月将韶关市交通运输管理局、韶关市搬运公司、韶关市搬运联社合并为韶关市交通运输公司（对外保留韶关市交通运输管理局牌子，内部经济分开核算）。1968年冬各搬运站自主经营，经济独立核算。1971年恢复韶关市交通运输管理局。1972年恢复韶关市汽车运输公司，1987年有职工262人，汽车65部，307个吨位，年完成货运量48万吨，货物周转量784万吨公里，装卸量51万吨，营运收入369万元。曾被广东省企业领导小组授予“省级先进企业”，国家交通部授予“文明车队”称号。

1976年在搬运二站基础上成立韶关市第一搬运装卸公司，后改为第一运输公司。到1987年有职工302人，载货汽车52部，280个吨位，吊机1台，年完成货运量27.7万吨，货物周转量475万吨公里，装卸量28万吨，营运收入237万元。

为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实现机械化运输，1978年冬其他搬运站机构又进行调整，分别将搬运三站和四站合并为韶关市第二搬运装卸公司，后改名为韶关市第二运输公司；搬运五站和黄岗搬运站合并为韶关市第三搬运装卸公司，后改

名为韶关市第三运输公司。到 1987 年第二、三运输公司共有职工 1060 人，汽车 49 部，262 个吨位，各种小型机动车 22 台，挂车 5 台，人力载货三轮车 305 辆，搬运工人以三轮车运输作业，年完成货运量 21 万吨，货运周转量 390 万吨公里，装卸量 227 万吨，营运收入 357 万元。

#### (四)

我市搬运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担负着支援工农业生产 and 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运输任务，是一支短途运输装卸的主力军，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韶关市的搬运工人，在搬运装卸吊装大（重）型设备方面是有名气的，它不仅担负着本市区的搬运装卸任务。还经常派出工人支援市属各县及江西赣南地区矿山的大重型设备的搬运吊装任务。他们在没有先进工具，又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下，依靠智慧和实践经验，使用卷扬机、纲丝绳、滑轮、滚（钢）筒、枕木、铁笔等简单工具，就把庞然大物按照工程的要求而搬动吊装好。1968 年冬，乳源南水水库需从韶关南水码头（北江西河岸）运电船一艘到水库，搬运一公司的搬运工人就是用上述简单工具装上平板车，有如陆上行舟，安全地运到了目的地。

在七十年代，江西赣州地区在赣南电网工程建设中，需运输安装一批每台重 30 多吨的变压器，原计划自行运装，但他们对运装施工方案讨论几天，提不出行动方案，后改请韶关市搬运一公司负责安装。经现场调查后，搬运一公司修改了他们原用四根大杉木为两根大杉木做支架的方案，经过努力，把庞然大物安装在赣南电网中，其中有变压器十多台，受

到好评。

1994 年间，韶关市水轮机厂车间需安装能吊 100 吨重的大型吊机一台，初时拟请外地安装公司安装，需安装费 18 万元，后改由搬运一公司负责安装，安装费只需 6 万元，为厂节约开支 12 万元。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当前韶关市的运输状况又进了一大步，主要特点是各种运输工具（特别是汽车）增多，先进运输工具（汽车）代替了人力搬运。现有搬运企业中从事搬运装卸工作的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已年老，即将全部退休。在 4 个市属运输企业中，现已退休的老搬运工人 900 多人，目前从事搬运装卸工作的工人不足 100 人。原来以搬运装卸为主业的企业，也先后改为以汽车运输为主业的运输企业。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作为搬运为主的企业也将消失，记此作为历史实录。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丰收快报》的创刊与地委印刷厂的建立简介

龙柏呈

## 一、《丰收快报》的创刊

1958年春，正是“大跃进”的时候，《粤北农民报》停刊了。为了加强对农业“大跃进”的宣传、鼓动，中共韶关地委决定创办《丰收快报》，人员由蔡思义（后任广东省委党校处长）、龙柏呈、温秀均（在韶关市林业森工局退休）、杨献冰（女，在韶关市总工会退休）等四人组成。蔡思义任主编，龙柏呈、温秀均任编辑、记者，杨献冰负责校对；每星期出版二、三期，四开二版至四版不等，由地委副秘书长梁木（后任广东省委党校校长）负责审稿签印。报头是地委秘书长涂锡鹏书写的。四个人出版一份报纸，任务相当艰巨，大家都以“大跃进”的干劲，日以继夜地工作才能完成任务。几乎每晚都干到零时以后，翌日照常上班，没有过周末，没有星期天，也没有领取过夜餐费和加班费，但个个情绪饱满，斗志昂扬。那个时候，到处刮浮夸风，水稻亩产几千斤、成万斤，甚至放几万斤的“卫星”满天飞。其中，连县星子公



社的水稻“卫星”，亩产达64,000多斤。省委由秘书长张根生，地委由秘书长涂锡鹏率领工作组进行验收，我作为《丰收快报》记者身份同《南方日报》驻韶关记者站站长张涛也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南方日报》和我们《丰收快报》写了新闻报道，并发表了社论，作了浮夸报道。

《丰收快报》报道的内容，以农业为主，也报道一些大炼钢铁的情况。在那个“大跃进”的大气候下，所报道的内容有相当份量是浮夸的。该报由粤北印刷厂承印，每期印五千多份。读者是县、社（镇）、大队（乡）和农、林场基层干部。它是免费发行的刊物，由粤北印刷厂一个叫周达的退休工人负责代理邮寄。是年冬，由于种种原因停刊了，前后只办了九个多月。回顾当年“大跃进”之浮夸风，今记之作为历史教训启教后人。

## 二、韶关地委印刷厂的创建

《丰收快报》停刊后，中共韶关地委为了指导县、社（镇）工作和交流工、农业生产经验，于1958年冬又创办了《经验交流》刊物。由《丰收快报》原班人马负责编印，每星期出版二至三期，八开纸，版数不等。1959年改为《粤北通讯》，是一份免费发行的内部刊物，阅读对象是县、社（镇）和农、林场干部。1959年春，《粤北日报》创刊，两个刊物都是由粤北印刷厂承印，因而在排字、改版、印刷方面经常出现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地委书记郑星燕和地委副秘书长梁木认为有必要创办一间专门印刷内部刊物的印刷厂（地委印刊厂），厂址设在地委门口对面的平房里，即现在韶关日报印刷厂的前身。根据地委的指示，由蔡思义和我从粤北印

刷厂物色对象。当时，我们物色了孙金水任厂长（现在韶关地区土产公司退休）、黄传新任业务股长（现在新华印刷厂任副厂长），由他俩组阁十多人，建成一个小厂，主要负责承印地委、专署各部、委、办的内部文件，不对外营业。1959年冬，惠阳地区撤销，河源、龙川、连平、和平等四县划归韶关地区管辖，由惠阳印刷厂抽调了一些技工如谢吉等充实地委印刷厂的技术力量，且吸收培养了一批新鲜“血液”，使印刷厂不断发展壮大；并对外营业，《粤北日报》随之也转为由地委印刷厂承印。

在“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后期，中印边界又发生了武装冲突，台湾当局乘机蠢蠢欲动，叫嚣要反攻大陆，全国处于战备状态。鉴于这一情况，毛泽东主席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立足一个“打”字的号召。中共韶关地委根据上级的指示，从上海购回了一台卷筒胶印机，作为战备之用。该机安装好之后，由地委秘书长涂锡鹏同志亲自指导进行试机，由于《粤北日报》和其他刊物印刷份数太少，机器吃不饱，所以试机后即行封存，从未使用过。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难忘的土改故事二则

梁锡祺

## 一、木盆的故事

土改时要访贫问苦，要依靠贫雇农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因为贫雇农最贫苦，革命性最高，斗争性最强。那时他们的生活很是艰辛。入村后，我就有了切身的感受：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我住进一个单身的雇农家里。第二天清早，他烧好热水，倒进一个木盆里叫我洗脸。当我洗完后感到面巾有象洗碗布那样带有砧板味，双手亦有油腻。我意识到那个木盆是个洗碗盘，心里感到这位雇农为什么捉弄我，拿个洗碗盘给我洗脸？回头一想，别人天未亮就起来烧水给自己洗脸，怎会捉弄自己呢？待天大光时，我细看他的家：昨夜他和我一起睡的床，是两条破长凳架上几块长短不一的木板，家里只有两件简单的农具：一个镢头、一个破旧木盆。心想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倒水给我洗脸如不用那个木盆，就只有用镢头了。我这个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还不到半年的华侨仔，没有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没有切肤之痛，如今看到贫雇农的悲惨生活之后，联想到地主阶级封建剥削之残酷，才深刻认识到土地改革为什么要发动和依

靠贫雇农，以他们为骨干去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于是便积极地投入到土地改革运动中。

## 二、伟大的号召

1951年夏秋之间，曲江县大塘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农民们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物准备分配。加上丰收在望，农民们心里乐滋滋，他们衷心感到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大救星。

有一天我到土改队队部开会，第二天回去驻地的左岭村，看到农民们已把没收地主得来的财物私分一空。我感到事态严重，如不及时纠正，就会引起宗族斗争，对土改运动的进行会产生不良影响。于是马上召开全村农民大会，对他们讲清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是要彻底推翻封建的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使农民彻底翻身。对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房屋、财物，都是属于全体农民的。如果一个村私自把斗争果实分了，别村的农民兄弟也这样做，那些没有斗争果实村子的农民分不到或分到不好的农民兄弟就会有意见，就要造成农民内部不团结，会被阶级敌人从中挑拨，就会引起宗族斗争，地主们会笑我们互相争食，造成亲者痛仇者快。你们村小，地主不大没收的财产不多，你们分到的也不多。这场土改运动是要你们彻底翻身，如果影响土改的进行，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们自己。土地改革是共产党毛主席提出来的，你们常说共产党毛主席是你们的大恩人，大救星，你们应该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把土改改革运动进行到底，把财物退回公家，由农会合理分配。经过教育农民们提高了觉悟，都表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随即纷纷回家把分得的日常用品、家具

等财物交回村里的仓库，从而平息了这场私分斗争果实的事件，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曲江中学巨变的见证

钟绍兴

1953年春，曲江土改结束后不久，县委为加强中学领导，调我参加粤北区中学教师学习班。这个班由粤北区党委主办，梁威林宣传部长担任班主任。我在班里任教育干事，组织和辅导教师学党史、中国近代史，树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确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的基本观点；以及党对教育和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等问题。为整顿和建设教师队伍，为建立健全中学教学秩序，为加强党对中学的领导而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1953年4月，县里正式调我到曲江中学工作。前期任教导主任，后任代校长，并当选曲江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时，县委很重视曲中工作，对我也寄予殷切厚望。到曲中之前，县委殷连城书记亲自对我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发场土改队立场坚定、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好思想好作风；二要认真宣传贯彻党对教育和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依靠和团结广大师生，以办好曲中为己任；三要与教师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做到心系曲中、情暖教师，努力做好工作，不负县委重托。我到曲中时正值曲中从马坝区石堡乡田心村搬迁到马坝区马坝乡

石湾村新址，所以当时的课室，宿舍都是借当地陈屋村的旧民房。饭堂、礼堂、图书室、实验室均暂借旧民居使用。条件很差，设备简陋。有教职员工 28 人，设初一、二、三年级，共 7 个教学班，有学生 350 多人。

到校后，经粤北中学教师学习班搞清了历史问题，提高了思想认识的大多数教师都表现很好，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工作信心，这不仅成了当时做好工作的依靠力量，也为我完成县委的重托而增强了信心。但仍有少数在学习班挨过整的教师仍背上历史、家庭等包袱，顾虑重重，不敢大胆工作，如黄淑陶、姚菊土、梁利文、黄监才等（后均被处劳教）。其余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对工作不敢放开手脚干。如何从实际出发，认真宣传和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关于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是摆在当时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先，我便经常深入教师中间，进行推心置腹的谈心、聊家常、议工作、交朋友，逐步建立感情，取得彼此信任。他们消除了疑虑后，心情舒畅了，使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有序。随后又与广大教师一起开展学政治、学业务。在工作上给予信任，在生活上给予关心，使彼此加深了解和信赖，为打开曲中工作局面提供了重要条件。和老师间关系也搞得较好。1955 年夏，当县委决定我调离曲中，受命组建县油脂公司时，一些教师得知此事后，如司徒显老师等即上书并到官怀民副县长处说情，以曲中需要我为由，希望不让我调离。这正表明认真贯彻了党对知识分子方针政策的结果，和执行了县委对办好曲中指示的结果。

从 1953 年冬开始，依靠教师中的团员张国常、徐光平分工培养优秀学生会干部及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发展团员对象。于 1954 年春成立了曲中第一个团支部，我任支书，张国

常、何受宣（何斌）、陈荣等为支委或小组长。主要任务是团结师生，在促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起保证作用。

为改善教学和师生的住宿条件，我们主动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学校的困难，提出建校规划。借县委书记殷连城驻马坝区并常来检查工作之机，向他面述学校的问题、要求、打算，及时得到领导的关心支持，不少困难及时得到解决。从1953年冬至1955年期间，经县财政拨款及师生劳动建校，先后建起砖瓦平房两栋，初步解决了课室、教务办公、图书室之需。继而建起可容1500人的砖瓦、木质结构的礼堂（兼作饭堂）。还兴建了二个篮球场，兼作排球场，以及石湾坝足球、田径场，为改善教学、生活条件迈出了第一步。

由于曲江地处粤北腹地，曲中历史悠久，且当时的师资素质较高，不少教师是中山大学、广州大学、文化大学、军政大学、南方大学毕业的；而学生来源是全区统考录取的，一般素质较好，所以保证了教学、教育质量。从1954年起的历届毕业生，不少考进了北中、韶师或广州的中专学校。办学成绩较好，与北江中学、乐昌中学、连州中学、南雄中学同获好评。

随着学校的发展，师资的充实，在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受粤北行署文教处的委托，于1954年先后办起两期小学校长培训班，设政治、业务两大课程，分别由我和陆素（文教处小教科长）授课。取得预期效果，为发展曲江教育事业，及培养干部起了较好作用。经培训后的学员，大都被任命为中、小学校长或后来的县科、局长，如朱祖良、何汉和、潘文魁、刘少凌、黄石柱、黄腾发等。为提高师生卫生知识和保健意识，主动征得曲江县人民医院吴超良院长的同意，聘请他担任曲中校医，并成立了校医室，由司徒显、郑艳芳老



师兼管。定期向师生上卫生知识课，师生遇有伤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收费给予优惠，为保健、防病、治病起到很好的作用，促进了教学和学习工作的进行。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学校历届领导班子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曲中发展很快，教学教育质量稳步提高。五十年代初，这间仅有7个教学班的小型初级中学，今天已发展成为一座具有36个教学班的完全中学。而且一直被视为曲江最高学府，培养人才的摇篮，是县唯一的重点中学。1996年通过市评估，被批准为市一级中学。随后进入创建省一级中学，目前正进入报批阶段。

现在的曲中建筑总面积已达151亩，比1953年扩大了十倍；教学班36个，比1953年增加5倍多；学生2000多人，比1953年增加6倍；教职员工209人，比1953年增加6倍。校舍从五十年代初的砖瓦平房，变成功能齐全、布局完美的新校舍。现有一座六层、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的科学馆，其规模之大，列全市8县3区之首。还建有教工新村，有楼房9栋，104个单元。同时新建有2000个看台座位的400米标准的田径场，7个篮球场，3个排球场，7个花园式羽毛球场，购置了10副乒乓球台和其他一批器械。总之，今天曲中师生的教学、学习、生活条件、设备是较先进、完善的。忆往昔，看今朝，旧貌换新颜。曲中的巨变，乃祖国欣欣向荣的见证。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引种温州密柑的简忆

邓贯然

柑桔是广东四大名果之一。广东名果柑桔，历来以潮州柑及广州郊区的甜橙著称。后来遍及粤北山区，受人欢迎的温州密柑，在省内却是1964年才引入，并迅猛发展的一个后起之秀。

温州密柑主要以其无核、味甜、早熟而深得消费者喜爱；又以其抗寒性强、适应性广、丰产稳产而为生产者乐意接受。乐昌县东风果场（以下简称果场）是省内引种温州密柑最早的单位之一，也是引种得相对较好的一个单位。引种之初，我在东风果场果树大队负责（先后为果场柑桔研究所所长、副场长），亲经了引种温州密柑这项工作，现将经过简忆如下。

## （一）

“农业学大寨”之初，为发展山区经济，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于1963年冬向湖南省要到温州密柑苗二万株，由该省邵阳地区园艺场供应给韶关地区。这批柑苗除主要分给地区的西联农场外，还将部分分给乐昌及个别县。当时，乐昌县负责此项工作的是林业局，东风果场向林业局领得柑苗5000株，

开始试种。

当时，东风果场只有 90 多亩耕地、人员不满一百。为了发展密柑果业，东风果场与麒麟山果场合并，扩展以麒麟山为中心，南起铁路边，北至大河陂、示范农场，西至鲤鱼岭，东至佛坳、中山岭等大小共 24 个山头，总面积 3000 亩，为“南北水果大会师”的场地（初时种有南北水果如苹果、雪梨、蜜桃、荔枝、洋桃、木瓜等 30 多个品种共 900 多亩，后逐步淘汰，改种温州密柑）。由林业局派来协助的技术人员，将山头绘图、测量，初步作出种植规划。场长是姚晨。生产方针是“以果为主，多种经营，长短结合，以短养长”。体制上分为果树大队、经作队、畜牧水产队、后勤组。

由于果场刚刚成立，梯田未开，植穴未挖，肥料未备，劳力未抵，5000 株温州密柑苗一到，无法定植。为了不使柑苗受损，果场接受了林业工程师侯铭昌的建议，先将柑苗假植，迅速购来一批竹子，编织了 5000 多个“营养筐”，再将柑苗种在“营养筐”里，待各种工作完成后才作移（定）植，确保了柑苗的安全。

开山种果，重要的是解决劳动力。于是一边招收城镇社会青年，一边接收上山下乡知青；一边雇佣临时工（最多时 300 多人），一边请来推土机；县委也作出了大力支援，动员机关、团体、部队等（人数最多的一次达一万多人），前来开梯田、挖树洞。经过一个冬春的协力开拓，中山岭、青年林、瘦狗岭、西石岩一带的山头，已开出了层层梯田，劈出了共四公里多长、贯通各山的汽车道，车道两旁种上了三排花木，园中的红十月水库灌满了春水，部分梯田随即种上了果树，荒山变果园初露眉目。

1964 年 3 月 8 日，妇女节降临。在县城参加妇女节的妇

女同志来到东风果场，在中山岭种下了 3800 百株温州密柑。为了纪念妇女同志的大力支援，也为了纪念这一有意义的密柑首批定植，果场职工便将中山岭柑园改名为“三八”林。是年，先后种下的温州密柑共 4000 多株，果场人员增至 150 多人。

## (二)

乐昌在 1964 年以前，没有柑桔的大田生产，圈山种柑，史无前例，就是在粤北地区，也是头一回。尽管人们经常提到：山地瘦瘠、易旱、环境恶劣，温州密柑能否安家落户？对温州密柑的生长、结果习性一无所知，要一开始就摸索，会不会走弯路？在条件差，任务紧，定植时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的情况下，经过充足的肥水管理，大部分柑树生长正常。

1966 年，首批在“三八”林种植的密柑开始开花结果。因园中各段生长不够均匀，只让连片较好的第十、十一两段，共 500 多株投产。平均单株产量四斤三两，最多一株结果 65 只，重 15 斤多。以后几年，平均株产（仍以第十、十一两段作统计分析）：1967 年 10 斤，1968 年 24 斤，1969 年 41 斤，1970 年 50 斤。此期间，树冠扩张得快，一丈二尺宽的梯面五年便封行，每年开花满树，但却落花落果满地，座果率很低，开花二万朵的树，只得三、五十只果实收成。职工说：“春天看开花，叫你笑甩牙；冬天来收果，似拿黄瓜敲铜锣”（到手无几）。开始几年，产量上升幅度不大。

1966 年“文革”开始，东风果场的干部、工人就地闹革命，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嘉许。是年冬，广东省农科院柑桔研究所黄志文领队前来搞技术协作，深入果园调查、观察、

研究。在他们的帮助下，从1967年起，果场的密柑管理技术水平有了大步提高，一系列切合山地栽培温州密柑的措施日趋完善，其中抓了关键而又最艰难的两项：一是深翻改土；二是猛攻秋梢。

从1967年冬起，果场每年集中力量大搞深翻改土、深坑埋肥，新种的树穴，由原来70公分×70公分改为1米×1米，后又进一步改为1米深宽的壕沟，铺草七层，为柑根深扎创造有利条件，保证树势壮旺。在猛攻秋梢方面，改有肥就施为集中秋梢前重点施肥，培养出理想的结果母枝，从而减少落花落果，提高了座果率。为了解决改土材料和攻秋梢的肥料，职工们便到机关、居民的院子里去铲（那时许多机关、居民都养猪），厕所里去掏，垃圾堆里去挖，干水的鱼塘里去挑（塘泥）；还专门组成七、八十人的割草队，书记、场长带头，到几十里外的安口等地安营扎寨，一个冬季就割草几千担，到县食品公司的大猪仓垫栏积肥。每年积集有机肥近十万担，其中奶牛（那时果场办有奶牛场）、猪栏肥共约五万担。

同时，不断提高和狠抓各个环节的技术管理和科研基本建设。1969年组织专人建立了十亩面积的柑桔品种试验园，引入国内外名种进行对比，后又建立了十亩面积的温州密柑品系对比试验园，引入日本和国内各个品系以便筛选；在七十多米高的西石岩山顶建了一个大水池，抽水上山，使主要柑园自流灌溉，部分柑园进行喷灌；柑园里每百多株柑树除有一或两个容量一、二百担的砖砌肥池外，还另集中筑了三个专门沤制花生麸的大池，由专人管理，保证柑树用肥的数量和质量；植保方面成立专业杀虫队；在夺取产量上，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如夏剪促梢，环割促花，喷布激素保花保果等。

### (三)

温州密柑在东风果场生根之后，从1964年至1977年十三年间，虽产量不稳定，但经不断摸索，已探索出了一套山地栽培办法，使柑园状况不断向好的方面进展，丰收捷报频传。1974年产量由三、四十万斤增至七十二万斤，大小共10200株结果柑树，平均株产70.5斤，最高单株产量334斤。丰产片平均株产：五年生的46斤，七年生的73斤，十年生的130斤。1977年总产达84万斤，果质优良。1974年选种选出果品良好的青1—2—3，含糖量高达14%以上，果形、肉质、皮厚度、糖配对比度皆上乘，在全省柑桔果评会上，获得柑类的最高分数，名列第一，受到省农科院柑桔研究所的重视。种植面积逐步发展到1976年700多亩，3万多株。职工人数也逐年增至43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上山下乡知青）。

为配合温州密柑的发展，果场于1966年建立起温州密柑苗圃，面积由初时的20多亩发展到1973年的80多亩，播育砧木枳壳种子由初时的几百斤增至1973年的5300斤。各年向外提供的温州密柑苗共计110多万株和大量的枳壳苗，其中1975年向外供应的嫁接苗就有30多万株，砧木苗40多万株。连县东陂连续三年（1977年至1979年）温州密柑亩产超万斤的丰产园，其种苗就取自东风果场。始兴县果菜公司从1974年起，连续几年从东风果场购进大批密柑苗或枳壳苗。

东风果场艰苦创业，荒山变果园，开始就受到人们的注意，而来参观、指导、鼓励的人，则以1974年冬至1975年为最。1974年果场柑桔大丰收，从下半年起，来参观的人就很多，省农科院钟俊麟副院长不顾年事已高，亲临果园指导；

《广东画报》以文字及图片报导了果场温州密柑大丰收；连县由一位县委副书记，在 11 月内就率领三批人来参观；韶关地区农业局于收柑后就来果场，举办来自地区各县的 200 多人参加的“山地栽培温州密柑”学习班。还有省内外各县、公社、学校、农（果）场等陆续前来参观的，直至 1975 年年底，每星期从未间断，余波一直延续到 1977 年。东风果场对前来参观的人，一律无私地竭诚接待介绍，对要求派员前去实地指导的有求必应，对附近柑园有问题要研究的随叫随到。那几年，东风果场山地栽培温州密柑的经验，曾一度在粤北山区那雨后春笋般涌建的柑园里广为传播。到 1978 年，韶关地区共种下温州密柑 7 万亩，年产柑果 10 万多担，成为粤北山区栽种的主要果树品种。地区内柑桔场星罗棋布，发展到大小共 4511 个，其中国营的 38 个，公社办的 75 个，大队办的 487 个，生产队办的 3833 个，还有社员利用屋前屋后空地和自留地栽种，盛况空前。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与韶关地区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于 1980 年 3 月在供领导参考的内部资料上，以《粤北山区发展温州密柑大有可为》为题的联合调查报告中说：“十多年的生产实践表明，温州密柑在粤北山区确是一种大有发展潜力的果树品种。”又说：“粤北山区发展温州密柑是顺利的，一个果树品种在十多年的时间，取得如此规模的发展是不多见的”。东风果场的山地栽培温州密柑经验，无论在其成功或挫折方面，对为山区顺利发展温州蜜柑，都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添砖加瓦”或“失败是成功之母”的作用。

#### (四)

东风果场的温州蜜柑，自1964年开始至七十年代中期，生长正常，产量逐年增长，柑园兴盛。但进入1978年，一些柑树开始产量下降，枝萎叶黄，经专家鉴定，认为是染上了黄龙病。虽然采取了一些救治措施，如注射药物，增施肥料，重剪再生等，都无济于事。主要原因就是警惕性不高，在栽培中偏重于夺产，忽视了防病。

1982年，黄龙病蔓延扩散，果场面对现实，下定决心，采取了果断手段，将带病柑园销毁，重新再种。1983年重新种植了蜜柑200亩（后因体制变化及资金问题暂停），东风果场现在拥有的温州蜜柑，大部分是这个时期重种的，至今已有十四年树龄。因有过深刻教训，特别注意预防黄龙病，果树依然枝叶繁茂，结果累累。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宣传婚姻法 婚事新办 喜气洋洋

王兴铎

樟市镇位于曲江县南部北江河西岸。解放前叫樟树潭，解放初期建制为六区人民政府。是个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的好地方。

1950年冬，我们南方大学800多位学员，遵照毛主席教导，为了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分配，北上粤北山区参加千载难逢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经过清匪反霸，清算地主，分田分地，贫下中农得到了翻身，并建立了区、乡的人民政府政权。土改结束后，区委书记张战按照北江地委部署，率领大部分南大学员和一部分农干共100多人前往新丰县推进土改斗争。留下孙静刚、方兰池、张帆、邓肇珍、黄新及我等十多位校友留在六区工作。组织上分配我搞民政助理，办理日常民政事务。人民政府一建立，就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在日常工作中许多老百姓都来区政府办理有关事宜，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婚姻法，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法典，是与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为了做好宣

传教育工作，使婚姻法深入群众，区政府把这件工作当作一个运动来抓，从各方面开展宣传发动，使人人皆知，为今后结婚、离婚一律按婚姻法规定办事打下思想基础。为使宣传贯彻婚姻法有声有势，我们特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结婚婚礼。这在当时旧婚姻还流行的建国初期，确实是宣传破除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新婚姻制度的一个重大创举，是曲江县各区（当时共七个区）中第一个举办的集体婚礼。举行婚礼仪式之前，我们一方面做好新婚伴侣的思想工作，使他（她）们自愿参加集体婚礼，一方面在船厂坝村提前搭起临时讲台，中间挂起巨幅的毛主席画像，讲台四周彩旗飘扬。当天清早，很多群众就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庆祝婚礼。开会时数十对新婚伴侣手挽手鱼贯整齐地进入会场，登上讲台，我们给他（她）们戴上大红花，向他（她）们热烈祝贺。他（她）们整齐地排着队向毛主席像鞠躬致敬，又向证婚人敬礼，向广大群众致以亲切的敬礼，新婚伴侣互相敬礼，各对新郎新娘还向参加集体婚礼的同伴致敬礼。顷刻间会场内锣鼓喧天，雄狮起舞，爆竹乒乓声、群众欢呼声响彻云霄。然后由区长作证婚人，宣传婚姻法实施的伟大意义，讲解如下主要精神：①从今以后坚决废除过去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建立新的婚姻制度，实行结婚自由，人人平等，不许任何人破坏婚姻法。②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的行为。③不再允许养童养媳和等郎妹等旧习俗，现有的一律解放出来，恢复其人身自由。④实行男女平等，尊重妇女权利，严禁打骂妇女。⑤离婚也要自由，经调解无效后交由法院判决处理。⑥今后凡结婚、离婚的一律要到区政府办理，发给证书才能生效。⑦办理婚姻喜事要以勤俭节约为原则，不宜大摆酒席，以免劳民伤财，造成社会不良影响。宣讲完毕

后，一些新娘子立即在台上高兴地唱起山歌来表达自由结婚的欢乐心情，有些群众也受到感动、即兴唱起山歌进行对答和唱，你一句，我一句，营造出异常热烈的欢乐气氛。还记得几首山歌：

- (一) 旧时婚姻真凄凉，十八娇娇三岁郎；  
每夜同床拉屎尿，等得郎大花已黄。
- (二) 旧时婚姻害死人，媒婆花言父母命；  
不识郎君任抬去，好比扛猪去赴圩。
- (三) 婚姻法来好主张，男女平等暖心房；  
自由结婚破包办，幸福全靠共产党。

数十年过去了，但经过那次集体结婚庆典，大力宣传婚姻法，加上工作队下乡广泛做群众工作，使婚姻法深入人心，传遍全区每个角落，如边远的罗坑侠洞、蒋公、垌顶，樟市的芦溪、瑶村，白沙的邓洞、白石洞等村庄都了解婚姻法，真正做到人人皆知。

对婚事俭办，我们区干部亦带头做出榜样，如何、黄、范、官等女青年与我们区干部中年青小伙子办理婚事就很俭朴。在区政府内，等下乡的同志们回来后，利用一个晚上，由区长或书记召集大家开个茶话会向新婚伴侣热烈祝贺，集体唱歌，请新娘子讲罗曼史，及同志们欢笑，增添婚礼欢乐气氛，愉快地度过了一个隆重热烈欢乐的新婚礼。

从此，对办理婚事，实行以勤俭节约为主的新风尚，深深扎根于樟市广大群众之中。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回忆土改工作片断

李 刚

我原是粤东惠阳县的地方干部，于1950年秋考入南方大学第二期学习。当时正掀起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高潮，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时任华南分局书记兼南方大学校长叶剑英同志指示我校800多学员投入土地改革运动。部份学员参加抗美援朝。我们于1950年12月在校务处长李又华率领下，奔赴粤北参加土改运动，当时北江地委书记为伍晋南，土改团团长是张根生。在韶关经过几天学习后，大部份同志分配到曲江县各区进行土改。马坝区是土改的先行试点，我被分配到马坝区，当时马坝区委书记是何英，区长是官怀民。这个管区管辖范围很大，包括马坝、沙溪、乌石、坑口几个大乡，还有一百多个小村庄。我被分配到沙溪乡搞土改，同往的校友有谢诗昌、蔡柏和、刘玉盛等，另有一部份北江中学师生及当地干部甘子平、陈平、杨发威等。1952年秋，土改复查工作基本结束，我调到县青年团青工部，后调县总工会工作。现在回忆土改复查中的一些片断记述如下：

## 一、通过回忆诉苦，挖根是提高 农民阶级觉悟的主要方法

土改初期为了培养农村土改骨干，曲江县举办了几期农干训练班，当时班主任是陈羽，我调去当辅导员。马坝区每期去学习的农干约十人左右，记得其中有林永明、谢明、杨定云等。通过学习时事及回忆对比，诉苦挖根等方法，大大提高了农干的阶级觉悟，认识了穷苦不是命注定，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造成的，并进一步认识封建地主与乡、保长及国民党反动派等是压迫剥削农民的反动基础，都要推翻。这些农干通过学习回村后，都成了土改及复查工作中的骨干分子。农训班结束后我即投入沙溪乡进行土改，陈羽调去周田区土改。他在消灭封建阶级的残酷斗争中，不幸在周田古羊村被阶级敌人暗中杀害，光荣牺牲，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立场坚定的好同志、好校友。这是血的教训，从中提高了我们土改队员在阶级斗争中的警惕性。

## 二、大力宣传党的政策，深入充分发动 群众是做好土改工作的关键

沙溪乡是个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的山区，地主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较多。针对此情况，我们大力宣传土改的目的、意义和政策，打消群众各种思想顾虑。那时沙溪乡包括沙溪、凡洞、长坪、窝子、上下埂、河洞等数十个小山村，没有电话，也没有公路，交通非常不便，工作汇报或开会都是

走山路。有一次，马坝区要我去通知各村的工作队到区集中开会，我一早从凡洞村出发，爬过大风垌山到达宝山窝子，经长坪最后到河洞村，时已下午。那时土匪仍未肃清，为防意外，随身佩有手枪、长枪及手榴弹等武器，时刻准备与敌人搏斗。当时农民顾虑很多，怕土匪、怕变天，不敢接近工作队，见到工作队就远远躲开。为了发动争取群众，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有次在田间劳动时，我趁农民犁田休息抽烟时，扶起犁帮他犁田，他们问我，你也会犁耙田？我说我生长在农村不但会耕田，而且还当过汽车工人呢。通过同劳动逐步与农民建立起感情，从中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后他们便把心里话告诉我们，说沙溪有很多人被地主恶霸骗去上山当土匪了，家里人顾虑很大。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大力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从而打消群众顾虑。为使宣传广泛深入，工作队还编了歌剧，在沙溪街公开演出，观看的群众很多，演出效果很好，不久就有被骗上山当土匪的农民先后回家自首。我们不但拘问他们，还安慰鼓励他们安心生产，积极投入土改运动，用党的政策威力和事实教育了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民兵也组织起来了，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如华屋村的华沛强、华沛廷，上下李村的李思聪、李书贤等民兵骨干。通过一批骨干串连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土改运动。剩下那几个地主恶霸、土匪、会道门头子倚着山高林密、山路熟悉，继续顽抗。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也就无藏身之地，地霸兼反动会道门头子黄耀廷躲在炭窑数月，经群众举报被我们民兵包围捉住了，坪田村地霸曾猴子（花名）同样被我民兵活捉了。最后剩下长坪土匪、地霸张善史父子，他们有枪支且枪法准，躲进深山，继续与我们顽抗。有次在油

岭山脚被群众发现报案后，我们组织民兵进行重重包围，但他们顽抗到底，结果儿子被民兵当场击毙了，最后他本人也弹尽粮绝，终于给民兵活捉了。但在这次剿匪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凡洞陈屋村一个民兵队长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对这几个被民兵活捉的土匪、地霸、反动会道门头子，由于他们罪恶较大，在土改运动结束时，被我人民政府在沙溪公开审判和枪毙。沙溪乡的广大农民群众对此无不拍手称快。

### 三、学习政策、交代方法是锻炼 提高农干的有效办法

1951年夏，曲江基本结束土改，随即转入土改复查。这时，大部分土改队员抽调到乳源、连南等县去参加土改工作。由于传闻广东和平土改，因此土改复查工作任务更重。当时马坝区只留下我和谢诗昌、蔡柏、罗华、黄雪梅等几个土改队员，后我被调到乌石乡任土改复查单元组长，丘作峰任副组长，队员有周锡（公安员）、何远津等。当时乌石乡辖展如村、濠湴村、坑口村、石角村及数十个小村庄，还有乌石街和坑口街，工作面广，工作又多，日夜很忙碌，晚上要下各村开会，白天要到各村了解情况听取汇报。去到那就食住在那村，真是日食千家粥，夜宿百家床，工作生活虽艰苦，心却痛快。由于工作人员少，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当地农干积极分子共同工作。当时乌石有林典娣、肖维仿、肖绍安、谢裕成、成永芳、张桂养、张桂新等积极分子，展如村有徐兴湘、赖永成，坑口村有蓝特龙、蓝特风等积极分子。他们虽

积极肯干，但文化低办法少，我们只好在每个工作阶段中，组织他们学政策，总结经验，交代办法。事实证明，通过这些办法，放手他们大胆工作，在工作中锻炼提高他们的思想和工作水平，他们是能胜任和完成各项任务的。后来这些农干不但成为乡村的骨干，而且也成了后来县属有关单位的骨干和领导者。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香港归来献丹心

——忆南大校友陈燮

梁恩梅

陈燮生于1931年9月，广东省佛山市张槎乡人，12岁替本村富农打工，无法生活，跟随本村叔辈去香港打工七年多。祖国解放前夕，他白天打工，晚上在中共地下党举办的香港南方学院经济系读书。1951年，港英殖民当局追随美帝国主义，害怕南方学院革命师生的政治觉悟扩大，影响香港各界人士的觉醒，特别是在香港南方学院宣传马列主义，革命师生积极捐款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爱国行动掀起高潮时，它悍然采取镇压措施，于当年6月无理强行封闭了香港南方学院，6月15日被迫宣告结束。陈燮在地下党老师及林焕平院长引导下投考南方大学。

## 南大精神变行动 奋发工作多贡献

1952年2月陈燮于南大毕业，被分配到广东省供销合作社当干部，次年二月参加共产党。他牢记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奋发工作，从1952年至1957年，连续六年被评为本单位的一等先进工作者，其中1954年还被省

直属机关评为广东省三等模范工作者，1955年3月，出席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召开的全省劳模大会。他的主要事迹是：1954年陈燮被省供销社派到石围塘建造仓库，为乙方代表（代表省供销社）。他正视自己年青、工作经验不足的缺点，牢记毛主席“要密切联系群众”和南大“朴实、虚心、勤劳、勇敢”校风的教导，深入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提合理化建议，虚心选择和采纳群众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建造方案，既达到不降低建房质量，又节省工料，为国家节约资金30多万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 深入基层锻炼

1958年初，省政府决定各单位抽调一批干部到粤北山区支援工业建设。省供销社因陈燮是骨干，原计划下调名单没有他，但他认为深入基层锻炼，应该是自己的志愿，因此，便主动再三请求下调，领导为他的积极诚意所感动，批准他下调，并安排他为领队，于1958年调到位于乳源县的南水水力发电工程局工作。到南水水电工程局工作后，要租用农民的牛栏作住房，生活条件差，但他仍坚持工作。后调到曲仁煤矿，这里条件更差，夫妻分居在各自的男、女大宿舍，男宿舍不但噪音大使人无法入睡，且睡的是漏雨潮湿的地板。工资待遇方面，由于地区差别，同等工资级别，到了曲仁，每月比在广州地区要减少7元多，但他毫无怨言，处处以自己是南大学员、是共产党员而严于律己，始终保持冲天的革命干劲，积极工作。调到曲仁近40年，多次被评为本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1987年和1990年两年先后被评为韶关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工作者；

1992年3月被中国煤炭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授予“优秀煤炭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干部”称号；1993年获韶关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十年来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称号，并获“创业、开拓荣誉证书”。

## 舌耕一生 笔耕不辍

陈燮三十多年来，一方面舌耕——从事理论教学课程，努力宣传马列主义；另一方面笔耕——从事政治理论的写作，经常参加政治论文的比赛。他经过南大熔炉的锻炼，对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党史等特别有感情，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几十年来常常秉烛夜读，划重点、做笔记、写体会。他为革命而学，学习中理论结合实际，融汇贯通，用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原著的精神。因此，从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常常被邀请到韶关地区师专向大专学生讲社会科学、哲学、党史等课程，给韶关市党校学员、曲仁工人大学学生（国家承认学历）、曲仁党校学员、曲仁中学教师、韶关市电大学生讲课。曲仁矿党委为了提高党员素质，每年安排党员分批到曲仁党校轮训，陈燮每期都主讲重要课程。曲仁矿党委为提高基层党支部书记的马列主义水平，每年亦办班数期，大部分课程也由陈燮担任。此外，每年还都为曲仁矿务局机关干部及所属八个矿的机关干部分别上几次大课。他讲课前都先到该单位向领导了解听课对象存在什么活思想（正反两方面的），然后联系实际备课，听过他讲课的市党校学员反映他讲得通俗、生动、易懂，深受学员的欢迎。

和好评。为了切实搞好理论教学工作，更好宣传马列主义，他白天照常上班，处理本单位正常业务，晚上在家动笔杆，进行备课，长年累月，备课至子夜是常事，任务紧迫时还备课至通宵达旦。三十多年来，他备课写文字，无法计算，如用重量计写下的稿纸不下三十市斤。他的一生，是努力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一生。

## 无私解囊 献钱献血

陈燮除工资收入外，并无其他收入。他的工资不高，未婚前女朋友合共一个存折，一起存钱，至1957年时存款不到1000元。那时他在省供销社工作，一位同事是南大校友，其兄因跌断腿，要住院，陈燮便无私地把这个存折送给这位同事为兄长治病。结婚后他省吃俭用，至1964年4月，俩口子存款也仅有4800多元。当时曲仁低工资，生活困难的职工不少，他多次无私地将存款全部送给有困难的同志。更可贵的是，陈燮还经常自动无偿地为他人献血。六十年代，曲仁矿山医院没有储血设备，也没有预约供血人员，但矿区时有工人工伤，急需输血抢救，陈燮每逢听到广播动员为伤员输血的消息，即使在夜半或寒冬腊月，他都自动立即奔赴医院无偿地为伤员输血。三十多年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为伤病员无偿输血有18人次，共输血5,400cc，其中15人次用于井下重伤工人，还有一个机关干部病重的母亲，一个是矿机关干部大病的儿子，一个是胃大出血的司机。

## 带头劳动 艰苦奋斗 保持晚节 廉洁一生

陈燮患高度近视，在曲仁矿山工作三十多年，经常戴着1900多度近视眼镜，用橡筋箍紧在两只耳朵上，若是丢掉眼镜，不但不能做事，连走平路都不行，但他仍经常带头参加矿井劳动，矿井大工身上有多少汗水，他身上就有多少汗水，在进行挖煤劳动时，汗衫湿透，拧得出水，便干脆脱下汗衫、光着膀子干。三十年来坚持以身作则，与工人同劳动。有一年，在曲仁矿务局的河边厂工作时，公厕堵塞了，他带头第一个跳下最底层去挖大粪，直到挖通为止。当时由于人多，工作面窄，在传递大粪上坑外时，他头发上、口角边、脸上、耳朵旁都沾有粪便，使在场干部、职工、师生深受感动。

他一生艰苦奋斗，质朴可敬。无论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或是改革开放、生活改善的年代他也从不讲究吃穿，一生中没有几件好衣服，近年来有几件较体面的外衣，都是香港亲友回来探望时赠送的。直到1995年夏天，仍穿补钉的汗衫，吃的是清茶淡饭。七十年代，矿务局属下有个经济独立核算单位，电话通知他家属前去免费领取一套时髦的呢质沙发，他家属很高兴，准备前去领取，他却对妻子说：“凡不是按规定分配、不是人人都有的，就不要去领取。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应该保持共产党员的晚节，做到不贪不婪。”说服家属没去领取。他一生廉洁，自觉抵制灰尘的污染，直到生命终结时，仍是两袖清风。

## 桃李花成果 栋材树有头

陈燮于1992年退休，退休前是中共广东省曲仁矿务局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长。他从南大毕业当干部以来，曾任副科长、科长、副处长、曲仁矿务局格顶矿党委书记等职，并兼任《广东煤炭报》编辑、编委，曲仁矿务局侨联副主席，技术职称为高级政工师。他一生表现积极进取，党委委以重任，并非偶然。青年时代，他就受到地下党革命思想哺育，学习马列主义，初步树立革命人生观，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后经南方大学革命熔炉铸炼之后，牢固地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在党的谆谆教导下，坚定了把党的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终生奋斗目标，实现把自己的青春和一生奉献给祖国。

更值得提出的是陈燮同志退休后，参加省煤炭厅编写煤炭志的编写工作，认真负责与苦干，因病晕倒在办公室，抢救无效死亡。逝在工作岗位上，为革命奋斗到底的人生可敬可佩。记之以示怀念。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新丰历程点滴

伍绍铭

我是南大二期学员，在新丰县工作、生活了近五十年。回想起当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地方土改和经济建设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 （一）

1951年5月，曲江县土改试点结束后，我们南大96名学员，在广州休整数天后，便打起背包，坐上货车，经过两天的旅途颠簸，于5月25日晚上到达新丰县附城区沙江桥，然后步行三公里到县城，当晚住在县政府。

解放初期的新丰县城，方园不足一平方公里。建筑物全是砖木结构，街道狭窄，主要街道是条“丁字街”，宽不足四米，长不足500米，路面铺的是鹅卵石。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工厂。仅有几间打铁店、鞋店和南门坝的造船厂，都是民间的小手工业作坊。商业也很萧条，国营商业仅有一间贸易公司，一间新华书店。中共新丰县委会在章祠和潘氏宗祠内办公。县政府则设在旧学宫。县城人口只有1000多人，

其中包括 600 多农业人口。

到新丰来的南大学员，小部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大部份是刚入伍的知识份子。“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能在这样一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贫困山区县搞土改，参加这场空前伟大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为受剥削的农民打好翻身仗，接受革命锻炼，大家情绪都很高涨，决心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者。

## (二)

6月1日，我们作为新丰县农民协会土地改革工作队，被派到农村去。当时全县分为4个区56个行政村。

解放初期，农民的生活十分贫苦，往往割下禾头无米煮，生活极其困难。而且农村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贫苦农民手里。我们下乡后，根据当时基层干部不纯的情况，一面监控原有基层干部，给他们上土改课，动员他们分清敌我界线，站到贫下中农这边来，接受考验；一面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坚持住贫吃苦，不搞特殊化，这是土改队员的一条纪律。与根子（最可靠的贫苦农民）同吃一锅粥，同睡一张床，日晒雨淋同劳动，对于我这个生在城市、长在海边、五谷不分、言语不通、思想感情、生活习惯与贫雇农都有很大差距的青年，真是极严峻的考验。加上水土不服，又患上疟疾，身体虚弱得不成样子。每月发36,000元（旧币）津贴，给养微薄，生活艰苦。但我想起世世代代的贫苦农民，都是这样吃苦捱过来的，我不能临阵退缩当逃兵，于是暗下决心接受考验。

我们土改队员，白天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访贫问苦，关心农民的生活，做农民的贴心人。通过根子做好诉苦串连工



作，组成贫雇农小组，树立贫雇农在农村的优势，开展对敌斗争，斗地主，分田地，胜利完成了土改任务。

### (三)

历时三年的土改，进行多次的整风整队，我们南大参加土改的干部经受了考验，成长很快。在政治思想上、工作能力上、政策水平上都有很大提高，群众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立场坚定，世界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土改结束时，一大批土改干部被批准参党参团，有30多位同志上调省和粤北区分配工作，在此之前已有10多名调清远土改和几名技术人员归队参加经济建设。

在1952年春整队及以后的批判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中，把工作上的某些不足和党内的不同认识，当作右倾和地方主义批判，造成了不良效果，以及后来反右及十年文革中，部份南大校友受到冲击、批判和处理，有的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生产达二、三十年之久；有的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她）们都能牢记“甘当勤务员，甘当孺子牛”的准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以后的几十年生涯中，默默地工作，贡献自己的毕生力量。最后部分校友评上了“经济师”、“会计师”等职称。如李石星、梁博学校友，他们新婚不久，李被错划为右派，株连到梁博学及其儿女，受到各方面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度过了劫难，看到了拨乱反正，现在他们一家5口，个个都是大学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石星曾二度评为韶关市党史先进工作者，1991年评为省党史先进工作者。梁博学评为县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还

有曾逸之、李荫宏、易宝光、张作英、卢元柏等同志，为新丰县文化、经济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受到群众的爱戴。

当年参加新丰土改，1953年留在新丰分配工作的有56人，最后在新丰离退休、安度晚年的有17人，他们是：刘守经、刘世基、刘奇锐、李石星、梁博学、易宝光、伍绍铭、曾逸之、张作英、彭俊仕、吴秀光、卢元柏、黄宪明、邓庆鄰、李荫宏、**陈高模**、**黄道全**。

诗以记之：

南大分飞五十年，峥嵘往事岂如烟。  
欣逢校庆重欢聚，久练身躯学半仙。  
信念不因风雨改，雄心那受境时迁。  
迎来跨纪挥鞭日，共赞神州分外妍。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土改花絮

曾宪拔

广东土改是从三个试点县——兴宁、龙川、英德开始的。

1950年11月底一个冬夜，南方大学第一批150名学员，服从学校分配，坐“猪笼车”（无座位的火车货卡）北上英德参加土改。火车到站后已是深夜，随即步行到县城，到县立第一小学“安营扎寨”。在营地见人群熙来攘往，男的女的，老中青的都有，他们都是先期到达的“土改兵”。他们中有中共中南局机关的领导干部，有省直各机关的干部（主要是农业、卫生战线干部），有粤北区党政机关的干部，也有英德县、区、乡的本地干部，加上我们南方大学和北江公学的学生兵，共1600余人云集县城准备开展土改斗争。群众奔走相告，整个英德都沸腾了！

土改兵团经过近半个月集训学习后，分别开赴全县六个区。全面铺开土改运动以前两个月已在石灰铺开始试点工作。我被分配到二区（浚洸）。改组后的二区区委书记是黄丽英（省商业厅处长）、副书记卜翰书（省民政厅科长）。浚洸是除英德县城外最大的圩镇，水陆交通较便利，商业较发达，是英西商贸集散地。当时区委决定先集中力量在浚洸乡（包括镇）重点开展土改运动。我分配到浚洸乡岑南村（在圩旁东

郊)，由岑南、墩顶、科兆三个村组成一个单元，单元组长是省来的王同志，他进驻墩顶村。我们岑南村由10个土改队员组成一个工作组，组长姓苏，不久因犯错误调走，区委任我为组长。工作进入分田地后，我们又去三江乡土改。1951年12月底，我和几位南大同学又被调往翁源县支援土改。直至1953年土改结束，留在翁源安排工作。

土地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之一的“基础工程”。参加土改运动，既是改造客观世界，又是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伟大革命实践。我就土改运动大潮中掀起的小浪花叙述几个侧面：

## 一、执行政策成“恩人”

八十年代初，我从英德调回韶关，安排在韶关教育学院（前身是地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1981年的一天，学院中文系教师熊肇勤对我说，他母亲来韶探望他时曾偶遇我，但不敢相认，当她问明我是谁后就对肇勤说，我是他的“恩人”。我说我都不认识你母亲，怎会是你的“恩人”？他说老家在英德县三江乡洋坑村，母亲告诉他：土改时他在浚洸中学读初中，村干部因他家是地主，有钱在外读书，不肯分粮食给他，那时若不是我写条子给村干部，指示要分粮食给他，他就要退学，读不成初中，更不可能读上高中，考上大学，也就当不到今天的大学教师了（熊肇勤后为副教授、中文系主任、市政协委员）。他这一说，我想起来了。那是1951年7月间，我在三江土改，在新联乡任乡组长，曾住在熊肇勤的家乡——新联乡洋坑村。熊的父亲早逝，母新叫卢亚娇，生有四、五个儿子，熊是最小的儿子，当时十四、五岁，在浚洸中学读

初中。卢亚娇靠丈夫遗下的田产，一部份出租，一部份靠雇临时季节工耕种，当时被划为小地主。土改退租退押期间，夏收秋收的谷物是按人口现收现分的。土改总政策中的阶级路线规定，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倒地主。分配政策则明确规定，地富家庭成员在分配口粮和田地时，应和贫雇中农群众一样，人人分得一份。当时我已离开洋坑，住在大路下村，驻洋坑的土改队员向我反映村干部不肯分粮食给卢亚娇在外读书孩子的事情后，我写了个条子给洋坑村农会干部熊火光，嘱咐他一定要一视同仁，分给地富家庭每一个成员，包括卢亚娇读书的孩子一份粮食。使人意想不到的是，三十年前我仅仅是执行了党的政策，按政策办了件小事，却影响到熊的毕生前程。可见党的政策的严肃性、效果性及其深远意义。对党的政策任何时候都不应低估，不能马虎，不应随意打折扣，应百分之百地执行。因此，“恩人”不是我，也不是任何个人，而是共产党。

## 二、“大义灭亲”事后知

1953年土改结束后，县里征求我留翁源还是回原籍工作。我说，男子汉志在四方，革命工作在那里都一样，何必要回原籍。并表示即使到将来，也是“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甲裹尸还”。结果我留在翁源县委办公室工作。1956年找到了对象，结了婚、成了家，正式在粤北落地生根。我妻子许惠玲是翁源周陂大坝屋人。结婚后，我才了解她的家史。她祖父许汉青是二十年代翁城中学（原尚同中学）的教师，娶妻谢亚苏，因是包办婚姻，加上没生孩子，所以，后来又娶了个小学教师邓淑珍为妻。邓生下四个子女。祖父染伤寒病

死后，邓祖母又生下一个“遗腹子”。随后便带着五个子女回韶关，住在西河长兴楼（今西河市场地址）。原配谢祖母因没有儿子，便乘机设计把邓祖母生的大儿子（八岁）骗回周陂抚养，后来就成为我妻的父亲。小时，谢祖母常带着她去三华娘家探舅公，她知道这舅公家很阔，有座四阁楼的大屋，屋旁有防空洞，他娶了几个老婆，每人住一间房。家里有长工耕田，婢女做勤什。舅公不知当什么官，每次回来都请姐姐们“欢聚”，鸡鱼肉丸吃不完。我问妻子这舅公叫什么名字？她只知道母呼他为“阿隆”。听到这个介绍使我回忆起往事：1951年12月底，我从英德调到翁源参加土改，被分配到三区（六里）三华乡任乡组长。为了配合各区、乡运动的开展，县里通知凡有恶霸地主、反革命人犯押在县监狱的，都可以提出押回批判、斗争或宣判。我们经过反复发动群众揭发、摸底、取证，提出镇西村上楼（四阁楼）的大地主，曾任国民党翁源县第七区（利龙）伪区长谢则枢（在押）应该拉回来批斗宣判。1952年5月底谢则枢从县里押回三华乡。第二天，我把谢则枢的罪状报请上级批准，经县人民法院审判。由我主持召开全乡群众大会，村群众对官僚恶霸谢则枢进行面对面的揭发和控诉，最后由县人民法院庭长当众宣判谢则枢死刑，立即执行，由行刑队拉去河边枪决。为民除害，群众拍手称快。这个谢则枢乳名就叫“阿隆”，正是我妻子的舅公。真是无巧不成书，世界那么大，事情却那么巧，我刚结婚就贴上了“大义灭亲”标签。

### 三、英德“三粥”考验人”

搞好土改运动，最根本的工作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发动

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倒地主阶级。把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的贫苦农民发动起来，首先就要从思想上感情上和他們打成一片，建立信任关系和政治感情。所以，土改工作队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就是“三同”，即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同住不能挑那户贫雇农吃得好就到那户吃，那户贫雇农住得舒服就到那户住，而是要“住贫吃苦”，选那最贫穷、受苦最深、历史又清白（英德当时做过土匪的人很多），为人又诚实正派的，当然最好是敢于斗争的农户去“扎根”，以便通过他（或她）去“串连”，扩大“队伍”，这就要深入的做好“访贫问苦”的调查工作。

解放前，英德农民穷苦是出了名的，有不少人因穷当了“飞车党”（爬火车抢货物）；或铤而走险去“打家劫舍”、“半路剪径”，做经济土匪；或去顶替别人做壮丁，反复“卖猪仔”去当国民党兵。我们初到英德时，原县委书记李冲就向我们介绍英德有“三多”：山多、土匪多、国民党兵多。所以，在英德搞土改，“三同”关不好过，尤其是有些地方生活习惯特异，比如“三粥”，就十分考验人。

一曰“擂茶粥”。西牛、水边和黎溪一带的农民因缺粮天天吃“擂茶粥”。每户都在自己的菜地旁或山边坡地上，种有十颗八颗茶树，每天清晨采些茶青回来，把茶叶用瓦盆先擂成膏药状，加点油、盐、姜，然后将煮好的粥、茶浆冲撞而成。生活好点的农家，也只能加点磨碎的花生、芝麻或其他配料。这种“擂茶粥”，没有吃过的人，进口就觉得苦、涩、辣、腥吞咽不下，甚至反胃呕吐。当地人吃惯了会觉得甘、甜、香、爽、滑，在县机关工作的本地人，假日回老家去享“粥宴”。而土改队员与“三同户”共同生活了一、两个月，觉得生活很苦，谈“粥”色变。

二曰“灰水粥”。三江片的联群乡、新联乡一带，不少村庄的农民就吃这种“灰水粥”。制法是：先将水稻禾秆烧成灰，然后把秆灰放在水里浸泡一定时间，过滤成“碱水”，用瓮装起，常年备用（一年制几次）。每天早上放一定量的“碱水”去熬粥，一锅粥吃一天。没吃过的人，进口就感到一股馊坯了的馊粥味，会反胃恶心咽不下。外地人要经好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若能适应后，又觉得好快肚饿，因它含碱性，特别“消食”。因此，土改队员为了填肚子，逢圩期便跑几十里路去集贸市场上买碗大米饭加一块巴掌大的红烧肉来“改善生活”。但那时是“供给制”，没有多少生活费，无条件经常去“赴圩”打牙祭。

三曰“麦羹粥”。五区明迳、岩背一带石灰岩地区，石山多，耕地少，除部份村庄有少量水田外，都是石头山上的小块地。有些村土改分地时，不是按亩而是按块计算。据说有户农民分到三百零几块地，有天他上山劳动，数来数去都不够数，后来他拿起竹笠帽回家，才发觉竹笠下面盖着一块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嘿嘿大笑起来。

这些石灰岩地区石头山上的小块地，只适宜种较耐旱的包麦（玉米）庄稼，石山属喀斯特地质，下面窿洞和地下河多，村庄和地面普遍缺水，蔬菜也种不活（因无法天天浇水），村民的生活用水也生有串串沙虫。农民生活十分艰苦，一日三餐吃“麦羹”。即将玉米碾成碎粉熬成粥，早上熬好一锅吃一天。也没蔬菜送，生活好些的农家可买点豆豉、大头咸菜伴送，一般穷家只能加点盐“白吃”。农民吃“麦羹”不分餐数，劳动时饿了就回家去搯两碗灌下又下地去。土改工作队员只能依“老皇历”一日三餐守规矩，肚子饿了也不敢或不好意思回去搯二碗吃，时间长了就觉得很难捱！个别队



员因受不住那种苦，熬不住那种饿，开小差逃回广州去，成为英德土改运动中闯不过“三同”关的一个典型事例。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教书育人的苦与甜

陈世松

我是南方大学二期三部九班的学员。我在1950年8月底入学，翌年3月底毕业离校。在南大礼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陈唯实副校长作了讲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你们要绝对服从毕业分配，到革命工作最需要的地方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几句铮铮的掷地有声的话，深深地刻印在我脑海里，体现在我的行动上，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

毕业典礼散会后，我们近千名同学即分乘敞顶汽车到省教育厅报到。便饭后，集合开会，由省厅领导宣布分配工作名单。分到韶关的共有33人，我是其中之一。当晚9时许，我们乘火车北上。到达韶关下车时，已是翌晨6点多钟了。当天，我即被分配到韶州师范学校工作。一个装被帐衣服的布袋和一个手提的竹筐，便是我全部家档了。

当年（1951年）10月至翌年2月，我被抽调去参加阳山县大坪的土改工作。吃了几个月的“麦羹”（玉米碎末煮成的汤水），并经过热火朝天的土改斗争，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所在。

土改结束返回韶师后，学校安排我担任班主任工作，并

任语文教师。教书育人的苦与甜，也就从此开始了，而且断续地品尝了数十载，至今仍香留齿颊，终生难忘。

我从此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旧生。记不清过去多少个春秋了，只是清晰地留下了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每当我回顾往事时，就会像特写镜头那样，一个个地在我眼前跳动闪现。闻名省内外的童话作家饶远，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我案头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他送来的多本著作。这既是他的骄傲和光荣，又使我感到异常的荣幸和欣慰。因为，我作为他的语文教师和班主任付出的艰辛，终于结出硕果了！

是的，当班主任付出的劳动和心血要比任课教师大得多，接近学生的时间和思想交流也较多，彼此关系也自然比较密切。当时学生全部住校，我经常下班指导他（她）们温习功课；每晚熄灯后，我都要到男生宿舍巡视，检查他们的蚊帐放好没有，会不会被蚊子叮；冬天看看他们的被子盖好没有，会不会受凉感冒。他们每篇作文（两周写一篇），除改错漏字和不通顺的句子外，还加眉批和总评，做到认真细致，不惜花费大量时间，每晚都要到11、12点钟才能就寝。除此之外，还要安排节假日进行家访。班内56名学生，每学期都普遍进行家访一次以上。还要抽空同其他任课老师交谈，了解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思想表现，便于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帮助克服缺点，发扬优点。

记得潘丽英同学家住韶关市平治巷的一间窄小的平房内，她父亲早逝，母亲没有固定职业，靠做临时工维持清贫的生活，因而在班里评助学金时，总是比其他同学多2元。当时，每月伙食费有8元就可生活下去了。从而激发了她的勤奋好学，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尊师爱友，成绩优良，成

为全班乃至全校最早参加青年团的学生，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她毕业分配工作没有多久，就被提升为中共韶关市委秘书科副科长。她说：“如果不是你陈老师的关怀帮助，我就不会进步得这样快。”

又如朱树根同学，住在东河木板桥边的一条破烂的小艇上，靠母亲摇船渡河为生。他母子俩对我几次家访表示由衷的感激，从而激发了他积极向上，由后进生变为先进生。事隔数十年，我离休后，他常来探望，家电出了毛病，都是他免费修理，并常打电话问安。

还有李慧明同学，由于她地主家庭出身，母亲姐弟又居住在香港，她毕业分配去号称“西伯利亚”的阳山，当时思想包袱很重。我此前曾有针对性地引导她阅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这时又多次找她谈心。我现身说法，以心引心，诚恳地说：“我同你一样，也是地主家庭出身，我妻子也是归侨，属海外关系复杂的那一类。省教育厅分配我到韶关山区工作时，心里比你还要难受，我多么想回到潮汕与妻子生活在一起呵！然而，想到个人应服从组织，想到要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便愉快地接受了分配，到韶关山城来了。不然，我们还成不了师生关系呵！”还谈了其他人生道理。她终于弄通了思想，高高兴兴地到阳山工作去了。开始她被分配到一间山村小学教书，由于她工作出色，几年后就被调到大崧公社小学任教，后来提升为教导主任，又提升为校长。她在阳山开花结果，直至退休。十年前我和她两夫妇在香港探亲解逅相逢，她还能如数家珍似地说出我当年与她的谈话，真是感慨万千呵！此后，每年7月18日——我的生日，她必寄138元来向我祝寿。她婉谢我的劝告，动情地说：“数字是心声，祝老师健康长寿，并祝年年

发财！’

最使我难忘的，就是1956年我任韶师一丙班主任的50多人的班集体，全部来自珠江三角洲。他们初来乍到，感到一切都不习惯，称韶关同学穿的是“山精服”，称常煮豆腐的饭堂为“和尚庵”等等，我多次与他（她）们谈心疏导，他们终于习惯下来，情绪也稳定了。后来，有2人入了党，有23人入了团。毕业分配时，绝大多数留在韶关地区工作，分去乐昌就有20多人。他（她）们大多数都成为骨干，有的当了中、小学校长，有的成为特级教师，荣称模范教师的更不计其数。1980年初秋，我曾在乐昌与他们21人相聚会餐，菜多，酒多，话也多，谈了三个多钟头，还余兴未了，除合影留念外，他们还要我题辞，我即兴写了“二十年后重相聚，桃花依旧笑迎春”以表情怀。1984年秋，我到珠海探亲，五九届学生19人，在梁汉斌（任市教委副主任）、黄兰金（任小学校长）两同学牵头下，又找我相聚会餐。他们对我当年为之挂蚊帐、盖被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津津乐道。他们带来七、八部小车，硬要我坐国贸大厦周总经理乘坐的豪华小车回住处，以表尊师之情。

最使我难以忘怀并感叹不已的，就是1956年春，我被韶师推荐到广东教育行政学院北京语音班学习，取得了全市第一个汉语讲师资格证书。回校后，除在校内积极推广普通话教学外，还在韶关市政府举办的汉语学习班授课，每周三晚、每晚授二节，时任市长陈仲舒，体委主任梁仪、区长徐光平等领导都是学员，我一进课室，陈市长就高喊“立正”，全体学员起立，我心里感到莫大的荣幸。事隔四十年，陈仲舒同志一看见我，仍以“陈老师”相称，一种甜滋滋的感觉在心里油然而生，觉得“为师一时，受敬一生”，依然充满着莫大

的荣幸。我想，如果还有来生的话，我依然愿意当一名教师，即使生活清贫一些，也心甘情愿，至死不辞。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在于教育，科技兴国，是千古不灭的真理！但愿教育事业万古长青常新吧！。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粤北农业改制的概况

姚良宗

五十年代，我在粤北区党委、韶关地委办公室工作期间，耳闻目睹了各地开展单造改双造的耕作制度试验，即简称单改双，并试验“一年三熟”制。我还参加了重点的调研和总结工作。

## 一

据历史资料记载，粤北原有水稻单造田 130 万亩，占全区水田总面积 33%。按其耕作制度来划分，主要有早禾、大禾、晚禾三大类型。早禾田多分布于连县星子，乐昌坪石、梅花，连山太保，还有新丰、英德一些乡村，共约 35 万亩，占全区单造田总面积 26%；大禾田是以仁化，曲江，乳源，连山永和，乐昌九峰，始兴青化，南雄上龙、付竹、太坪等地居多，共约 73 万亩，占全区单造田总面积 55%；晚禾田主要分列于北江中下游，即清远的清东、清西、清北的围田和英德沿河一带，共约 22 万亩，占全区单造田总面积 19%。

在此三类单造田的地方，也有少数形成了“一年两熟”，

甚至“一年三熟”的优良耕作制度。

构成早禾田、大禾田的原因很多，或因自然条件（主要是水利、气温、土质）所限；或因田地多、劳力少，肥料不足，力不从心；或因以林业、副业为主，把农业置于次要地位等等。晚禾田形成的主要原因，则是地处低洼，北江于“大满”前后泛滥，或暴发山洪灾害，稻田常处于浸淹状态，难以种双造作物。尽管单造田的成因不一，情况复杂，但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就是土地利用效率很低，耕作较为粗放，增产潜力很大。

单造区乡在陆续完成土改复查、转入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之后，都或多或少地开展了单改双试验。据单造田较多的连县、乐昌、南雄、连山统计，1955年单改双共82,475亩。估算全区单改双共约17万亩。

全区单改双试验，大都是获得了成功。

1955年，据乐昌、南雄、始兴、连山的不完全统计，水稻单改双共1,863.88亩，全年总产926.5担，亩产497斤，比上年增产50%，比原单造增产21.7%。

1956年，全区单改双共58万多亩，占原单造田面积44%。其中，双季稻382,324亩，占改制面积65%；种一稻一杂20万亩，占改制面积35%。在“百年大旱”的袭击下，仍然获得增产。据曲江、乐昌、始兴、连山、连县、连南统计，共单改双208,454亩，增产28万担，亩产比单造增加133斤。仁化单改双36,000多亩，增产的有九成半；翁源单改双18,000亩，有七、八成增了产。

但是，1956年在全区单改双中，仍约有20%比单造田减了产。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约有8000亩没有从实际出发，把不适宜改的也改了；二是约有4000亩错过了季节，加



之下肥少，或种子混杂等；三是约有 2000 亩遭受旱虫灾害。

## 二

在全区单改双获得成功的背后，也曾经历过困难和挫折，决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

连县（今改连州市）星子区（后改公社，今改镇）的改制情况，就可加以说明。

1955 年，星子单改双 2，251.91 亩，总产量 9,007.65 担，平均亩产 400 多斤，与原单造水稻比较，总产略增，而亩产却稍减，劳大利小，事倍功半，当地干群出现思想反复，播响了“退堂鼓”。当时，县委和区委领导也产生思想动摇，打算收缩单改双试验面积。

时任粤北区党委书记的张根生同志，要我从农业处和连县农业科抽调十多名技术人员到星子调查研究，提出可否建议。

我们在星子分头走遍了单改双较多的乡村，勘察了自然条件和少收或失收的晚禾标本；又深入与当地干群座谈了解，搞清了早晚造从犁耙田，浸播种到抽穗扬花、收割或失收的一系列整个耕作管理过程及其具体情况；还派人到县气象站收集到星子区和其他区历年逐月的温度、阴晴、雨量、刮风等统计资料；然后，结合水稻的生长特性，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作出相应的结论。

我们认为，星子区的平原和丘陵地带的自然条件，包括水土、气温、日照、无霜期、刮寒露风的时间等，都适合于种双季稻。连年晚稻之所以少收或失收的关键，在于当地干群不重视晚稻生产，耕作粗放，管理不善，特别是没有从早

造改起，适当提早浸播种和选用中熟种，致使晚稻抽穗扬花未能避过寒露风。因此，1956年的单改双，要先从改变提高干群的思想认识入手，要坚持大改，要从早造改起，围绕“早”（早造惊蛰浸播种，立夏前插完秧；晚造芒种浸播种，立秋前插完秧；两造都选用中熟良种为主）、“细”、“多”（一年两熟或三熟）做好“文章”，并提出一系列精耕细作的技术要求。终于获得星子区委、连县县委和粤北区党委的领导认可，付于实施。

1957年2月中旬，我受韶关地委第一书记林名勋同志的指派，又从农业处和连县农业科抽调了十多位技术人员到星子总结单改双的经验，刊登《北江通讯》第167期，加以推广。

1956年，星子单改双获得成功。全年种双季稻16,764亩，比上年扩大64.4%；总产58,674担，比上年增产551.3%；平均亩产为475.8斤，比上年增产18.9%，比原单造亩产420斤增长13.2%；同时，种一稻一薯12,500亩，总产稻谷37,500担，对比上年面积和总产均增加25%；番薯总产15万担，比上年增长66.6%。还推广“一年三熟”（冬种绿肥为主）25,000亩，比上年扩大66.6%。

1957年，计划种双季稻26,764亩，比上年扩大37.4%；一稻一薯25,000亩，比上年扩大31.5%；并适当扩大“一年三熟”面积。

1958年，星子实现大公社化。1960年，整风整社，大公社调整为小公社。翌年，又进行以大队为基础，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调整，加之遭受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挫折。由于体制几经变动，难以用相等的总面积、总产量进行计算比较，只能用单位面积产量进行对比，如单改双获得显著成

功的 1956 年，水稻年亩产 475.8 斤，1961 年下降为 221.5 斤，直到 1976 年才恢复到 1956 年水平。1985 年，水稻年亩产跃为 784.1 斤，比 1956 年增长 64.9%。1995 年，水稻年亩产又增长为 935 斤，比 1956 年增长 75.4%。

如果把星子镇 1995 年早晚稻分别进行计算对比的话，则晚稻总产为 174,260 担，平均亩产 829 斤，总产比早稻少 2,220 担，亩产少 11 斤，分别少 1 个多百分点，而早晚稻面积已持平均 21,000 亩，基本消灭单造田，而早造总产则大为增加。并使全镇已实行“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了。

### 三

我们从粤北（包括连州市星子镇）农业改制成功和在挫折中前进的事实中，不难看出，农业生产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各项目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客观内在的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如果我们加以正确认识并掌握利用其规律的话，那末，就能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否则，就会起到阻碍、制约，甚至促退的作用。

具体地说，单改双要具备如下条件：（1）水利：一般常年不受旱，年均降雨量在 1300 公厘以上；（2）温度：一般年均温度在摄氏 16 度以上，4 月份平均 15 度，10 月份平均 17 度以上，全年无霜期不少于 250 天；（3）日照：平均每天日照 6 小时以上；（4）土质：非属湖洋田、烂漕田、锈水田等，平均每造每亩施肥（优质家栏肥）不少于 15 担；（5）劳力：平均每个主要劳力负担约 5 亩双季稻的耕作。凡坚持上述条件的，则改制必成，否则，必败。上述条件不够具备的，改种一稻一杂（含杂粮、马蹄、芥菇等），也可获得成功。待改

善条件后，再改种双季稻。有条件的，还应实行“一年三熟”制。

在耕作技术上，坚持从实际出发，适时浸、播、插、管、收，不耽误农时；精耕细作，适当增加犁耙田、耘田除草的次数，及时施肥、除虫、抗旱；科学排灌；选用中熟良种为主，适当搭配早熟良种；尽量不用迟熟种，不断选留优化良种。星子从1978年开始，积极试验推广“杂优”，对提高晚造单产起到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领导要正确组织指挥，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大力引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使此三者密切结合，相互促进，也是改制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否则，只能落得个失败的结局。星子水稻总产和亩产，从1980年开始，逐年增长，终于在1995年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的事实，是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分不开的。

让我们以史为鉴，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坚持生产技术的革新，除弊兴利，继往开来，一往无前吧！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解放初期农村的一些乡规民约

陈家骥

我先后参加曲江县和新丰县的土改运动，当时农村的政权是“一切权力归农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采用一些简朴的乡规民约处理事情，收效很好。特记叙一、二。

(一) 轮流派工。一次区政府下达分路段派民工抢修公路任务，农会要先派人前往40公里外的公路路段了解任务情况和安排民工住宿的地方。我问农会会长派谁出工，农会会长拿出花名册一看，轮到某甲某乙，就派他们前去。吃饭时农会会长到他们家通知，交下任务。我了解到某甲生活比较困难，最近已上山扎营砍柴。隔天我见到他的家属，问某甲回来没有？她说：今早已出发去看公路了。后来我问农会会长这种派工方法是谁定的？他说这是群众大会上大家商定的，有什么任务，按花名册轮流派工，除有病或外出可以推下补上。我看花名册上都是一些青壮年的名字，有任务按大家定的“乡规”自觉遵守。

(二) 按损失赔偿。一天傍晚有个农民到农会会长家报告说：邻居的牛吃了他家几十棵禾苗。农会会长问他知道否？有无去核对？农民说他知道了，也去看过了。农会会长说我替

你们登记吧，待收成时再赔给你。原来这也是群众定下的“乡规”。放牧牲畜，不留心看管，吃了别人的农作物，要按损失数量赔偿，但要等到农作物收成时兑现。这条“乡规”定得好。只要双方认证，就无争议。

（三）接力通讯。这是解放初期在没有电话又无公路通车的情况下的一种很有效的通讯方法。当时农村的通信，全靠邮递员每天背着沉重的邮包步行，翻山越岭地一村又一村地送，还要兼收代寄信寄钱的任务。偏僻的村庄要几天才能送到。有时上级有紧急指示或通知，基层有紧急请示，就靠这种接力通讯，这也许是解放战争打游击时留下的好办法。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开群众大会，时间已近11时，突然邻乡送来一急件要送交区政府，我们这个乡是最后一个站，但这里离区政府尚有三十多华里的山路。农会会长立即叫来两个民兵，要他们马上出发，把信送交区政府。两个民兵二话没说，马上回家拿来一大扎“芒杆”作为点火照明之用，就马上出发了。隔天午后，我见到其中一个民兵，问他们昨夜何时到达区政府，他说大约凌晨三点钟，敲开区政府大门把信交给值班的同志，由另一同志带我们去洗澡、吃夜宵和休息。今天上午吃完早饭就回来。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水稻生产的历史性飞跃

——记仁化县推广三系杂交水稻的片断

黄雪梅

仁化县自解放后，水稻生产经过单造改双造、直播改插秧、高秆种改矮秆种等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当时的农田基础设施较差，耕作技术落后，特别是人少田多劳力不足，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仍处在低产状态。据资料反映，从1949年至1972年这二十多年，平均一造亩产都是在300斤徘徊。

1976年开始，仁化县由试验示范到推广普及三系（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杂交水稻，使水稻产量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至1996年全县全年插水稻186412亩，其中杂优稻16.8万亩，单产每亩936斤，年亩产1,872斤。从而摘掉了低产县的帽子，跃上水稻高产县的行列。目前，仁化县农村，一造超千斤已很普遍。康溪村谢文星1.5亩田年亩产达到2,510斤。

与粮食飞跃发展的同时，人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用科学种田，种田讲科学已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从播种育秧、插秧抛秧、肥水管理、露田晒田以至除虫灭病等一系列农活技术，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

质。在杂交水稻的冲击波影响下，使长期禁锢的保守落后思想受到猛烈的冲击，对林、牧、副、渔等整个大农业也发生了积极的震撼。可以说，一场种子革命带来了思想革新，其意义是深远的。

我于七十年代在仁化县农办工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一些推广杂优活动。在实践中有如下的感受和体会：

一、要解放思想，勇于接受新生事物。三系杂交水稻是湖南省有杂交稻之父之称的袁隆平教授等研究成功的。湖南省是推广杂交稻最早的省份之一。仁化县与湖南省汝城县毗邻。近水楼台先得月。1975年，仁化县农技干部到汝城农科所参观杂交水稻后，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汝城县农科所为帮助仁化县推广杂交稻，伸出友谊之手，希望仁化县派出农技干部和劳动力跟随他们一起到海南岛繁制种子。种源（父母本）由他们出，技术由他们教，场地由他们定，费用均摊，收成按劳分配。条件是很优待的，机不可失。仁化农业部门决心大干，闯一条新路。计划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要派出技术员，连同县农技干部一起到海南跟班学习繁制种。可惜，由于县革委个别领导墨守成规而使计划受阻。这位革委领导说：搞杂交不是什么新玩艺，资本主义国家都搞了几百年了，也没有搞出什么新名堂。无奈，大干计划只好变成小打小闹，仅仅派出邓耀坤、江茂林等4人，于1975年冬随汝城农科所到海南岛跟班学习繁制种。并引进他们的33斤“南优”杂交种子，于1976年上造在麻塘农科所播下38亩大田。夏收将到，眼看丰收在望，农业部门特邀请了县委主要领导到现场视察指导，组织机关干部实割验收，平均亩产750多斤。试种成功之后，使县委领导开拓了视野。从此，把推广杂交稻摆上了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为以后推广杂交稻奠定



了坚实基础。

二、坚持典型引路、样板指挥的领导方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推广杂交稻。仁化县从试验到推广杂交稻，首先碰到的阻力，是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杂交种无优势论。他们认为，增不增产在于肥，只要肥料充足，常规种一样能增产；②神秘观点，怀疑观点。有的农民说：耕了一辈子的田，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稻谷也有公婆之分，是胡编出来骗人的；③条件论。持抵触思想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认为杂交稻是“皇帝女”，肥田可以种，瘦田不能种；田少人多的地方可以种，田多人少的地方不能种；耕作水平高的地方可以种，耕作水平低的不能种；富裕的地方可以种，贫穷的地方不能种；温暖的平原可以种，高寒的山区不能种。

针对这些思想，仁化县有关领导大力进行正面宣传教育，讲清杂交稻能增产的原理，允许在学术领域上有不同观点的争鸣；认真加强麻塘农科所发展杂交稻的示范力度；与此同时，从县到各公社都选择了不同类型、不同条件的地区进行试验示范，有的百亩连片，有的在同一块田搞对比试验示范，全县形成了一个杂交稻的试验示范网络。这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兴趣和关注。有的成群结队去看试验田，有的静悄悄地到田间细心观察，有的上门向能者求教，有的四处索要资料，形成了一股“杂优热”。到了收成季节，杂交稻更是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各级领导和农业部门，不失时机地组织有代表性的干部群众进行实收实割。当场过秤，当场丈量面积。其结果，在同等条件下，一般是杂交稻比常规稻增产30%左右，有的超过50%以上。在事实面前，对不同思想认识的人，都上了生动一课，产生认识上的飞跃。

三、不断革新，不断进取。推广杂交稻，也有一个不断认识，不断革新，不断进取的过程。仁化县在推广杂交稻的初期，杂交稻只有单一的“南优”组合，它虽有优势一面，但其明显的弱点是抗逆性差，容易倒伏，抗病虫害能力弱。初期由于没有掌握它的特性，防治措施不得力，曾先后在多处发生严重稻瘟病而导致保产甚至减产。从而刮起了一阵冷风。一些原来就反对杂交稻的人说：“南优南优，又难又没有！”“南优南优，确难确忧！”有的说：“我早就断定杂交稻不是个好东西，还是老老实实靠常规种吧！”那时杂交稻面临着前进还是夭折的严峻考验。在县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农业部门急流勇进，知难而上。一方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如实地向群众讲清“南优”种的性质以及植保工作上的教训，鼓励大家不要泄气。另方面广泛收集信息，寻求新的更好的杂交稻组合。经过同行人的上下配合，四方协作，终于先后找到汕优64、汕优63、威优35、汕桂33、D优63、D优64等组合，经过试验、示范，完全适应仁化县的具体条件和耕作水平，充分显示了它们的增产优势，扎根于广大农民之中。今后相信随着历史的推移，必将出现更佳更优的杂交稻。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乳源土改杂忆

梁 力

由于形势需要，南方大学第一期学员提前在1950年8月底毕业。我因入学前学农科，故分配到省农林厅（现农业厅前身）属下的石牌试验场（现省农科院前身），负责长湓分场的管理工作。1951年参加由省农林厅、卫生厅和中山大学部份师生组成的省土改工作团粤北分团，来到乳源参加土改工作。解放初期的乳源县城，十分简陋，没有一座楼房，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只见低矮残破的泥砖瓦房，且和农村混居一起。县政府就设在一座貌似祠堂的旧学府内。

乳源是个小山区县，解放前素有三多之称：即山多，石头多，土匪多。交通不便，加以部分地方属石灰岩地带，严重缺水。三区的西山冬天要跑十多里路去取水，二区有个古母水乡，以前叫作苦无水乡。

参加第二批土改乡的工作时，我被分配到大布乡。这里是最贫困的地方之一。时值冬天，农民衣衫单薄破旧，小孩寒冬腊月还穿单裤，更谈不上穿鞋袜，手脚被冻得红肿，使人难受。

这里的贫雇农祖祖辈辈就在极端贫困的恶劣环境中度

过。农民大多是文盲，能读到小学毕业的可说是村中的秀才了。大多数农民未到过县城，也不知汽车、火车为何物。见闻十分闭塞。有个笑话：有个农民土改积极分子，到县城开会买回一支手电筒，有次外出叮嘱妻子不要动它，其妻由于好奇心驱使，待到丈夫出门后，就急不可待地拿电筒来玩，打着开关后，不会关熄，她以为水可灭火，便把电筒放在水盆里浸，电筒之光虽然熄灭，但却弄坏了。

土改，对于来自城市的我们，却是个严峻的考验。首先要过好两关：一是语言关。因我不是客家人，学习语言能力又差，虽经艰苦努力，还是学不好，给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二是生活关。主要是住方面。贫雇农房子本来少而小，我们只能安排在堆放柴草兼作储物的房子，在禾草上打个铺垫作床，虽还温暖舒适，但到晚上就麻烦了，房子变成老鼠的天下，除吱喳乱叫外，还成群结队上窜下跳，甚至跑到被面上，使人睡不安宁。这使我们切身感受到贫雇农在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在恶劣的环境下为生存而挣扎的痛苦，增强了克服困难，坚定发动农民群众彻底消灭农村的封建势力，誓要胜利完成土改任务的信心。

1953年夏，土改胜利结束。农民分到土地的喜悦心情，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在我们离村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杀鸡杀鸭，都说要请我们到家里吃饭，表达出翻身农民对共产党热爱，对土改工作队辛劳的慰问深情。但全村二十多户贫雇农，全都吃遍是不可能的，可是去了这一家，不去那一家又不行，幸好我的“三同户”给我解围，叫我每家都去坐一会吃一点并要求各户也不把人留下，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这个办法，才度过此难关。翌日离村时，群众夹道相送，有的送鸡旦，有的送糍粑，充分表达了农民群众深厚的朴素阶级感情，使我

们难以自制，忍不住盈眶热泪。土改，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受苦农民翻了身，千年土地还老家。同时，我由原学农转为学计划工作。勤勤恳恳工作三十多年，为人民办了不少实事。一些老同事戏称我为“农转计干部”，真的一点不假。自我感觉不负叶剑英校长的教导，不愧为南方大学的学员。今虽退休，回忆土改难忘岁月，深感无愧此一生。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韶关市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回顾

陈 瞳

韶关市各县以及市郊农村信用社，从1955年创建以来，几经体制变动，直到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又进行了一次体制改革。现就不同时期的实践情况试作简略回顾。

## 七十年代前的体制概况

韶关市农村信用社，是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和马列主义关于合作经济的理论，伴随着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广泛深入发展，于1955年建立起来的。当时，其性质为资金互助组织，由各农户18岁以上成员参加，每股为2元，另交入股费1角。信用社通过存、贷款业务活动，广泛筹集农村闲散资金；支持社员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临时困难；打击和取缔农村高利贷活动；支持和促进农村生产互助合作化；支持和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那时，信用社、供销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合称为驶向社会主义的“三条大船”。信用社则被誉为“农民自己的”小银行”，不以追求盈利为目的，而以解决社员生产生活

困难为目标。信用社干部职工由领取“误工补贴”，逐渐过渡到半脱产，尔后全脱产，变成专业队伍。

韶关市农村信用社的体制变动较大的有三次。一是1958年12月，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变革，信用社与银行营业所合并组成人民公社信用社；二是从1959年4月起，信用社下放给人民公社属下的大队管辖，由大队统一核算；三是从1969年开始，信用社又划给公社管辖，职工不脱产，走亦工亦农的道路。由于体制多变等原因，从而影响了业务的发展速度。

## 八、九十年代的体制改革

### （一）客观形势呼唤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变。从80年代初开始，农村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经营成为主要经营形式。在此基础上，农村各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涌现了大量重点户、专业户，农村部分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业转移，走亦工亦农道路；农村从原来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要求农村信用社体制与之相适应，进行一次大改革。这也是信用社得以大发展的良好机遇。

首先，要求信用社以原来生产队为主要服务对象，转变为以承包户、重点户、专业户、新型经济联合体为主。其次，在资金来源与运用上，从原来吸存生活积累资金或待用资金为主，转变为生产经营性资金为主，存取频繁，数额较大；放款从原来支持农业生产费用和生产设备贷款为主，转变为支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农、工、商相结合，参与支持农村产、供、销全过程，要求信用社加大灵活性的力度。

再次，要求信用社改进结算方式，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此改革开放，城乡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信用社原来被“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1) 农行在领导和管理信用社中，把信用社当作自己的基层机构，淡化了它原来是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对信用社的机构设置、人员定额等都由农行决定；信用社主任由农行任免；信用社的存、贷款业务纳入农行信贷大包干计划，不能自主地充分运用；(2) 信用社业务经营缺乏灵活性。如放款的范围和对象狭窄，存、贷款利率和银行一致；(3) 信用社吃农行的“大锅饭”，亏损全由银行包揽起来，缺乏经营积极性和内在活力；(4) 信用社内部的责、权、利没有联系，干多干少没差别，干好干坏一个样，影响了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5) 一些信用社经济案件呈上升趋势，不正之风蔓延，有章不循，违章不究，自批自贷，乱支胡用等现象时有发生，其原因在于监督不严。

## (二) 改革的方向与目标

根据中共中央连续三年(1983—1985)的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信用社上述存在问题，其改革的方向，是不再作为农行的基层机构，改革成为归社员集体所有，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服务，实行“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经营上的灵活性)和“三自一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独立核算)的合作金融组织。

## (三) 改革的步骤与效果

根据中央和省农行的部署，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全市信用社的体制改革，在市农行的具体领导下，从1985年开始



至今，进行了三个阶段的改革。1985年至1986年为第一阶段，1987年至1996年为第二阶段；1997年起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的重点目标，是全面清股、扩股，恢复和加强“三性”，确立“三自一独”的经营模式，并为后两个阶段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主要措施有：一是从1984年5月13日开始，市农行在始兴县搞信用社改革试点。试点开始前，市分行、始兴县行、社共同组成调研组，到深圳、开平“取经”，制定始兴县信用社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付于试行，从中总结经验，解决问题，取得成功。二是同年8月，向全市行、社介绍推广试点经验，全面铺开。三是加强检查督促，通过多种形式组织交流经验，促进全面平衡发展。四是认真总结第一阶段改革的实践经验，使之与第二阶段改革相衔接。

全市信用社第一阶段改革的效果，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恢复和加强了全市信用社的群众性和民主性。1986年底，全市信用社股金总额为222万元，比改革前的1984年增长16.2%。同时，普遍补发了股金分红，实行了股金分红制度，凡属盈余社，原则上拿出当年盈余额10%以内金额，按入股金额分红。亏损社，则按一年定期存款利率计付股息，从股金利息帐户中列支。根据贷款政策原则，优待入股社员。在同等条件下，社员可以优先优惠贷款；对非社员贷款的利率，均规定利率向上浮动10—20%，改革后期，信用社都分别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重新建立和健全了理事会和监事会，行使实权。

2. 业务经营有了自主权，增加了灵活性。通过改革，农行不再下达信用社转存银行款的指令性任务，不再把它纳入银行信贷大包干计划。信用社的存款，除按国务院规定向农行交存30%的存款准备金和在两三年内有计划地松动1980

年6月底转存银行的“老钱”之外，实行多存多收可以多贷。信用社扩大了贷款对象、范围，用途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政策，放得出，收得回，预测有效益的，就可以发放。信用社在保证农业贷款需要的前提下，可以经营农村工商业贷款。此时，信用社实行贷款浮动利率。以农行规定现行的分档次的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下浮动20%。贷款利率浮动的原则，主要根据四方面：一看贷款对象用途，如困难户的商品生产贷款，为减轻其经济负担，可向下浮动，对于建房、结婚、耐用高档消费品等贷款，可以向上浮动。二看利润高低。如对工商、修理、贩运等行业，因其利润较高，可以上浮。三看借期长短，长的宜上浮一点，短的可下浮一点。四看政策性。从事国家鼓励的生产经营项目的，可以下浮，属于限制发展的，可以上浮。各信用社之间还开展了横向融资活动，相互调剂资金，利于同步发展。

3. 初步改革了劳动工资制度，初步建立了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责任制。从而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发挥了整体功能作用。如组织资金注重越多越好；发展存款，注重成本核算；资金运用，注重政策和合理；增放贷款，注重增效；加强服务，注重质量；勤俭办社，注重扭亏增盈合理开支，干部职工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4. 合理地调整、充实机构与人员，有利于提高工效与防腐兴廉。全市信用社1986年与1984年比较，独立核算机构148个，持平；干部、职工1,208人，增长12.2%。在改革前，全市还有186个“单人操作”的信用站，同一职工既是会计又是出纳，缺乏必要监督机制，当时是为了便民存取，实际上往往被其利用职权贪污挪用。通过这阶段改革，把其中20个单人操作的信用站合并了，余下166个站中1990年降

为 138 个，1996 年全部取消了，遂全面走向正轨营运。

5. 组建了市郊信用联社及各县信用社联社。农行通过联社加强了对信用社的领导和管理。以市郊联社为例，于 1983 年 4 月地、市合并时，市郊有环市、新韶、北郊、芙蓉、东郊等 5 个核算信用社，职工 38 人。地、市合并后，增建了南郊信用社，共为 6 个社。1984 年 4 月召开市郊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51 人，选出市郊联社正副主任。此时，信用社职工已增为 90 人，并于 1985 年建立了市郊联社营业部，对外营业。各县的县联社也于 1985 年度成立。尔后都分别设有对外营业部，既是领导管理机构，又是经济实体。

市郊联社和县联社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各个信用社的资金余缺，在全县和市郊范围内进行调剂，统一调剂信用社的盈亏；统筹解决信用社退职退休经费和亏损社的医药费；组织信用社工作经验交流，加强信息工作；管理信用社职工的培训教育工作；加强对信用社执行方针、政策和财务、帐务工作的检查。

6. 促进了全市信用社业务的全面发展。1986 年底与 1984 年底比较，各项存款余额 15,679 万元，增长 66.9%；各项贷款余额 12,045 万元，增长 72.3%；固定资产 772 万元，增长 4.4 倍。盈亏双向反映，盈余 188 万元，增 101 万元；亏损 65 万元，扩大亏损 51 万元。

信用社第二阶段改革，是从 1987 年开始的。主要根据“粤府 [1987] 40 号《批转省体改办、人行省分行广东省金融体制改革试点要点》”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在第一阶段改革状况的基础上，围绕“放开搞活、提高效益”的核心内容，进行新一轮的深化改革。经过努力的结果，使全市信用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全面发展了业务。1996 年底各项存款余额为 215,452 万元,比 1986 年(下同)增长 12.7 倍;股金为 14,064 万元,增长 62.3 倍;各项贷款余额为 162,951 万元,增长 12.5 倍;固定资产为 115,581 万元,增长 13.5 倍,当年盈余金额为 558 万元,增长 1.96 倍,亏损金额 3,729 万元,扩大亏损 3,664 万元(主要是应将未收贷款利息较高,政策性亏损;也有经营管理上的因素)。

2. 信用社管理体制已从农行的基层机构改革为“三自一独”的合作金融组织。

3. 在业务活动上,根据宏观调控、微观放开、合理搞活的原则,改变了过去限制过严过死的现象,改革为“三个为主”,即:放款以农户为主、以农业生产为主和以流动资金为主。在优先支农前提下,如资金有余,可支持乡镇企业,可以支持个体商业。但对个体商业的贷款余款,不能高于自有流动资金数额,贷款要办理担保抵押,一些信用社可与农行一起联合发放贷款,开通了结算渠道,方便商品流通。市郊联社和各县联社自办了辖区内往来结算,解决了信用社在县内或市郊内直接通汇问题。还参加了当地人行票据结算,提高资金利用率,减少了在途占压,受到企业和顾客欢迎。

4. 在资金管理上,从封闭式的管理方法转变为开放式纵横融资的管理方式。除按规定缴存、留足周转、提取呆帐准备金外,可以多存多收多贷,资金有余,可以纵横融通,参与市场调节。

5. 在内部管理上,按业务发展需要,既增人,又增效。1996 年底,全市信用社职工共 1,905 人,比 1986 年增长 36.6%。同时,加强思想职业道德教育,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配备专职稽核人员。通过“清资金、清财产、清帐

务”，针对问题，切实抓好规范化管理，实行“十制、十部一档案”。“十制”是：理论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制度；廉政建设制度；民主生活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工作业务汇报制度；贷款审批制度；经营责任制度；会计财务管理制度；坐班主任制度；职代会制度。“十部”是：学习登记部；合理化建议登记部；好人好事登记部；考勤登记部；贷款审批登记部；贷款监测登记部；会计出纳差错登记部；开户企业登记部；安全保卫登记部；会议记录部。“一档案”是贷款户经济档案。

6. 积极提高信用社干部职工的政治、业务素质。在第二阶段改革开始以后，市分行通过分期分批轮训基层所、社主任，并已全部脱产轮训过一次，发现和总结推广了先进典型。省分行信用合作处出了一本《怎样当好信用社主任》的书，收入笔者两文：一是《运用辩证法，发展山区商品生产》——记乐昌县九峰信用社主任潘考德；二是《石头山里办活信用社》——侧记乳源县红云信用社主任高耿华。这本书对提高各地信用社主任的政治、业务水平起到一定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加强干部职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并加强检查监督机制，实行表扬奖励与惩罚相结合，而以前者为主。现在，我市信用社干部职工队伍的基本状况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我市信用社的第三阶段改革，似可从信用社与农行正式“脱钩，即1996年12月31日算起，已由人民银行直接监管。发展情况如何，有待于今后查考。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务”，针对问题，切实抓好规范化管理，实行“十制、十部一档案”。“十制”是：理论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制度；廉政建设制度；民主生活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工作业务汇报制度；贷款审批制度；经营责任制度；会计财务管理制度；坐班主任制度；职代会制度。“十部”是：学习登记部；合理化建议登记部；好人好事登记部；考勤登记部；贷款审批登记部；贷款监测登记部；会计出纳差错登记部；开户企业登记部；安全保卫登记部；会议记录部。“一档案”是贷款户经济档案。

6. 积极提高信用社干部职工的政治、业务素质。在第二阶段改革开始以后，市分行通过分期分批轮训基层所、社主任，并已全部脱产轮训过一次，发现和总结推广了先进典型。省分行信用合作处出了一本《怎样当好信用社主任》的书，收入笔者两文：一是《运用辩证法，发展山区商品生产》——记乐昌县九峰信用社主任潘考德；二是《石头山里办活信用社》——侧记乳源县红云信用社主任高歌华。这本书对提高各地信用社主任的政治、业务水平起到一定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加强干部职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并加强检查监督机制，实行表扬奖励与惩罚相结合，而以前者为主。现在，我市信用社干部职工队伍的基本状况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我市信用社的第三阶段改革，似可从信用社与农行正式“脱钩，即1996年12月31日算起，已由人民银行直接监管。发展情况如何，有待于今后查考。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粤北艰苦岁月纪事

谭桂琼

1950年秋，强烈的求知欲，促使我离开广西玉林地委办公室的岗位，选择了南方大学。同年冬，时势又把我推上土地改革的前沿。

“土改”是暴风骤雨式的战斗。解放初，由于英德县的反革命武装还很猖狂，加上活动频繁的几只老虎，因此我们下乡时大都带上两支枪：长枪用作打老虎，短枪用来打土匪。

## 土匪挡道又奈何

1951年初夏的一晚，我到离住地最远的“山天”去宣讲阶级政策，与民兵队长同行，在距离目的地尚有六、七里的“猪屎峡”处（两山夹一经），前路被树枝箠竹堵得严实，并听见路旁有人钻动声，我马上把电筒关掉，反手拉住往回跑的民兵队长，同时向有声响处开枪，“噍”的一声有人应声倒地，我们随即退到另一边树丛中向周围射了两排子弹，然后轮流点射，目的在报信求救。由于情况不明，我们不敢进退，只在就近换地打枪。果然，不到半个小时，住在较近的

一个民兵小队长便带来了十几个民兵和一群村民，我马上布置封锁几个路口，并派人召集较近地区的民兵来增援，等待天亮搜捕。天明时便在山沟一棵树下抓到一个大腿受伤走不动的男子，他目不转睛地狠狠瞪着我说：“哼，是我大意，没想到被女人的枪打伤了我。如果不是司令交待要活捉的话，我也不至如此……”他供称是“反共救国军铁路兵团连江支队”的人。司令和参谋长已逃脱，被抓的这人，据说是副官。此事汇报县委后，区委书记陆奕年告诉我：他被批评了一顿，说不该派女同志去负责这些地方的工作。其实黎洞是四区最开阔的中心地带，但当时英德土匪活动猖獗，受袭击干扰过的何止一处。第二天我在其他村抽调两位队员与民兵队长一起仍去进驻该村，深入发动群众，对这个不是匪属就是通匪的小村，宣传党的政策和惩反条例，讲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并发动群众诉苦，发动群众报上当，争取贫苦农民以团结大多数，分清阶级队伍，讲清土改政策，按计划分田到户，掀起生产热潮。同时，发动群众剿匪，抓回几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在复查时镇压了。

## 撞到老虎又怎样

1951年初冬一个残月的晚上，我独自到黎头咀去取材料，供区委书记急用。9时左右，回程经过河边山路转弯处，突然碰上一条棕黄色的大家伙，我第一个意念认为它是野牛，即时拔枪上弹。“呼”一声它冲上了山，把路边的竹丛钻出一个园洞，我伸头举枪一看它像猫窜般两下就不见了，我失望地退出子弹，耿耿于怀回到住地。敲了好久才来开门的老陆，惊奇地问我有没有碰到大黄斑虎，我才感到害怕，却风趣地



答：“慌什么！我们正好面对面，我不小心上弹“迫”一声把它吓跑了，可见老虎还是怕人的。”其他队员都围过来问这问那，我说“你们的枪呢？要来干什么的？才听老虎远远的呼啸就把大门关得紧紧的，我叫了半天也不开门。”弄得他们啼笑皆非。当晚那条老虎在黎头咀咬了一头猪。第二天我回去就与民兵商量，找到一条要处理的老母猪为引饵，在最佳射击点的屋顶上等了三晚，它才出现。中了三枪的老虎，还大吼着向开枪处冲，那虎爪子入墙三寸，令人毛骨悚然，直到中了十三枪才倒下。从此在太阳未下山就关门的群众才过上安定的日子。

## 野猪咬人也猖狂

分到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面对丰硕累累的果实，野猪也分外眼红，它们成群结队为害农作物。应群众要求，我及时组织民兵按地域分工捕杀野猪。一天，我随十多个捕猎队员上山，其中有两个猎手还带上猎狗。进山不久，猎狗便追出一条大山猪，我迅速爬到山顶按狗赶野猪的信息大声传递目标方向。突然那条被打伤臀部的野猪直向我冲来，嘴“嗒、嗒、嗒”咬个不停，我拔出左轮枪一排五发都打中它，但却未伤及皮肉，它更疯狂地朝我咬来，我依着障碍物迅速躲避，幸被较近的猎手一枪把它打倒才救了我，当大家轮流抬着这100多斤的猎物回去宰了分给各家时，许多人都跑来看我，并说受伤的野猪比老虎更疯狂，绝对惹不得。

## 在粤北司令部

粤北区党委，那是一个团结、善战、紧张、高效的指挥部。1952年3月8日我调到北江地委，后在粤北区党委办公室工作。区党委统领广州以北包括从化、花县、和平、连平在内的20多个县，办公室只有20人，大都是从土改的乡组长、单元组长中调来的“南大”校友，直接参与制定领导运动的政策、措施，协助领导指挥全局的日常具体工作，在首长们行动影响下，我们刻苦、忘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 山林分配试点

土改中的山区山林分配工作有其特殊性，为了摸索经验，领导选择了全区山区代表性的乐昌大源联合乡为试点。我们进驻的茅坪村，是松、杉、什树与毛竹为主的综合林区，乡民以耕山为主，番薯是主粮，春天把薯苗插在前冬炼过的林地里，不用任何培育，秋天就可收每条两三斤重的番薯。两三户为一村的居民，住在就地取材、用树干做墙的杉皮屋，用毛竹破开做涧架起引来长流水直通厨房。山水清彻透亮，不管多脏的衣服泡在水中一、二个小时不用洗也很干净。当地群众难得食米，连盐也少吃，成年人多患“大颈泡”，特别是女性，10多岁起，就患大脖子病。在这出门就要爬山的山沟里，十户八户为一组，分居方圆几十里。我们住的两个较大自然村，分别在两个山头，平时鸡犬之声相闻，开会大声一叫就通知到了。看似不远，但下山上山，却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工作组五天到大源集中汇报一次，从早到晚来回

足足要跑两天，真是苦不堪言。一位在河南省来的同志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地方，退休后我一定要写一部‘茅坪记’，永远记住这个‘缘’，告诉我的小孩。”我们在这里苦战三个多月，做出了“山林分配”的具体方案。

## 保护农村工商业

南雄土改，侵犯了地主在城镇的“烟行”，被告到省委。区党委派我们办公室几个人，并从始兴、南雄抽调几十人组成工作组，由当时的县委书记江伯良亲自指挥，到烟区的保卫、胜利、和平三个乡进行试点。对如何区分封建剥削与工商业的界限，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工作。我负责的和平乡在原惠阳地委书记钟俊贤帮助下完成了任务。

## 大生产运动和互助合作

在区党委领导机关工作，我们常被派去各项工作的最前沿搞试点。土改结束后，如何开展大生产和解决生产中的互助合作问题，我又被派驻曲江马坝“刘福”互相组去蹲点摸索经验。“刘福”互助组在龙岗乡的欧山村，这是个血吸虫高发区。我们从春耕的准备工作开始到解决“双夏”的耕牛、劳力等安排问题，认认真真地进行了探索总结。当时还有下乡考察的方方同志在一起，得到他的许多帮助、教育与关怀。

1953年，韶关地区遭遇百年罕见的大旱，我被调回办公室负责掌握灾情的汇报。当时机关在37℃高温下停止办公，而我们仍要伴着坐镇指挥的领导苦战在电话机旁。晚上9点至第二天9点，是我们规定的值班办公时间。

在司令部工作是紧张艰苦的，但当领导层在开会研究决策时，我们便有短时的轻松的团聚，用稿费上馆子，交流所见奇闻，跳舞、唱歌，偶尔也爬上黄皮树饱尝一顿黄皮果，或摘白玉兰花。工作虽苦，生活却多姿多彩。

## 离农经商仍为农

1961年9月我被调到仁化县，正逢恢复供销社建制，我好奇地尝试去县社当了主任。时值国家缺粮困难时期，在县委财贸书记的指导下，通过办“贷栈”形式千方百计从各地调进大批食品、糖、油、代食品，为严重缺粮区解决匮乏，抢救水肿病人作出了最大努力。为开发山区资源，扶助土纸、苗竹生产，我们还建立了各种基地。并抓住机遇、利用一切可能由供销社牵头，开辟了仁化到文台，文台到江南，长江到圻岗，长江到冷饭坑（因文革影响只开到学堂坳）几条公路。还为县水利建设提供几十万元资金，通过业务活动调进大批计划外化肥、骨肥、麸肥、农药，为服务农业生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调到始兴商业局（与供销社合并），从邓小平同志复出、抓革命促生产开始，我们就抓种苗、技术等关键措施，扶持农村生产，大搞养猪、种果、新法繁殖三鸟良种，提高养鱼技术，不但达到猪肉自给，而且还上调了大批生猪。同时，还引进繁育温州密柑47万株，建立了一批初具规模的养猪、种苗、果树生产基地。组织工业品下乡，保障副食品供应等工作也受到省的好评。商业局被评为省的先进单位。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情系韶关 甜酸苦辣考忠诚

——在韶关五十年的片断回忆

曾繁礼

## 一、考入南大

1949年7月初，我从广州回到了解放后的家乡——蕉岭县。8月底，新学年即将开始，县人民政府决定全县中、小学领导班子进行改组，由此，我被区人民政府任命为同声小学校长。除日常教学工作外，还要配合区、乡的中心工作，如支前、征粮、查田、定产、兴修水利等。1949年寒假，我参加了县举办的“中、小学教师学习班”，学习班结束时，我光荣地参加了共青团组织。

1950年暑假的一天，区委书记张小林通知我，说区政府同意我去报考南大。8月底我在县城参加了南大入学考试，9月初，考试放榜，我有幸获得录取。接着又到梅县地区复试。9月12日我与梅县地区南大新生一起乘车前往广州，投入南方大学怀抱。

## 二、接受教育

入学后，我分配在一部九班十二组，我当副组长。上课

了，先学“社会发展史”，2000多名同学齐集礼堂聆听陈唯实副校长或李又华教育长讲课。陈唯实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具体，深得同学们的喜欢。下课后则回到宿舍进行小组讨论。学完一段则写心得、小结，周而复始，直至学完某一课程为止。课余还参加打砖、建校等劳动，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吃饭也在大礼堂，八人一席，同学们或蹲或席地而坐。伙食很好，油多菜足，饭热菜香。几个月下来，不少人的体重都有了增加。当时学习、生活、劳动虽然紧张，忙碌，却忙而有序，心情舒畅。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广东土地改革由三个县扩大到十个县，曲江是其中之一。华南分局在南大二期2000多学员中挑选了800多人进入土改班学习，我有幸被选上了。进入土改班后，主要学习土改的有关政策、法令。结束前每人还进行了三查：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1950年12月的中旬，学校举行了出发前隆重而热烈的誓师大会。方副省长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说到“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令与会者激动不已。12月20日下午我们700多同学在黄沙车站乘敞篷车北上，于当晚深夜抵达粤北重镇——韶关。新的一项历史性战斗任务正等待我们去完成。另100多校友先前已出发到英德县土改。

### 三、参加土改

我们到达韶关以后，在地委学习了几天，年底曲江各区土改队便分头下乡。我分到一区——马坝，然后又分到坑口。一同分到坑口的一共有19位同学。坑口有五个行政村一个街道。到了坑口又把19个同学分成6个组，我和余学经、蔡炽

煌分到三村，余学经任组长。

坑口一带，原以石角为中心，京广线开通后，中心才移至坑口。这里地处曲江、英德、翁源交界地，情况比较复杂。当时土匪未肃清，农民生活困难，群众觉悟不高。要把群众发动起来，需做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我们下到三村以后，了解到不少群众的亲人因上当受骗而在土匪队伍中；还有春节来临，不少家庭已经米缸空了。面对现实，我们狠抓八字运动：“清匪、反霸、退租、退押”。清匪有解放军负责，我们只协助大军发动群众上山搜查。在扎根、串联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开展退租退押。我们除在本地开展退租退押外，还到英德、翁源等地进行双退。通过双退，解决了贫苦农民过年与春荒的口粮，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在这个基础上又以三村为试点，划分阶级。1951年5月，坑口一带基本上分完田，土改胜利结束，建立起石角与坑口两个乡政权。当我们离开三村时，群众敲锣打鼓一直把我们送上火车，才依依不舍离去。

曲江土改结束，我们又集中到韶关。经地委安排，我们一区与二区、郊区的工作队分到连县，其余的则分到阳山、南雄、从化等地。

5月17日，我们南大同学145人，曲江翻身农干50人，在袁德峰同志率领下，坐火车到达坪石。第二天由坪石步行至宜章一六住了一晚。第二天，连县派了三部汽车到一六接我们，于当天到达连州。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连县县委召开了一个有2万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会议开得热烈隆重，令我们激动不已。在连州几天，我们觉得连州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落后，相反却觉得不错：城区面积较大，好几条大街都建筑整齐，店铺鳞次栉比，人烟辐辏，呈现出一派热闹繁

忙景象，真不愧为千年州治了。

6月初，我们到达东陂——三区政府所在地。6月底，在李振辉组长带领下，一行7人，来到卫民乡。在这里我们一直战斗到年底，直到这个乡分好田建立了政权为止。

卫民乡南距东陂几华里，四面环山，中央一片平畴，村庄都建在山边，山青水秀，是搞好农业生产的好地方。工作队7人，其中郭丰茂、林佩球分在白家城（一百多户大村），黄元兴、罗远新在过水洞，张惠泉在×村，我在山下洞，李振辉则居中调度。山下洞村有30多户人家，有三个自然村，大部分姓曾。这个村地富较多，光是地主就有4户，阶级对立比较尖锐。在发动群众中，让群众分清什么是宗族亲与阶级亲是个关键。于是，我们采取了揭露封建地主制度罪恶的方法，让贫苦农民认识他们的族长的真正面目。因为地富较多，阶级划分便以我村为试点，各村均派代表参加。4户地主中，有3户地主比较明显，容易划分，另一户曾绍晋，他本人是主要劳动或附带劳动成为关键。在大会上村干部拿着算盘，让他自报一年参加主要劳动时间，结果算出他为附带劳动，应划为地主。划为地主意味着房产和田地得将没收。曾绍晋当场便昏倒在地上。

春节前卫民乡土改结束，建立了乡政权，李绍亮当选为乡长。后来这个同志进步很快，曾任连县县委副书记以及佛岗县委书记等职。

1952年春节后，我们根据县委的部署，来到附城区良江单元的和西乡。不久这个乡的乡组长蔡子壮同志另有任务调走了，组织上叫我接替他的工作，这样，我便当了乡组长。过了一段时间，北江地委在韶关召开土改扩大会议，全县乡组长以上的干部都到韶关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是



整顿土改干部队伍，与会同志揭发了连县县委在土改中犯的右倾错误。半个月中，省委秘书长赵紫阳同志均坐镇连县会场，一直没有离开过。

地委扩干会后，县里又召开了1000多人的干部大会，历时十几天。这次大会除继续揭发县委领导的错误外，还处理了不少在土改中丧失立场，违法乱纪的土改队员。原良江单元的组长××，因在二区土改时打骂群众，被清除回家。在这次扩大会上我被提为单元副组长。两次大会后，地委改组了连县县委，县委书记、副书记均调离连县，还处分了一些部长和区委书记。

通过整队，干部思想觉悟提高了，队伍精干多了。为了集中搞好重点，暂时收缩了面上的乡，良江单元三个乡的工作队都集中在良江乡，直到重点乡划分阶级以后，我们才回到和西乡，其时已经是1952年的夏天了。

和西乡南距连州仅几华里，东陂河在中间流过，把全乡劈分为二。这个乡村庄分散，由最南的喻屋寨村到最北的白蜡潭，要走七、八里路。除东面河谷一带有不大的平原外，均属山地，山坑田多。居民操客家话，连州土话，四会话。我住的高车墩村，他们操的连州土话，不大好懂，因为近城，大部份的人都可听懂广州话。

和西乡的工作队除我、郭丰茂、蔡焯煌，罗新辉四人是南大同学外，其余都是当地农干。在和西乡我们除按土改部署进行工作外，还着重注意了干部的选拔与培养。一个乡的土改能否成功与巩固，干部是关键。我们在和西选拔了一批出身好，吃过苦，年富力强的干部，如陈纪炉、罗成坤、邓华珍、邵荣松等人，由他们组成领导核心，放手让他们干，使他们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我们工作队尽可能只作参谋，

少指手划脚。在这些干部领导下，和西乡的土改搞得比较扎实，群众发动比较充分，斗争果实增多，仅次于重点乡元潭，位居第二。土改结束，这个乡被评为一类乡，并成为土改后首批建立党支部的乡。随着附城区土改的结束，于当年的冬初我们回到连州，休整后准备进军连山。

连山，是北江区最后一批土改县了。它紧邻广西贺县，全县面积1265平方公里，当时人口约7万多（现在是10万），少数民族人口占了一半。在我们进连山之前，有一批连县土改队伍已在前一段时间下到一、二区（大保、永和）开展工作。我们后去的主要到三、四西区（福堂、小三江）。

约在11月份，我们到连山的工作队，从连州步行出发第一天到达吉田，第二天翻越一区与三区之间的大山——茅田界，然后到达永丰。在永丰分工后，我带了6个队员前往肖溪乡，它是我们进行土改的最后一个乡了。

肖溪乡含三个自然村，主要村庄为肖溪。该村有100多户人家，地富较多。村中只有一座可容几百人开会的大祠堂，相当宽敞。村民为梅县丙村杨家移民后裔，几百年下来仍操客家话，实属难得。

由于要在春耕前的三个月时间分好田，我们进村后，先组织起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划分阶级，接着便分配土地。当时分配土地主要在自然村中进行，相差悬殊的才进行调配。分配原则是大缺大补，小缺小补，不缺不补。在这个村，贫雇农有百多户人家，要使贫雇农都分得满意，需做大量细致的工作。我们先把全村的土地进行统计，按人口算出每人（含地主、富农）应分土地的数量，然后再把可分配的土地抽出来（地主的没收、富农的征收地、公堂田等），写清每块的地名和亩数，把纸条粘贴在祠堂墙壁上。通过比

劳比苦（这一点很重要）排出分田先后的次序，最后便分田，在大会上念到谁的名字，该分多少田，便由他自己去拣，并把它登记在卷，直到分完田为止。

三、四区土改在1953年春结束。由于三、四区的工作队，上级规定留在连南分配工作，这样我们便回到三江——连南县城，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 四、留在连南

我到连南后，通过分配表，知道自己分在文教科任副科长，科长为张铨怀，另一副科长为唐彪（瑶胞）。随即，县委通知张铨怀和我到韶关参加北江区中学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班，地点在北江中学。

当时北江地区十多个县（除现在韶关、清远两市外，还包从化、花都）800多个中学教师均集中韶关。思改班由文教处李凌冰副处长负责，干部来自华南分局党校、土改队、华师团训班。连县、连南基层负责人，姓杨，来自华南分局党校；干事有我、张铨怀、赖生（来自连县），秘书则由团训班高中毕业青年担任，每个基层干部约有10人左右。思改班的主要任务是使教师们通过大会听报告、小组学文件，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主动交代自己的家庭、历史，社会关系，思想倾向等，写成书面材料，开展批评、分析与批判，然后谈今后的改造计划与决心。我的主要任务是辅导老师们学好文件，帮助他们进行分析与批判，整理材料等。连县、连南基层老师主要来自连中、连师、星江、西溪、连南、连山等中学，有七、八十人。这次思改，成绩是主要的，不少老师通过学习，认清了形势，与党接近了一步；更多的人放下了包

袱，为今后工作轻装前进打下基础。

4月初，思改班历时两月宣告结束，我们又回到连南。回到连南以后，其时连山、连南已经合并。组织上分配我到法院任秘书。

我在法院工作了四个月，于8月初来到南岗，任副区长。南岗为连南一区，北距三江30华里，下分六个乡，6000多人口。瑶族地区，生产落后，解放前处在刀耕火种水平上。我管生产、管文教，一年到头均在下面蹲点，除总结、布置工作外，很少回到区政府。当时瑶胞耕作极其粗放，水稻种下去以后，不大讲究施肥、耘田、除草。要改变他们这些习惯，改进耕作技术，提高产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54年10月，我在南岗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以后，组织上调我到县卫生院任指导员。院长黄新志同志，出身部队卫生员，懂点业务。全院30多个医务人员，绝大多数为解放后毕业于卫生学校的年轻人。医院医疗力量比较薄弱，疑难病人都须送连县卫生院或粤北人民医院医治。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院长做好工作，处理日常文件，计划、总结是我的份内事，每天查房，我也跟医生一样穿着白大褂下病房，既是学习也是了解情况。当时并无卫生局，卫生院还要管区卫生所的事务，有事我还得下去处理。1955年3月，县里贯彻“三不”政策（不斗霸，不划分阶级，不分田），这是华南分局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省民委主任罗明同志带了一批干部来到连南，为了配合这一工作，县委抽调了大批机关干部下到一区。我任一区副队长去到油岭乡，刚好罗明同志也在油岭，这样我便成了他的助手。我们在这里工作了三个多月，直到6月份写完总结，才回到卫生院。

## 五、上调韶关

县委为贯彻少数民族地区干部须实现民族化的精神，这样，汉族干部便得分期分批调离连南。县里总结“三不”的护干会后，我与20多位上调的同志一起来到韶关。我被分配到广东省第六干部文化学校任文化教员。因这间学校与党校一起，又未挂牌，师生员工的组织工资关系均在党校，故又叫党校文化班。

这间学校招收的是本地区区级以上党员干部，通过三年文化学习（小学五、六年缩为一年，初中三年缩为两年），达到初中毕业的水平。教师一部份来自土改队，另一部则为华师专修科的毕业生。在这里教书，要比中学强得多，因为教师只管教书，学员的思想、生活不必你去操心，他们自己会管理自己。

新学期开学后，地区机关全面开展肃反运动。因我在读初三时集体参加了三青团，读高二下学期时为同学选举任分队副，在文理读书时又分别参加过真理学术社与长啸剧社。故运动一开始，便受到审查。在地区公安局工作的张惠泉同志，他劝我要把所有问题如实向组织交代，争取主动。我听从了他的忠告，把所有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上交给学校领导。后来在长达半年多的运动中，领导除反复审查我与一位同学的关系（高中、大学同学，他曾任学校三青团区队长）外，其余均未涉及，皆因所有问题，我已主动交代过。1956年1月，肃反运动基本结束，校长安子山同志找我谈话，说我本应处分（有历史问题的往往要受到记过、降薪、降职的处分），因交代得好，才免于处分。

春节以后，我因病在粤北人民医院住院两个多月，4月份回到学校一直到学期结束，均在学校休养，始终未上过一节课。文化学校对我的关怀与照顾，令我终生难忘。

1956年8月，我由文化学校调到地区森工局，先当秘书，后到生产科任主办科员，主管木材价格。当时，木材价格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农民砍伐木材的积极性。自解放至今，木材砍伐已有多年历史，路边水边的木材已经砍得差不多了。边远的、深山老林的木材若要砍伐，却受到价格的限制。根据了解，赣南森工局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较有经验。第二年夏，我便与另两位搞价格的同志前往赣州，通过他们介绍，然后去到全南县。在那里，我们学习了他们用补贴里程运费解决价格不合理的做法，觉得很好。回来以后，我到乐昌召开了全区价格员会议，并下到林区武阳司亲自测量里程，制定了每推进一里便补贴多少的办法，然后在全区推行。这样一来，农民便不必考虑到边远地砍伐木材划不来了（因为木材价格是由国家定的，地方只能根据远近进行补贴）。

1957年11月，领导找我谈话，说要加强坪石森工站的工作，要我到那里去当站长，这样，我便由韶关下放到了乐昌。当时心中虽然不乐意，但南方大学的培育，叶帅的教诲，铭记在心，仍然以革命利益为重，服从组织分配。

## 六、下放乐昌

根据领导的安排，我按期来到坪石森工站。该站负责乐昌北部10个乡、镇的木材收购与储存，每年须完成10多万立方米的数量，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当时站里有20多个干部，梅花、黄埔还有两个组，有问题还须下去处理。我很少坐办

公室，大部分时间都与采购员一起到场或下乡收购木材。虽然辛苦，心情也很愉快。

1958年6月，干部下放，领导要我到梅花去办林业中学。在金鸡岭下，我们通过师生的双手建起了教室、礼堂、厨房、宿舍等建筑（均用杉皮），且相当宽敞。整个下半年与1959年上半年，全校师生近200人，边劳动、边上课、半工半读。尽管艰苦，却其乐融融。但好景不长，5月份上级一声令下，解散所有农、林业中学。当宣布解散时，师生们都哭了一场，然后才不得不挥泪而别。斯情斯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林中解散，乐昌县教育局安排我到坪石中学教书。坪石中学在老坪石街，原称乐二中。在解放前的原中山大学旧址上，建起了广东省连胜纪念中学（纪念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徐连胜将军），1950年乐昌接管了这间中学，改为乐二中，后又改为坪石中学。该校高初中仅十二个班（初中九、高中三），学生最多时有300多人，教职员工40余人。我去了以后，负责教两班同一单元的初中语文，还兼一个班主任。不久则教初、高中各一个班的语文，仍然要做班主任。教语文最感头痛的，就是批改作文，每两周作文一次，必须全批全改。我只好利用星期天批改作业，甚至去看望爱人，也背着作文本到她那里批改。尽管我为此勤恳，认真地工作，谁知却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

1966年夏，文革开始，工作组进校，我却首当其冲，受到冲击。11月，在全国“内清”当中，我受到“削职为民”的处理。1967年3月，两派学生联名向教育局提出要给予我生活费，这样，教育局才每月发给我一半工资（36.5元）。1968年8月至11月，清理阶级队伍，我又进了“牛棚”，与其他七个被“揪”出来的领导和老师，在革命师生的监管下留校

参加劳动。1969年6月解放教师时，宣布我1966年11月的“削职为民”处理仍然有效。这样，我便第二次回到家里。不知那方神仙发了慈悲，我未被遣送回老家。

## 七、学艺养家

为了养家糊口，1970年9月，我到竹器社参加劳动，学习编织竹器。1972年2月，公社为了解决从全国各地清退回来的人员（当时坪石老街非农业人口有2000多人，清退人员不少）的生活出路，组建了一个综合厂，下分化工、灯泡、成衣、竹器、建筑等车间，由原公社副社长（他亦被清退）黄顺忠同志任厂长。我被选为竹器车间主任，直至1975年7月离厂回校。

竹器车间有20多人（后发展至30多人），无固定产品，销路也没有保证，只能零敲细打，还经常停工。为了解决销路问题，我曾两次北上河南，除稳定与郑州炼油厂原有的销售关系外，还与商丘食品公司签订了长期大量供应旦筊（装旦的竹筊）的合同。第二次去河南，我特意在武汉下车，来到长江大桥脚，在那里待了几个钟头，面对浩瀚的长江和雄伟的长江大桥，真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有了拳头产品，销路问题解决了，便着力解决生产管理与采购原料。每月所需竹子（主要是苗竹）五、六千斤。为了保证原料供应，几年下来，我跑遍了宜章城南、乐昌三溪、老坪石、坪石等乡镇的竹林，有时还远至黄圃、白石等地。每年所需的六、七万斤竹子就这样给我采购回来了。有了原料，生产便如虎添翼。为了减轻劳动强度，加快“破箴”速度，还购买了一部破箴机。在产品质量上也毫不含糊，不合格的则



一律退回翻工。我除领导生产外，每月有一半时间参加生产，学会了织畚箕、篓子、谷箩、藤椅等竹藤器手艺。

生产上去了，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工人每月做到按时（中旬）领取工资（按件计酬），最低的有30多元，高的有50多元，平均在40元以上，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了。我离开时，银行还有存款15,000多元，足够他们发放一年的工资。

## 八、平反复职

1975年7月底，我平反复职，未回到原校（即今乐二中）而分到老坪石中学，仍教语文，当班主任。在老坪中四年，主要是办农场，养猪、搞生产，学校变成了生产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教学才逐渐走上正轨。

1979年8月，老坪中撤消高中（为适应新的高考形势，全县二十多间完中缩为四间），夫、妻双双调到乐昌一中任教。因为我是学历史的，从1988年起便专教文科历史。乐昌一中班数多，班额大，从1979年起至1988年离开教坛，每年均担任文科复习班、应届班，甚至高二文科班的历史，任务相当繁重。每逢考试，近200多份试卷，每卷两至三张，但我仍兢兢业业，认真上课，尽心辅导，力争取得好成绩。八一届，应届文科历史科在全区十五个县中成绩排列第二。每年高考历史科成绩均超过省平均分，有两年超过8分、11分，虽不算很好，但也不会很差。1981年组织上恢复我副科级待遇，以后安排担任工会主席，1984年当选为县七届人大代表，连任两届政协委员，并任科教组副组长。1987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这年夏天，我办了离休手续。但因缺少教师，又返聘

了一年，直至 1988 年暑假才真正离开讲坛，在家安享余年。

最后我谄了三首打油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一)考入南大学习多，  
参加土改立场牢。  
留在连南愁事少，  
下放乐昌苦日多。

(二)荏苒光阴五十秋，  
最是难忘在连州。  
往事如烟难回首，  
今虽年迈志未休。

(三)百年生命有几何？  
沧桑变幼感怀多。  
欣逢盛世人尚健，  
得享天伦乐当歌。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四清”运动点滴

曾繁衍

## (一)

1964年秋，韶关地委在乳源天井山林场抽调了9名干部（我是其中一个），参加韶关地区组织的“四清工作团”，分配到连南县寨南分团的山联大队阿基寨生产队搞“四清”工作。我住到连南瑶族自治县赵副县长的家里“三同”。她家有赵副县长的母亲和入门的丈夫（汉族），其丈夫在生产队看管田水。她的家是满壁露出石头黄泥的墙，屋顶是用树皮盖的，我住在二楼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天，生产队长带人上山狩猎，打到一条大山猪回来，我品尝了野味，感到别有一番风味。他们打到山猪，按旧风俗是要把山猪头先割下来，再宰两只公鸡，向天公拜祭，说如果不如此，山猪就会成群结队进行报复，伤害庄稼。这里的瑶胞过去属“过山瑶”，即没有固定住址，逢山过山，四山为居，走到那里住在那里，吃在那里，下山时因怕汉人欺侮，身上常备一把刀，结队而行。现在，他们都已有固定住所，但很简陋，有的住茅棚，有的住泥墙树皮盖的房子，地点大多选在半山腰有水流的地方，用竹筒引

水，可直引进厨房、冲凉房。用水很是方便，但碰上雨天冲进来的水就脏得很。我住的生产队总共有13户，共分住在6个点的山腰，我们要同他们开会（几乎每天晚上开会），就要选好中心地集中。来开会时，每人需一手拿电筒，一手拿着拐棍，为因穿山过坳，道小路滑，一不小心就要滚下山去。每餐吃的几乎都是玉米糊，很稀，不用筷子就能喝下去。平时都是吃青菜，节日才有几块肉吃，但不敢多吃。同吃同住是艰苦的，同劳动也是一样艰苦。这里的大小梯田，都座落在高低不平的偏僻山沟里，往返路滑难走，野猪和其它野兽为害严重，庄稼常常受损，晚上要派人整夜轮班用铜锣敲击吓山猪野兽。由于生产队离大队20华里，离公社五、六十华里，遇到四清工作队集中开会，我们就要背上行李，越爬在路滑道小的崎山峻岭，艰苦之情，难以言表。

“四清工作队到户“三同”时，开始有个戒律，工作团规定“三同”期间，不许随便损害群众利益，不许随便吃群众东西，不许自己买肉、鱼、糖果饼干吃。于是发生过有个工作队员不敢吃三同户的猪肉，说“我是不吃猪肉的”，三同户便买鱼，他也说不吃鱼，直至宰鸡也说不吃鸡。三同户不高兴地说：“你我同桌吃饭，我们吃你不吃，我们怎好意思？”此事反映到分团办公室，才明确答复可以吃，但不要吃得太多，吃了要给回钱，不要让三同户吃亏。有时我们肚子饿，只好违纪买回糖饼在房里吃。

## (二)

1965年春，由于“四清”工作艰苦，中南局书记陶铸为激发四清工作队员的积极性，在连县的沙滩上举行了一次史

无前例的国防体育表演。连县城区几乎倾城而出，高楼顶、山上、树上、沙滩周围人山人海，热闹空前。开始是飞机空投9名国防体育运动员（五女四男，年龄为18岁至21岁），在沙滩定点跳伞降落，着陆后参加四清运动。跳伞项目第一个是800米女子跳伞，接着是2000米双人手拉手跳伞和翻跟斗跳伞等。定点跳伞中大都能准确降落，着陆后解下伞绳便跑上指挥台与陈郁省长和连县驻军首长亲切握手。接着还举行了几种航空模型飞机表演，有遥控式、线操纵式、电动式等，还有国防体育运动员与连县驻军射击表演，枪击飞碟表演，弹无虚发，使韶关地区几千名“四清”工作队员大饱眼福，尽兴而归，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艰苦的“四清”运动中去。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曲江县血吸虫病防治 工作的一些情况

方兰池

曲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历史悠久，远在四百多年前，樟市马蹄岗一带就流传着一首：“鬼屋村，鬼屋圪，谁人到谁人亡”的歌谣。群星、北约地区也流传着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故事，说是在风水圳源头的出水岩中，住着一一条鲛鱼精，经常变成一个漂亮的姑娘出没在附近，经常吐出许多口水粘液，人们吃到她那些带有粘液的水，就会发黄肿病、大肚子病……。这些民谣和传说故事，不但是一首备受血吸虫病摧残而衰败的村寨的哀歌，也是广大疫区的真实写照。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近百年间村寨毁灭者有65个，其中樟市有37处，马坝有28处。而濒临毁灭的随处可见。如樟市马蹄岗村（鬼屋村）解放前五十年间相继有97户灭绝，500余人死亡。临解放时，只剩下一户地主二人，700多亩良田全部荒废。樟市千家村一百多年前，在一平方公里土地上，有9个自然村居住着黄、赖、邹、廖、胡、张、朱等姓氏800余户共3000余人，由于到处钉螺孳生（每平方市尺达25只），造成血吸虫病严重流行，至解放前夕，

已有7个村寨被毁灭，仅剩下9户15人，这些幸存者也都染了血吸虫病，其中4人已是晚期病人。这些严重疫区还流传着一首哀歌：“鬼兜窝，鬼兜窝，白骨满山坡，房子长满草，白天鬼唱歌，穷人血泪流成河。”在那“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年代，疫区到处可以看到身材矮小、发育停滞、表情呆板的小老人。疫区群众称此病为影响生产、生活、生长、生育和生命的黄肿大肚病。这种病造成危害的后果，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若干年还可看出来。如樟市适龄青年，因血吸虫病而没有人合格参加国防建设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全县从1955年至1979年，通过粪便普查，直肠活体组织检查，综合查病方法，累计查出血吸虫病人12263人，其中早期病人11479人，晚期病人795人，占总人口的6.4%，侏儒型29人，巨脾型500余人，腹水型100余人，急性患者78人，以上患血吸虫病樟市和马坝占两地总人口的95%以上。此情况确实使人心惊。

曲江是广东省血吸虫病流行比较严重的疫区县之一。早在1953年，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就派出了工作组，在该县马坝地区开展了初步调查和试点防治工作。1955年县成立由副县长官怀民为组长、马坝区副区长李楠为副组长的曲江县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为配合省血吸虫病防治小组，治疗患有严重的血吸虫病者，曾把马坝旧市场改建为临时医院，抢救了一批重病患者。1956年，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以后，该县成立拥有各级医疗技术干部130余人的血吸虫病防治站，开展了曲江县人民“送瘟神”的群众性运动。组织群众填旧圳挖新圳消灭钉螺，即断绝血吸虫繁殖的根源。同时积极治疗血吸虫病者。20多年来，在上级

党委的支持和曲江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依靠和发动群众，贯彻执行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坚持了群众运动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原则。特别是围绕水、垦、种、灭、治、管的六字结合措施，坚持反复的防治工作。在同血吸虫作斗争中，全县人民作出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并积累了不少防治工作的实践和经验，终于在1974年取得了基本消灭血吸虫的胜利，为彻底消灭血吸虫病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基本消灭血吸虫以后，到目前又历时20余年，在实践中还有不少防治工作要做，从思想上一点也不能大意，因为孳生基地虽基本消灭，但血吸虫患者和牲畜患者，需要做大量的防治工作。为此这几年来还做了如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做好防治血吸虫的重大意义的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特别是重点疫区人民的认识，不麻痹，不放松，把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做好，一抓到底。

（二）每年于春秋两季县血防站全体技术人员要到灾地进行查螺工作。重点对原有螺地区进行复查，及时掌握情况，一经再次发现，立即动员群众及时消灭。这是进一步做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有力措施。

（三）多年来血防站每年开设六期左右，对血吸虫病患者进行护肝治疗，使患者身体逐步恢复健康。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一个关于包产到户 问题的调查

李海章

1962年夏天，我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我在英德县工作，担任英德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职务。一天由机要室传来中央一份电报，其内容是有关农村如何度过经济困难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调查提纲（共计20多条）。随后县委主要领导要我负责此项工作的调查。作为县办主任的我是义不容辞的。我带领办公室蓝茂林、赖培汗等五位同志，选择浚洸公社的新光、燕石两个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并选定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的包产到户有何利弊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我们到村后，召开了有干部、社员参加的群众大会，首先说明来意，强调调查组是根据中央的有关通知精神，对有关包产到户问题情况进行调查。调查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调查组决不会乱戴帽子，乱打棒子，不会秋后算账。调查开展后，调查组的同志白天与社员一起参加夏收夏种，晚上则召开各阶层人士及各类型的座谈会。座谈中，干部群众对包产到户反映热烈。会议常开到深夜，群众仍不愿离场。他们一致认为，包产到户可以调动千家万户的生产积极性，它不

仅可以使农民致富，而且也是克服经济困难的一个好法宝。燕石支部书记李××说：“包产到户肯定可以搞。它对提高的社员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改善社员的生活，改善干群关系，将起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有担心，就是怕上级说我们刮单干风，批我们有富农思想。”历时七天的调查结束了。回到县里后，我们综合了各阶层人士的反映，认真权衡包产到户的利弊，终于归纳出其六大好处及五个存在问题，向英德县委常委会议作了一次专题汇报。

### 一、六大好处是：

1. 能真正贯彻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使社员成为劳动生产的主人；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致力发展农业生产；可以克服社员迟开工、早收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现象。

2. 让群众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减少不必要人为的劳力浪费和精力损耗，使社员有充分时间休养生息，保持充沛精力投入生产。可以克服天天由队长派工所带来之忙乱及夜夜要社员评工记分疲劳群众的现象。

3. 能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发挥社员专业特长，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得到发展，做到粮食谷满仓，社员荷包涨。

4. 可防止干部贪污、挪用、多食多占集体财产行为的出现。可以克服“干部使钱头，社员用钱尾”不正之风的现象。

5. 能避免在分配中出现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可以克服“超友户超上天，存款户得个圈，分配难兑现”的现象。

6. 杜绝浪费行为，减少一切不必要开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社员分配收入水平。可以克服集体财产受破坏、被侵占、化公为私等现象。

## 二、存在的五个问题是：

1. 包产到户后，因劳动力强与弱、有技术专长与无技术专长而出现的收入悬殊、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2. 国家分给的征派购粮食、生猪、油料、禽蛋等各项任务如落实不到户，将难以完成。

3. 生产队向国家的借款、贷款，如不分解落实到户，也难以清还。

4. 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不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5. 集体积累的财产如保管处理得不好，容易造成损失或分光吃光，集体经济难于壮大。

英德县委常委会在听取调查组对包产到户利弊的汇报后，用了两天时间进行认真的研讨。研讨中大家意见不一，各有各的想法与主张，有的赞同，有的反对。大多数人则认为包产到户，虽可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是度过经济困难的一个好办法。但它毕竟是带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需要慎重考虑，三思而行。最后由县委第一书记王惠民同志作了概括性的总结，并提出几点意见：①对包产到户问题这次只是调查，不搞试点；②调查材料不作上报，亦不得向外界传播；③只能等着瞧，先看看中央和省地委对此问题有何评价、有何定论再说，以免担风险。

为什么会有这一结论呢？得看当时政治历史背景。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以及1961年至1962年间的反“五风”和“整风整社”等运动中的扩大化错误，均产生和发展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因而“左”的思想、“左”的路线贯串到了各项

工作中，这是对包产到户产生顾虑的根源所在。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我已担任县委副书记，被列为“当权派”。我在新光、燕石两个大队总结出来的包产到户六大好处的调查被捅了出来，从此政治灾难从天降。一批打着红卫兵、革命造反派旗号的人，揪斗我，说我是“三自一包”的鼓吹者；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是地地道道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对我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我认为包产到户的调查提纲是党中央发出来的，因而，我坚信只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就能有重见天日的时光。此后捱过了两年多的苦难日子，终于被“解放”了出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农村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它带动了城市的各项改革，使全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最近，江泽民同志指出：把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户，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说出了广大农民的心声。他还指出，这是农业生产规律决定的，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所决定的。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我们深信，只要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前进，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就一定能够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明天的农村，前程一定会更美好！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

# 解放初期访瑶山记事

李楠

1951年5月曲江县土改结束后，我们在大圹区土改的南大校友詹国雄等12人被留在区政府工作，我被任命为区政府文教助理员。遵照区委、区政府的指示，曾拨款给枫湾乡龙口圹瑶族联组建校舍，并派张文祥老师到龙口圹瑶族学校办学。学期结束时，张文祥老师来反映：“这间学校只有10多个学生，学校建在山溪旁，深山野岭，经常听到老虎吼、十分害怕，要求另派教师去，他不敢再去瑶山教书。”为此，我向孟广忠区长报告，孟区长叫我亲自去调查了解。并与联组长邓斗富约好1952年春节后正月十二日派向导到枫湾乡政府接引带路去龙口圹。

我提前到枫湾乡政府等候。正月十三日清早，我除配带手枪外，还扛一支步枪，以防野兽。在瑶族向导带引下，我们一行爬山越岭。山连山，风光好，羊肠小道，曲曲弯弯，时而上山，时而下山，在山中走了一天也不见人家村落，中午饮泉水送干粮。走啊走、爬呀爬，一直到黄昏，才看到对面山有分散的村落，向导大声鸣喂呼叫，对面人家有人拿着竹把火来接我们。下山去、爬上山，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

联组长邓斗富的家。

瑶胞好客，非常热情，用烟肉、生冬菇、瑶酒招待，可我对包米粥却感兴趣。可惜，吃二天包米粥之后，肚子受不了，肚痛拉稀，邓斗富同志发现后煮饭给我吃，才保平安。

当夜吃了饭之后，联组长邓斗富叫我去冲凉。我看见冲凉的大盆放在灶头的旁边，在大厅的一角，大厅上有男男女女，我说：“我不洗澡了。”斗富叔说：“走了一天的路，一定要冲凉的”。他马上从菜园边拿来二块竹篱芭作挡墙，这样我才敢去冲凉。后来我要上厕所，问厕所在什么地方？有人带我去，他指着一块大石头说：“就在大石头上蹲着方便吧”。我刚蹲下，就有数条大狗前来，吓得我不敢大便了。瑶胞在远处看见却大笑起来，他又带我到山上去，在深山里大便，又兼看瑶山月色美景，可谓痴“风流屎”啦。瑶族的风俗习惯，我一时很难适应，既新奇又苦恼。自己处处小心谨慎，尊重瑶族风俗，真怕惹出麻烦。

第二天，联组长邓斗富介绍该瑶族联组情况：分散居住在半山上的瑶族有二十多户，居住在溪边的汉族有6户。然后带我去一家一户访问，调查了解：汉族的房屋是土墙瓦面的结构。瑶族的房屋是泥墙竹瓦，即用树干竖起屋架用竹片芒竿做墙，再糊上坭巴以挡风，竹瓦是把毛竹破开、削去竹节、正反面覆盖为瓦，雨水可流走。大厅中砌灶头，灶炉口很大，又长又粗的树枝放在灶堂里烧。山中泉水用竹涧引到灶旁，置大水缸储水，长流不息。瑶胞多吃玉米粥度日，也吃番薯、木薯，生活十分艰苦，经济上十分贫困。瑶胞邓国发一家六口人，三年没有棉被盖，夜间盖棕衣，烤火取暖，已经半年没吃盐了。我看到的只有几件棕衣和破旧衣服，四个小孩没穿寒衣，白天要烤火取暖，十分可怜，眼见此情此景，

心酸泪滴。

龙口圩瑶胞生产落后，刀耕火种。以种玉米为主，兼种蕃薯、木薯、粟类等杂粮。但农作物经常被山猪破坏。瑶胞用草人穿衣服，利用水车撞击敲响大竹筒、咣咣作响，但山猪也不怕，经常破坏农作物。瑶胞用火药枪去打，也难打伤其坚硬的野猪皮。

瑶胞反映解放前种杉树情况：汉人财主，保长、乡长都说瑶胞居住的山地是他们的，瑶胞种的杉木原来讲好约定分成原则：山主占四成，种者占六成。但到砍树的时候，山主却说种者占四成，山主占六成。这些山主多数是枫湾、小坑乡的地主或族头、伪乡保长，持势欺侮瑶胞，更有甚者有的瑶胞种树者被迫只分得三成。瑶胞捉到石蛙、野鸡、大头龟到枫湾、小坑圩上去卖时，也经常受到汉族不法商人的欺骗，假称计算，明明是十斤的硬说是七斤。瑶胞没有地位，受了欺侮也无可奈何。有的更可恶的说是先赊着，下一圩来取钱，到了下一圩去向买主取钱时，买主却说我没买你的大头龟，死赖不认账。由于少数汉族无赖欺压瑶胞，所以造成了民族隔膜与仇恨。瑶胞流传一句话：叶子（竹鸡）土伦（芒鼠）山猪皮，将食莫话汉狗知”。把汉人称为汉狗，可见仇视之心。

这次访问，庆幸的是瑶胞会讲客家话，我用客家话在座谈会上向瑶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讲明汉族地区已经土改，在土改中，对那些恶霸地主进行斗争，打倒了封建势力。那批汉族败类欺侮瑶胞的恶棍、流氓、地痞、地主，在土改中受到应得的惩罚与教育。今后若有人欺侮瑶胞的行为，应向人民政府报告，人民政府会作出严肃的公正的处理。至于山林问题，政府的政策原则是“谁种谁收”。区政府会同乡政府和瑶胞一起研究，对于已经种上杉木的山林问题订出妥善处理

办法。我会向区政府汇报这山林问题，以求共同商量解决。

我这次来主要研究办好学校，希望瑶胞动员自己的子弟入学读书，免收学费，免费供应书籍，扶助瑶胞提高文化知识。也希望瑶胞关心教师，共同办好瑶族小学。特别提醒如果发现匪情，要及时向政府报告，共同消灭害人的土匪。

我回来之后即向孟广忠区长汇报。区政府领导研究决定：（一）拨出救济物资：棉胎被单十多项、棉衣二十多项、卫生衣四十多项。（二）拨出救济款若干。（三）拨给单响步枪二支，子弹七十发作保护生产，打猎野猪之用。（四）关于瑶族学校派谁人任教问题，孟区长说：“谁去谁就得到提一级工资的奖励”。后来小坑乡教师张良平提出去瑶山教书。他说我出身于山乡，我不怕老虎，我自愿去为瑶胞服务，受到人们的赞扬。

这次访瑶山龙口垌，我还办了一件实事：我在邓斗富家住下的第三天，发现斗富的妻子烧香拜神、求神灵保佑其患病的七岁儿子邓克耀早日恢复健康。我听到克耀痛苦的呻吟声，我即前去探看，发现克耀脸色苍白，其手有时会抽搐，我用手摸其额部手感其发高烧病状。我父亲是中医生，我读四年级时就要背诵“汤头歌诀”。在父亲的指点下，对中医有点了解，我认为这病可能是伤寒症。告诉邓斗富不要拜神了，孩子病重要赶快送枫湾卫生所治疗，邓说没有钱，我问去瑶岭钨矿需要几小时路程？他说需要三个多小时，我即写信给瑶岭钨矿徐矿长，讲明瑶族小孩患重病，又无钱医治，为了救人及搞好民族关系，请求先行抢救，药费由我负责解决。邓斗富叫来亲人背着孩子，持我给徐矿长的信，立即去瑶岭钨矿。据徐矿长后来对我说，我看到你的信后，即叫医生抢救患了伤寒症的小孩，幸好送来及时，若迟些就没得救了。经



过抢救，及时挽回一条生命，但没有治愈，而转到大圪区人民医院治疗。徐说：矿党支部作出决定：医疗费用不应由李楠负责，由矿里解决。因为抢救了瑶族小孩生命，搞好民族关系，过去矿里到附近瑶山要些竹木都不支持，现在瑶族同胞主动上门，说是要竹木材料，瑶族同胞会尽力支持。打开了汉瑶民族关系的大门，促进了民族团结的新局面。

瑶族病孩转到大圪区医院后，孟广忠区长十分关心，他叫大圪医院古医生尽力治疗，医疗费用由区政府负责。因病孩病重又转到广州治疗，医疗费用仍由区政府安排解决，总算医好检回一条命，但病孩邓克耀的脚变成有些残废，走路有些拐步了。孟区长在区干部会议上说：“政府出钱医好瑶族同胞，以实际行动说明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李楠同志把病孩及时送到瑶岭钨矿找徐矿长医治，药费由他负责，这种救人的精神可嘉应予表扬。他为搞好民族关系办了一件大好事”。那时我的想法是救人一命值千金，觉得应该去做的事情。因为我是元帅叶剑英校长教导出来的学生。

1953年秋我被调到曲江县委调研办工作，安排当县委副书记李洪德的秘书。1955年任马坝区副区长，1956年调曲江日报任记者。1958年12月被打成“中右”，下放劳动改造。1959年县市合并，我被安排到市艺术馆搞专职文艺创作，从事业余文艺创作辅导工作。1979秋的一天。我和本馆曾广珣同志去瑶山茶园山大队采访，并去辅导业余作者高仕荣同志创作的一个剧本修改问题。当天晚上，民兵营长唐标（瑶族）同志，拿着酒菜特来我们房间座谈，唐标同志说：“我的岳父邓斗富曾多次打听过李楠同志，他说要当面感谢你，你救了他儿子邓克耀的命，你是克耀的救命恩人。可惜打听到你被打成“右派”，又听说被折磨死了。想不到你还在人间，

太好了。你是好人，好人应该长命才对。今晚我代表我小舅克耀来感谢你，“喝杯瑶酒、表示谢意！”我说：“当时我想的是救人要紧，所以写信给徐矿长，药费由我负责，我怕徐矿长不肯收留，结果是得到徐矿长的关心，及时抢救了克耀，又受到孟区长的关怀，还送去广州医治，这是共产党干部共同抢救你的小舅子，应归功于共产党。”我们在茶园山大队住了三天，瑶胞唐标天天上山打猎，打来了山鸡、芒鼠招待我们，想不到1952年救了瑶族小孩，做了一桩好事，却在瑶山传颂着李楠是好人美誉。茶园山回来不久，收到曲江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邓克光的来信，信中说：收到唐标的来信，知道你还活着，我父亲邓斗富说过你是我弟弟邓克耀的救命恩人，特表感谢等语。

1990年初我离休了，市政府副市长卢定周派人来找我，叫我撰写韶关风俗志，我接受了任务。1990秋的一天，我到瑶族乡始兴县深度水去调查了解瑶族的风俗习惯。当天晚上，有一位七十多岁的白发老大爷来到我的面前，向我鞠躬行礼，我急忙起身鞠躬回敬。老大爷说：“你还记得我吗？我叫邓国发，1952年你到我家调查，回区政府后，给我家送来数件棉被，棉衣，卫生衣，还有买盐买粮的钱，救了我一家啊！”我说：“你就是邓国发同志呀，你还很健壮啊！现在孩子干什么工作呀？”他说：“打帮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照顾，我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有一个孩子政府送去民族学院学习，现在始兴县民族科当干部咯！你看我们民族乡，瑶民都住上新楼房啦！我家祖孙三代有十多口人了。幸福全靠共产党啊！”我想起1952年邓国发三年没棉被盖，盖棕衣，烤火取暖，半年没吃盐，瑶胞的苦难，记忆犹新。看今天邓国发一家的变化，瑶山的变化，深有感慨，充分的事实说明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党的光辉煌耀着瑶山，给瑶山带来了春光，带来了幸福与光明。有感赋诗曰：

当年办学访瑶山，奇特风情记心间。  
竹瓦茅房穷度日，刀耕火种受饥寒；  
缺医少药瑶民苦，没米无盐眼泪潺。  
今见瑶山新气象，老夫不负寸心丹。

（作者：系南方大学校友）

# 记南方大学韶关归侨 (港澳) 校友会

李南恩

## 一、海外归来做学生，欣逢土改踏征程。

南方大学韶关归侨(港澳)校友会，自1987年7月26日成立以来已有十一年多了。会员有60多人。他们除少数人在解放前回国读书外，大部分是在解放后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柬埔寨、美国、香港、澳门等地回来，一九五〇年报考南方大学的第一、二、三期学员。其中第二期学员有60多人，参加粤北土地改革运动。这一批学员，聆听叶剑英校长关于参加土改动员报告，在土改中牢记母校“忠诚、团结、朴实、虚心、勤劳、勇敢的校风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宣传政策、划分阶级，分配田地与胜利果实。在土改中他们发挥了骨干作用，有的成为乡组长和单元组长。他们先后参加过曲江、英德、乳源、南雄、乐昌、仁化、连南等地的土改和土改复查工作。土改结束后，大部分参加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少部分调入地区、县机关工作。真是海外归来

做学生，欣看土改踏征程。他们直接参加政权建设与生产建设，好像革命种子，撒在粤北大地生根、开花、结果。

## 二、归侨体味甜酸苦，黑榜含冤恶梦惊。

南大归侨有赤子之心，爱国热忱。留在基层工作的普遍是安排当助理员工作，少数的参加区的领导工作，如刘国柱任区委书记，蔡栢和、余俊明、马灿中、魏启南、潘思莉、卢新云等都是区、科级干部。五十年代初时，政治风气比较正常，看干部重在表现，因此，原来担任助理员的归侨侨胞，经过党的教育与本人的努力，大都得到提拔使用。如原大圪区财粮助理曾瑞庄提为区委副书记，梁锡祺提为市粮食局负责机械部门主管，李楠提为曲江县文教科副科长，庄礼味任命为南雄县文化馆长，丁积球提为乳源县文化科长，徐坚定也提为科级干部。他们得到党的关怀，心中是甜滋味的。但是，南大归侨的好景不长，由于他们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遵照南大学风实事求是精神，敢于讲真话，敢于坚持原则，因此，在反右派运动中，许多归侨校友上了黑榜，被打成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如徐坚定，庄礼味，除少华等等。陈少华被打成极右分子，送英德劳教，他在劳动改造中不服上诉，上诉了几年仍然写上诉状，劳教干部说：你要盖指模不再上诉，不盖指模还要上诉的话，我把你的食指斩断，看你还敢不敢写申诉。结果，其右手食指中指被残酷地斩断了一节。多么可怕，多么凶残啊！可是，陈少华还是继续写申诉，劳教出来后，仍然继续申诉，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恢复级别职务、调回农委工作。反右之后，又搞四清，接着搞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段时期，南大归侨校友也大部分上了黑榜，有的被内定

特嫌，批斗交代。有的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控制使用。1964年曾瑞庄父亲从马来西亚寄来一百元，嘱其办母丧事，引起组织部门的怀疑，此事之后，曾被调到县药材公司任经理，区委书记职务不明不白被撤销了。南大校友越南归侨洪明珠，1947年从越南回国读书，后考入南大第三期，从部队转业到广东省机械厅工作，也被定为不可重用。文革时下放到广州市道路公司二工区修马路数年，后被疏散全家到韶关。还有许多事例不胜枚举。林彪在广东搞划出26种人，那时的归侨变成各种黑类人物，搞得心惊肉跳，恶梦丛生。

### 三、赤子忠心为报国，侨联引路会亲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和胡耀邦同志主持拨乱反正，迎来新时期。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右派改正了，冤案平反了。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对华侨关系的论述，认为华侨关系是好关系，归侨才得到公正的待遇。

其实，归侨在得不到公正待遇的时候，他们的赤子忠心报国的思想和意志始终不变，虽遭劫难，仍然坚持爱国爱党爱人民。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恢复职务之后，更加努力工作。如南雄县南大归侨庄礼味，曾被打成右派，平反改正后任文化科长、县方志办主任、人大副主任等职。他搜集南雄民间故事、文史资料，编印南雄县志，作出很大的贡献。又如南大归侨李楠，在1958年对马坝公社把几亩田快熟的稻谷搬到一丘田堆栽，因要倒伏，用竹竿来栏，不通风又用鼓风机吹禾通风，说什么搞万斤亩放卫星，他对技术员批评说：这是劳民伤财，虚假主义。他看到堆番薯山时，竟说这是搞新花样，种不出大番薯来。他却在

番薯山旁开荒种老式番薯与之比赛，结果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被划为中右，内控使用，下放劳动改造。但他是搞文艺创作的干部，当过记者、编辑，有一技之长，调他到市文化馆（后改为市群众艺术馆），从事文艺创作辅导专职工作，负责编印《韶关文艺》等期刊。他组织辅导业余作者，办文艺创作学习班与个别辅导相结合，培养出一批业余作者。既出作品，又出人才。现在已成为作家、诗人、曲艺家、民间文艺家的有吴泰基、何志宏、吴贻才等 20 人。1982 年他被省文化厅授予广东优秀文艺创作辅导干部称号。这是对他从事 30 多年文艺创作辅导工作的肯定和奖励。在辅导的同时，他自己也从事业余创作，编写剧本、曲艺、诗歌、故事等作品。他的故事作品曾多次获省优秀奖，并由广东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综合本出版。他参加市侨志编写工作，独自撰写韶关风俗志，由市出版外，还由省旅游出版社出版。曾在市、省级刊物发表的作品共有 50 多万字。这是他作为离休干部和归国华侨对祖国报效的奉献。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的弦越拉越紧，黑榜含冤恶梦惊的时期已往矣、开放改革之后，归侨又见艳阳天。昔日曾被怀疑为特嫌的柬埔寨归侨梁锡祺曾被选为市侨联第二、三、四届副主席、市政协三、四、五届常委委员。“特嫌”曾瑞庄被任命为浚江区侨办主任。泰国归侨徐坚定在右派改正之后任乳源县侨办主任和县政协副主席。南大归侨刘国柱被选为乳源县副县长。归侨叶宇平获得公正待遇之后创建贸易公司，内联外引，为乳源创造了财富。翁源的南大归侨叶海引进外资作出贡献，曾被选为政协副主席。南大归侨魏启南在引进外资中立下了功劳，被选为副县长。他们过去皆因华侨关系受到歧视与内控使用，只有在拨乱反正的春风

吹暖大地的时候，才发挥了特殊作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归侨的特殊作用，联络感情，互相帮助，交流信息，联络海外华侨亲人，起到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作用，更好报效祖国。1987年10月26日，韶关市成立了南方大学韶关归侨（港澳）校友会。选出名誉会长梁郁文，会长潘思莉，副会长陈斯意、刘国柱、马灿中、庄礼味、叶海、范启泉、丁积球、洪明珠（兼秘书长），副秘书长陈少华、杨松槐、云大标、梁锡祺、关蝶影；常务理事魏启南、徐坚定、李楠、叶宇平、蓝爱富，黄志仁，余俊明（已故）等人组成理事会。

南大韶关归侨校友会，成立十多年来继续发扬母校“忠诚、团结、朴实、虚心、勤劳、勇敢”的校风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团结国内外校友，联系国外华侨亲人，为促进四化建设与祖国统一，做了有益的工作。

南大韶关归侨校友会，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理事会，负责开展活动。大的活动有多次，小的活动较经常；节日有聚会，小组常碰头。理事会成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团结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这是由于他（她）们都具有归侨心，爱国心，南大精神，奉献精神。正如“千年榕树共条根，天下华侨中国心。”正因为有赤子之心，故校友会的事大家都能积极地完成。

校友会在会长的领导下，在市领导和侨办、侨联的支持下，顺利办了几件大事：

(1) 1988年6月13日南方大学归侨校友会组织在全省各市、县及港澳地区的理事30多人，在我市碧湖山庄召开南大归侨校友会第一届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并到曲江、仁化县参观，受到市、县各级领导的欢迎。还到韶关拖拉机厂参



观。该厂党委书记陈斯意也是南大归侨，曾与港澳南大校友杨祥福联系投资事情。

(2) 1993年4月27日在市迎宾馆，举办了南大归侨（港澳）校友会第三届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来自香港、澳门、广州、武汉、江门、汕头、肇庆、揭阳、开封、德庆、英德、阳山等市、县的归侨校友理事80多人参加。我市党政四套班子市委书记侣志广、人大主任卢定周、市长汤彤海、政协主席王佑等领导，接见全体校友并讲了话。会后参观乳源、乐昌等旅游点。并在市政府礼堂举行联欢晚会。在联欢会上，表演了南洋歌舞、粤北民间歌曲。晚会搞得生动活泼，受到赞扬。

(3) 组织本市南大归侨校友到乳源开会、参观。并开展有益的活动。1997年7月26日到乐昌坪石召开庆祝南大韶关归侨校友会成立十周年大会，邀请南大归侨校友会领导方定一等参加指导。会议上还交流养生保健的经验，博得校友的喜欢。

(4) 宣传归侨保护法，为校友落实政策，排忧解难，作出努力，受到好评。1991年公布我国第一部保护归侨、侨眷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后，我们组织归侨校友学习贯彻和检查落实。对一些单位尚未执行有关归侨退休金增加5%的问题，会长、常务理事分别上门宣传归侨保护法，以争取领导的共识，从而保护了归侨的合法权益。原武江区侨办主任受到不公正的处理问题，潘思莉、陈斯意、李楠等校友积极向区侨办、区党政领导反映，清求依法办事，最后得到落实，为他恢复了职务工资级别和补发了工资。

#### 四、人生价值轻名利，奉献精神座右铭。

南大归侨校友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在逆境中仍然坚持爱国宗旨。因为他们在国外受到歧视和污辱，皆因祖国不强大；只有强大的祖国，华侨、华人才能有地位、有发展、有安居乐业的日子。对此他们有深刻的体会。回国报考南方大学，其目的是报效祖国，因此，在逆境中他们仍然是拳拳赤子爱国心。归侨校友潘思莉1950年4月从越南归国，8月投入南方大学第二期第二部学习。1950年12月到曲江土改，后到连县、连山、连南土改。1955年任连南县委组织部干事，县委办公室主任等职，1960年任地区农业局人事秘书科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海外关系问题，下放到“五、七”干校学习劳动。但她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经得起党对自己的考验。后调回地区工作，曾被广东省妇联授予“先进妇女干部”，被选为省归联代表。1986年任韶关市外事侨办公室副主任，1990年升为主任。曾作为广东省行政视察代表团成员访问过结为友好省（县）的日本国兵库县等地。

潘思莉担任归侨校友会会长以后，带领校友积极开展穿针引线，铺路搭桥，做侨字文章，做海外联谊活动，为建设韶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她多次出国探亲，心中有祖国、出力为韶关。往美国、加拿大、日本、越南等地，均向海外华侨亲人介绍韶关投资环境，争取海外亲友投资祖国建设。多次去香港也与南大校友、亲友联系，动员他们投资建设韶关。

副会长陈斯意校友多次去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曾为工厂产品出口和引进外资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秘书长洪明珠利用赴港探亲与香港同胞联系，宣传党的侨房政策，为

落实侨房政策起到积极作用。

同时，归侨校友会与香港归侨校友、本会常务理事何世光联系，由他投资 30 万元与韶关农业发展总公司合资创办了“热收缩薄膜厂”。同时，还与始兴县兴建了人工培植良种冬菇场，冬菇出口到香港。

南大韶关归侨校友会成员，在韶关工作四十多年，他们抱着自律的宗旨：人生价值轻名利，奉献精神座右铭。这是遵照党的教导，南方大学的哺育，土改斗争的锻炼，实际工作的考验，坚持奉行的座右铭。归侨为报国，志在无私奉献。诗曰：

海外归来做学生，  
欣逢土改踏征程。  
归侨体味甜酸苦，  
黑榜含冤恶梦惊；  
赤子忠心为报国，  
侨联引路会亲朋。  
人生价值轻名利，  
奉献精神座右铭。

（作者：系南方大学校友）

封面题字：赵朴初

封面摄影：黄日有

主 编：伍时永

编 辑：罗运梅

校 对：罗运梅

## 韶关文史资料

第二十四辑

---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粤印准字第 1463 号

邮政编码 512002

---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承印